

DENG XIAOPING

鄧小平

不可告人的秘密

◎ 董大凌

他擠下華國鋒、胡躍邦、趙紫陽，阻止政治改革，
堅持血腥鎮壓民眾抗議，製造了巨大的貧富差距，
卻被稱為改革總設計師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內容簡介

有人說，如果沒有 1989 年的“六四”，鄧小平將以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領袖形象留名青史；如果沒有 1992 年的“南巡”，鄧小平將以堅持專制、冷酷血腥的屠夫形象遺臭萬年。

人們曾經以為，鄧小平在世間的形象，在 1997 年 2 月 19 日他辭世之日就此定格：以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一黨專政的“兩手硬”形象，被蓋棺論定。

16 年時光如流水沖刷，鄧小平的衆多光環次第脫落。如今對鄧小平的評價不僅沒有塵埃落定，反而愈形兩極化：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推出其巨著《鄧小平時代》，堅持認為，鄧小平的貢獻和地位被嚴重低估；然而圍繞他的這部傳記，衆多知情人講述內幕，衆多學者深入剖析，卻對傅高義的說法不以為然，認為過去以為安在鄧小平頭上的那些傳奇，原來並不是那麼值得讚頌；而過去以為鄧小平當之無愧的那些功勞，其實要麼是“張冠李戴”，要麼是言過其實——連鄧小平主導中共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說法，也被譏為“神話”。

鄧小平曾經強力主導了對毛澤東的官方定論，現在，他自己的歷史地位，也受到來自左的和右的兩方面的強力衝擊。

《真相》系列 (81)

鄧小平

◎ 董大凌

不可告人的秘密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Deng Xiaoping Bu Ke Gaoren de Mimi

by Dong, Daling

Published in 2013 by Mirror Books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978-1-940004-00-6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New Yorker Design Studio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11729-0795, U. S. A.

Phone: (516)338-6976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真相》系列 (81)

書名: 鄧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

編者: 董大凌

出版人: 何頻

責任編輯: 曹國信

校對: 隋楚燕

書籍裝幀: 紐約客設計所

監印: 明鏡出版集團

出版: 明鏡出版社

網址: 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 mirrorbooks@mirrormediagroup.com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11729-0795, USA.

電話: (516)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 978-1-940004-00-6

定價: HK119 NT399

版次: 2013年5月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複印, 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 請寄回更換



此頁空白

9 鄧小平強加給全黨的 1981 年《歷史決議》

中國能不能走上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關鍵在於能不能擺脫毛澤東的陰影，使這個黨和全國人民一起，從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和毛澤東思想的奴役下面解放出來。在“四五”運動中，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在理論務虛會中，在四千人討論中，都有重大的認識成果。但是，鄧小平動用強權，力排眾議，扼殺了這些積極進步的認識成果

75 還原鄧小平阻撓改革開放的真相

所謂“改革開放”，對外是要開門，對內就是鬆綁，對思想，更不應施加任何束縛。鄧小平恰恰是以權力為施政的圓心，他的左右搖擺，他的倒行逆施，他對黨史重大事件的裁決和處理，一切都是圍繞鞏固自己的權威，他是自由的敵人

101 不能用今天的形勢要求當年的鄧小平

多次聲稱要推進政治改革的鄧小平，卻沒有對政改邁出實實在在的步子。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對此的解讀是，鄧怕亂——他不同意有些外國人說鄧完全反對民主，反對政改。“鄧認為，只有在安定、團結的局面下，才能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附：《鄧小平時代》大陸版少了什麼？

135 鄧小平不是啟動改革的人

傅高義眼中的鄧小平，歷史地位相當高。他認為，鄧小平在提升百姓生活水平與影響世界歷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鄧小平知道鎮壓會導致糟糕的結果，但不這麼做，國家可能分崩離析。鄧小平的領導方式對後來的中國領導人有深遠的影響

178 傅高義筆下的現代中國“總經理”

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與鄧小平見面。聽了麥理浩的擔憂後，鄧小平指出：“如果你覺得香港難治，你應該試試治理中國。”當時，中國剛經歷“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已經看出中國的處境艱難

198 傅高義為何代中共鼓吹“屠民治國論”？

在傅高義看來，中國人與西方人就是不一樣，不需要民主，不需要人權，只需要物質生活改善就行了。這部煌煌鉅著，專為獨裁者歌功頌德不說，還公開宣揚種族歧視，把中國人民打成了不配享受與西方人同等待遇的劣等民族，真是莫大的諷刺

216 真實的鄧小平：評傅高義新著

西方一些觀察家覺得不可思議：鄧小平一方面如此積極地推進經濟改革，另一方面卻如此頑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鄧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實這裡根本就沒有什麼矛盾。鄧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讓跟中共有關係的權貴精英獲得財富，一方面則保護中共的權力

鄧小平小心翼翼地重整破碎山河

本書並非充滿溢美之詞，但某些段落讀來確有幾分像是鄧家授權的傳記。如果中國的歷史學者在從事他們具有顛覆性的職業時，能有朝一日不受控制和審查，他們一定會有這樣的評價：中國人對於鄧小平的崇敬，應遠遠超過毛澤東

224 鄧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

鄧小平真正改變了中國，新出版的由傅高義執筆的這部《鄧小

平時代》是迄今最完整的、也是最有雄心的。但是，這部有關鄧小平的最新傳記是否也留下了盲點？

234 改革開放·“六四”鎮壓·抗拒政改

鄧小平會見我當然不是禮儀性的，而是有意作重大政策性的宣示及傳達重要信息，中共的官方報導因而集中在鄧小平的兩岸政策之申述，雖與筆者所發表的中英文版本具有明顯的差異，但北京當局顯然認定我的說法並無錯誤，因而予以尊重，並未駁斥

245 撒切爾和鄧小平趙紫陽交手的機密細節

撒切爾素有“鐵娘子”的綽號，以堅定、強硬聞名於世，而毛澤東早就說鄧小平是“鋼鐵公司”，鄧也素以堅定、強硬著稱。撒切爾夫人和鄧小平雙方利益對立，立場迥異，鐵擊鐵，硬碰硬，必然火花四濺、充滿火藥味

258 中國錯失政治改革的黃金時段

中國人多少年來盼望要政治轉型、和平過渡，盼到了1987年十三大的政改決策，機會多麼難得！既然如此，我們就要爭取讓政改方案得到通過。如果這一次不能通過，一拖下去，時過境遷，夜長夢多，不知道又要拖到多少年以後了！——改革者的擔憂不幸而言中

278 追求民主憲政的人比“六四”時思想更成熟

現在老百姓對當年學生提出的反貪汙、反官倒、要民主的需求更大；社會精英的思想比當時更加深化，但知識份子也分化了，一部分人成了“中國模式派”

292 如果鄧小平會被騙，就不是鄧小平了

八十老人姚監復說：我探望被軟禁中的趙紫陽時，問他：學潮中是不是陳希同、李錫銘他們合夥欺騙了鄧小平，所以鄧才決定戒嚴？趙紫陽回答：如果鄧小平能被他們這些人欺騙，那就不是鄧小平了！我向陳希同轉述了趙紫陽的這句話。這句話說到陳希同心裡去了！

314 “這一個字絕對不能加”

有好心的朋友，很真誠地勸胡老在《胡趙新政》之前加個“鄧”字，變成“鄧胡趙新政”。這樣，就有可能在大陸的開明的刊物上刊載。但是，胡老這位倔強的硬骨頭說：“其他都可以妥協，這一個字絕對不能加。”

322 胡錦濤的伯樂宋平冷斥盛世

中共元老們對現任執政者的評介，老百姓根本不得與聞，但前重要黨報總編輯自費印刷的回憶錄中，退休政治局常委宋平的談話不經意間透露出他的個人看法與不滿——即便是中共常委一級的高級領導人，對中國的前景也充滿憂慮

333 後記：對鄧小平，是高估了，還是低估了？

鄧小平強加給全黨的 1981 年《歷史決議》

北京學者座談發言紀要

中國能不能走上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關鍵在於能不能擺脫毛澤東的陰影，使這個黨和全國人民一起，從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和毛澤東思想的奴役下面解放出來。在“四五”運動中，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在理論務虛會中，在四千人討論中，都有重大的認識成果。但是，鄧小平動用強權，力排眾議，扼殺了這些積極進步的認識成果

《新史記》編者按：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30 年後的 2011 年 10 月中旬，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北京一批知名學者，

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的，沒有任何宣傳，但是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了深刻批判。

《歷史決議》與三中全會精神相悖

鄭仲兵：今天邀集朋友們來評說 30 年前出台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意在回顧和反思那段歷史，自然是不帶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純史學意義的、民間的自由討論，也無意針對其它機構召集的有關討論，請大家隨意發言。

本人不是這個《決議》的參預者，但當時在中宣部理論局工作，對前後一些歷史情況不能不有所瞭解，為拋磚引玉，我想說些對《決議》的看法。

多年來，官方和一些學者的著述，都把《決議》說成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產物，說它是在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搞出來的。

其實不然。恰恰相反，它是鄧小平繼 1979 年 3 月 30 日在理論工作務虛會所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報告後反“自由化”的產物，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歷史版，完全是鄧小平意志的反映，與“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相



鄧小平被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越來越多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

悖的。

1978 年 12 月，中共召開帶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9 年 1 月—4 月（中間休會一個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的胡耀邦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務虛會以實踐檢

驗真理以及理論、政策、是非的標準，對中共建政 30 年的歷史，特別是“文革”十年，以及毛澤東的責任和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我認為這是中共歷史上僅見的生動活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會。

但是，在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鼓噪下，鄧小平把它看作是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在務虛會的第二階段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腰斬了理論務虛會，從而也腰斬了方興未艾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此同時，還取消了民眾表達自己思想和訴求的“西單民主牆”，抓捕了魏京生、傅月華等人，取締了從反對“四人幫”暴政而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和刊物，從而也扼殺了從“四五”運動、“四人幫”垮台到三中全會以來產生的自由、民主的萌芽。

當時，這一系列違背三中全會精神甚至違反憲法的言論和行為，給予正處於思想解放運動高潮的理論界和知識界的打擊，更甚於“兩個凡是”的社論和凡是派對真理標準討論的壓制。因此，在黨內黨外引起了強烈的反彈。

為此，10月下旬，鄧小平提出三項動議，並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做出決定：一，修改黨章，把“四項基本原則”寫入總綱；二，修改憲法，取消公民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權利；三，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用他的“完

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用四項基本原則，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三箭齊發，異曲同工，都是為深入反自由化。

中央文件說，《歷史決議》“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其實《歷史決議》自始至終都是完全在鄧小平個人掌控中進行的。而具體負責文件起草和修訂工作的，也是反自由化最積極的胡喬木和鄧力群。如鄧力群在《12 個春秋》中說的：“起草工作由胡喬木負責。起草小組的組織、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聯繫、交流都由我負責”。起草小組的筆桿子主要是鄧力群挑選的，有關人員有鄭惠、盧志超、滕文生、鄭必堅、廖蓋隆、袁木、邵華澤、石仲泉、李洪林、龔育之等，前四名都是鄧力群主政下的書記處研究室的幹部。李洪林因著文評析“長官意志”與胡喬木觀點相左，便不讓他參預執筆。鄧小平、胡喬木、鄧力群形成嚴密的三位一體，胡耀邦根本插不上手。鄧力群說：“每次稿子送到他（按：指鄧小平）那裡，都看、都想，都提意見。大多把胡喬木和我找去，講他的意見。我把他的意見記下來，回來向起草小組的人傳達，有的還在書記處研究室傳達，每次傳達後，都由衛建林幫助整理。前前後後，鄧小平發表意見有十五、六次。”

據不完全統計，從 1979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做出正式決定起草《歷史決議》，到 1981 年 6 月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歷

史決議》，中經一年零六個月。鄧小平指示性的談話有 19 次之多（其中直接找胡喬木和鄧力群談話有 6 次），再加兩次和外賓的談話，涉及《歷史決議》講話共 21 次。

鄧小平粗暴否定胡耀邦的方案

這中間有一個重要插曲，即 1980 年 11 月 10 日——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做出決定，同意華國鋒辭職，由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

1981 年，2 月上旬，胡喬木他們搞出準備交六中全會討論的決議稿，胡耀邦看後十分不滿意（鄧力群回憶錄《12 個春秋》中說：“胡耀邦同志看後認為這種思路不行”）。不得已，提出由他組織人再搞出一個決議稿。鄧力群即報告鄧小平。鄧小平口頭上表示：“好嘛，兩個攤子，各搞各的嘛。”但是，當胡耀邦在一個月後，真的拿出新的決議提綱時，鄧小平竟沒有經過政治局或常委會討論比較，就粗暴地把耀邦的方案否了。

經過是這樣的：3 月初，胡耀邦完成了《口頭匯報提綱（草稿）》（鉛印本）。耀邦以實踐的標準對歷史問題的是非曲直做出明確判斷，並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當前的任務和今後的做法。應該說，這是對歷史問題應有的比較正確、負

責的態度。耀邦把題目也改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共分九個部分。

鄧力群即把耀邦的方案報鄧小平和在外地休息的胡喬木。胡喬木即表示不贊成。

3月7日，鄧小平把鄧力群找到家裡，說：“胡耀邦的第二方案不考慮了。”也不說明任何理由。而表示保留前面提到的，胡耀邦十分不滿意的胡喬木、鄧力群搞出來的送六中全會審查的決議稿。鄧小平對已任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採取如此輕蔑的態度，可見其跋扈和專權的地步。然而我們的一些朋友至今仍以為決議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搞出來的。

本來歷史已經給那些“問題”做出了結論，現在卻倒過來了，“決議”要把結論強加給歷史。對起草這個決議，鄧小平不僅劃了框框，定了調子，而且正是鄧小平一連串講話內容的集中，可以說，它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鄧小平個人的意志。首先，鄧小平反覆強調，“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鄧小平甚至還用了三個最——“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來強調這一條。

眾所周知，對於中共歷史，特別是“文革”十年的反思的成果，第一步，也是出發點，就是認識到要打破政治以及經濟、文化思想上的專制主義，這也是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其中最突出

的就是領袖和國家、領袖和政黨、領袖和人民的關係，這就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中國能不能走上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登上現代化的殿堂，關鍵在於能不能擺脫毛澤東的陰影。這也應當是回顧中共歷史的根本出發點。從這個出發點來反思，就必須打破現代迷信對人們思想的奴役，搬掉毛澤東的神像，使這個黨和全國人民一起，從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和毛澤東思



胡耀邦

想的奴役下面解放出來。這個問題，在“四五”運動中，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在理論務虛會中，在四千人討論中，都有重大的認識成果。但是，鄧小平堅持“一句頂一萬句”，利用強權，力排眾議，扼殺了這些積極進步的認識成果，堅持自己創造的“準確完整”。這樣既可以把“非毛化”的責任，推給實踐派——批毛者；又可以承繼毛的專制主義政治道統，為自己進一步專權鳴鑼開道。

鄧通過《決議》一箭雙雕，逼華下台

在敘述和總結歷史過程時，鄧小平還公然用詭辯和謊言來糊弄事。

1, 接受陳雲謀略，增加建政前 28 年的敘述。鄧小平雖說不提“路線鬥爭”，但事實上是按著路線鬥爭的思路，把 28 年的歷史曲折都推給陳獨秀、張國燾、王明等當年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左”或右的錯誤。從而神化了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共產黨。

2, 要求把 1957 年以前寫成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完全正確無誤的歷史。連“三大改造”，都說成是“偉大成就”，成為之後“一切進步的基礎”。

3, 1957年“反右”運動被說成還是必要的, 只是擴大化的問題。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被說成“急於求成”, “沒有經驗”的問題, 而且為了掩蓋錯誤, 鄧小平提出先寫成績, 再寫錯誤。在此之前, 連起草人胡喬木都覺得為難, 他說: “唉呀, 不寫缺點通不過啊, 造成這麼大危害, 不寫, 怎麼說服黨內外呢?” 鄧小平這麼一支招, 鄧力群說, “稿子的全貌有了改觀, 總算解決了問題。”(《12個春秋》166頁)

鄧小平甚至把毛澤東完全錯誤估計形勢的《1957年夏季的形勢》一文當作“完全正確”的“毛澤東思想”, 要人們去繼承和發揚。就是這篇文章提出: “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 是對抗性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才有了殘酷打擊近百萬知識精英的反右運動。還提出“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 是不夠的, ……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於是十年之後出現了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 於是出現了延續20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極權獨裁政治局面。

4, 承認“文革”“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算是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但是, 鄧小平還強調“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而把責任都推給所謂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後

來覺得不夠，又加上康生、謝富治兩人。《決議》給文革的定義是：

“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裡竟然連毛澤東的名字都捨不得點，只含混地說是“領導者”。更嚴重的是，究竟是誰利用誰的問題。這個問題，閻長貴先生已作了很好的論證。

5，根據鄧小平意見，決議後來還加了一個部分：“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的歷史”。完全是鄧小平的權術，即通過起草《決議》達到一箭雙雕的功效，既打擊整肅了“自由化”的勢力，又能逼宮——逼使華國鋒下台。

華國鋒被迫提出辭職是 1980 年 12 月，而在 1980 年 9 月，鄧小平個人通過胡喬木將華執政四年的問題，作為專門一個部分寫進決議稿，並送常委會“審閱”。

華國鋒表示反對。他認為沒有經過常委會討論，不符合組織手續。他還援引毛澤東在七大的做法——七大只總結抗日戰爭以前的問題。華的反對顯然是合情合理的。鄧小平不僅沒有理睬他的意見，還把稿子下發，發動四千高級幹部大討論，為華下台製造輿論。鄧力群在《12 個春秋》中承認：經過四千人大的討論，把華國鋒問題寫上決議，“這對於華能否繼續當黨的主席成為一個關鍵。”（171 頁）

不僅如此，鄧力群在 9 月下旬，先後在科學院黨委、中辦和

中直機關黨委借談歷史決議，專門講了華國鋒問題。一次是半天，一次是三個多小時。

11月16日，政治局召開會議，批判華國鋒，華國鋒被迫提出辭職。12月5日，政治局會議同意華辭職。最豈有此理的是，鄧小平在六中全會預備會上說：“華國鋒的名字這裡需要點（按：指寫入《決議》），因為合乎實際。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志的工作。”

《歷史決議》開闢了什麼道路？

官家媒體總是冠冕堂皇地說：《歷史決議》是按民主程序、自由討論的產物。不僅吸收了三中全會以來思想認識的成果，而且聽取和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先有四千高級幹部的討論，最後又有幾十人的討論，幾易其稿，最後才修改落實定稿。其實這都是假象。

四千人（加上中央黨校 1500 學員，應有五千多人）大討論，40 多位同志討論，確實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認識和意見，而且對毛澤東問題和毛澤東思想的想法，占很大分量，但都被排斥掉了。四千人討論是在 1980 年 10 月份進行的，11-12 月初鄧力群在中央黨校做題為《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的報告中，



鄭仲兵

就嚴厲斥責黨內高級幹部在討論《歷史決議》稿時“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化言論”。

我記得，方毅說：毛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萬里說，如果誰敢對毛有不同意見，那麼你站著進去就會爬著出來。

王若水主張不寫“毛澤東思想”，只寫“毛澤東的思想”，這樣可以包括他正確的和錯誤的思想。胡喬木就予以否定，

他堅持提毛澤東晚年錯誤，與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和對立。周揚不贊成。陸定一寫信建議：“要作歷史問題的決議，需要把這些年來的路線鬥爭編一本書”，“不然，有些人將要來翻案的。”鄧小平也予以否定。

許多人認為，決議的目的，是接受毛澤東錯誤歷史的教訓。



方毅：毛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

就是糾毛的錯，所以叫“歷史問題決議”。其實，鄧小平的意圖與此完全相反。是要糾糾錯的“錯”。鄧小平直言不諱地說，寫決議“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按：當然是前者）第二，我們 32 年，特別是文化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按：當然是前者）”。現在的《歷史決議》，鄧小平是如願以償了。鄧小平說：

“這個稿子是根據一開始就提出的三項基本要求（按：是鄧小平提出的）寫的。現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項基本要求的。”《歷史決議》是以鄧小平個人的意志代替十億中國人對歷史的反思。這種以一個人的思想來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一個人的頭腦替代十億人的頭腦的作法，本身就是專制主義的。

顯然，決議不是三中全會精神的產物。恰恰相反，它是與三中全會精神相悖的。它是阻滯人們解放思想的，哪裡找得到一點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是撥亂反正，而是撥正反亂。

六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後，政治思想領域的形勢便開始逆轉。

過了一個多月，1981 年 7 月，鄧小平就開始批《苦戀》，胡耀邦被迫承擔渙散軟弱的罪責。

1982 年鄧力群在鄧小平縱容下，奪了中宣部的權，變思想解放部為思想壓制部。不久王震也奪了黨校的權，並橫掃黨校

胡耀邦勢力。

1983年，鄧小平指使胡喬木、鄧力群借茬兒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報告會，批判周揚、王若水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整肅《人民日報》。

同年，十二屆二中全會後，鄧小平發動、由鄧力群出面開展了清除精神汙染運動（被稱為“小文革”），大批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遭整肅或邊緣化；直到1985年學潮、1986年學潮，鄧小平借機整掉了胡耀邦。

這就是《歷史決議》所開闢的道路。

最後，我想到李洪林先生最近說的令人振聳發聵的話：“寫歷史決議就是人為製造歷史。為什麼要造出決議？決議就是要人服從，讓思想服從決議，這怎麼行？”

鄧小平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全黨

李洪林：我是那個《決議》起草組的成員。當時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較忙，只是起草組開會的時候去一下，具體寫東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對批“長官意志”，說“長官能沒有意志嗎？”我寫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僕，不要長官》，在《人民日報》發表，批評了為“長官意志”辯護的人。胡喬木看了這個文章很不高

興，就把我找去談話，讓我再寫一篇文章，強調領導的重要性。其實我批的是以長官自居的幹部，並沒有批領導，所以我沒有再寫。他很生氣，專門開了一次起草組的擴大會，請了一些理論界的名人來參加。胡喬木專門講話批評我那篇文章，說我只強調民主，不強調集中，會助長極端民主化。他特別強調“人民也會犯錯誤”。但那個會開的不怎麼好，他發言後，別人並沒有跟著起來圍攻我，我也沒有痛哭流涕地檢討，但也沒有起來反駁他，因為我一直對他還是尊重的，雖然不同意他的觀點，也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裡“洗耳恭聽”，概不表態。結果這次批判會只得不了了之。批判會以後，他就不再給我分派寫作任務，不過開會時起草組照樣通知我，我也照樣去參加。

後來開四千人大會，對決議草稿徵求意見。我作為起草組成員，也參加了。當時起草組成員分別參加各組討論，我參加人大常委這個組，彭真是組長。我還有個發言，主題是批評“宮廷政變”。我說，粉碎“四人幫”是一次宮廷政變，這是不合法的。當時“四人幫”已經是眾叛親離，打倒他們，大家當然都高興。但是那種做法是不對的，這會給黨內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造成一個很壞的榜樣。所以我說這只能是最後一次，以後千萬不能再這種突然襲擊的手段去解決問題了（可惜這些話說了也白說，不但《歷史決議》裡頭沒有採納，而且政變手段以後還是照

用不誤，兩任總書記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參加《決議》起草的過程就是這樣。

對於這個《決議》本身呢，剛才仲兵也講了，我覺得他對這個決議實質的分析，可以說一針見血，的確是那麼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會已經確定的改革開放的方針往前走，而是鄧小平講了四項原則以後，要用一種決議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全黨。如此深刻地發掘出這個“歷史決議”背後的政治動機，30年來還沒有人做過。

1945年在延安通過的那個《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把毛澤東的地位正式樹立起來。1981年在北京通過的這個《歷史決議》，是把已經垮掉了的毛澤東重新樹立起來。因為毛澤東是中共一黨專政的化身，要堅持一黨專政，就必須維護毛澤東這座尊神的形象。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其實就是毛澤東的衣鉢，這是中共的傳家寶，和賈寶玉佩戴的那塊“通靈寶玉”一樣，是萬萬丟不得的。鄧小平不愧是毛澤東當年親手培植的總書記，他深深懂得：在毛澤東的威信徹底崩潰之後，在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之後，如果不趕緊祭起毛澤東留下的傳家寶，擺脫了毛澤東陰影的中國人民就會進一步擺脫一黨專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會閉幕剛剛三個月之後，就發表了“堅持四項原則”的講話。其實四項原則沒有一點



鄧小平

新東西，全是毛澤東的遺產，但它又是通過鄧的潤色，並且用鄧的語言表述的。

這個決議整個起草過程，鄧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緊，曾多次向起草組面授機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幟不能丟”。在這個決議裡，雖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卻用更濃的色彩去粉飾毛澤東。所以更確切地說，第二個歷史決議所呈現的“聖像”，就是鄧小平在高舉毛旗。“聖像”是要人們膜拜的，專制體制是要樹立個人權威的。“聖像”上雖然有兩位尊神，

但是老的權威已經不在人間，所以真正樹立起來的是新的權威。新的權威是誰？自然是高舉毛旗的鄧小平。這就是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莊嚴通過的這個決議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理論務虛會是胡耀邦在思想領域的絕唱

鄧小平講的那個“四項原則”，我也是起草組的，“四項原則”是他在理論務虛會上講的。理論務虛會應該說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長的第一個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領域的一個傑作，確切地說是絕唱。這個會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中共執政以來絕無僅有的一次。理論務虛會剛開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喬木就找我找去，讓我起草華國鋒的講話。因為那個會是中央召開的，所以原來的安排是華國鋒以中央主席的身分在閉幕式上講話，以表示這個會議的規格之高。當時他們就找了我一個人來起草講話稿，沒有成立起草組。胡耀邦和胡喬木都講了講。他們整個調子都很解放，講的很詳細，我記的也很詳細。後來我一邊開會，一邊抽空起草講話稿，基本都是按照他們講的大意寫的。

務虛會第一階段開了一個月，胡耀邦的開幕詞講得非常好，大家情緒高漲。開會不久，周揚到鄧小平那裡去，又帶回來鄧對務虛會的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因此會議開得更

加活躍。在這種解放思想的氣氛下，我有一個長篇發言《領袖和人民》，主題是：“不是人民必須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通篇發言都是批毛的，同時也批評了華國鋒。這個期間我已經起草好了華國鋒的講話稿，胡耀邦和胡喬木兩人看了一下提了點意見。我又寫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

不久務虛會就休會了。

沒想到，這個期間“西單牆”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使局勢突然逆轉。“西單牆”是 1978 年夏天開始的，1979 年 1 月份，魏京生貼了一張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這個大字報本來也沒有什麼出色的內容，但明顯是針對鄧小平的。他寫這個大字報的時候，西單民主牆的積極分子，包括劉青，都不贊成。劉青當時是《四五論壇》的，他們好幾個人勸魏京生，別寫那個大字報，鄧小平正在搞撥亂反正，你批他幹嘛，轉移目標嘛。但是魏京生堅持把這張大字報貼出去了。本來鄧小平是支持“西單牆”的，原來有些老幹部反對“西單牆”，但是鄧小平支持。他說，不要鴉雀無聲。葉劍英也是支持的。所以“西單牆”辦得很興旺。一些人雖然不高興，也沒有辦法。然而魏京生這個大字報是個轉折點。1 月下旬，彭真把這個大字報送給鄧小平，鄧小平一下子火了。結果，不但魏京生被抓起來，“西單牆”也被取消了。這個事情是胡耀邦告訴我的。魏京生被判了 15 年之後不

久，胡耀邦把我和阮銘找去幫他搞一個文件。我們說魏京生寫了一張大字報就判了15年，怎麼能這麼處理？太重了。胡耀邦說，我也不贊成，但這是小平定的，我也沒辦法，彭真拿著魏京生的大字報去找小平，把小平說服了。

促進鄧小平轉變態度的因素，當然不光是魏京生的大字報。不過這張大字報很像足球場上的“臨門一腳”，把比分扳過來了。當時上海、四川等地紛紛給中央打電報告急，說我們這兒辦不了公了，亂套了。這些告急電報都在向中央施加壓力。所以，如果說魏京生貼大字報是“臨門一腳”，那麼社會上的亂象就是足球場上的混戰，這場混戰剛好使足球滾到了魏京生跟前，這才成全了他的“臨門一腳”。

鄧小平說變就變，又是絕對一言堂

那個時候是中國的思想最活躍的時候，也是社會上最亂的時候。壓制了幾十年的矛盾，一下子鬆開，當然什麼都要泛起了，這是難免的。那個時候有一種說法是“四過頭”：“發揚民主過了頭，引起了社會秩序混亂。思想解放過了頭，引起了思想混亂。落實政策過了頭，引起了階級陣線的混亂。重點轉移過了頭，丟了綱和線。”反對三中全會路線的人，抓住這種“四過頭”的說

法，指責三中全會是“逆風千里”。正好在這個時候，務虛會上刮起的思想解放的旋風席捲全國，所以這個會必然成為眾矢之的。

務虛會復會的時候是三月下旬。這時，事情已經完全變了。原來是華國鋒要在閉幕會上講話，現在改成鄧小平講話。其實中國所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都是別人起草，他們拿到會上去念，誰念都一樣。但這次卻不一樣，因為政治風向變了。原來我給華國鋒起草的稿子，已經不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所以另外給鄧小平專門成立一個新的起草組（吳江，我，滕文生，宋振庭），由胡耀邦和胡喬木帶領，到鄧小平家裡聽他的指示。

這次鄧小平對我們談話的調子，和他先前“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是 180 度的大轉彎。他一方面批評社會上的亂象，一方面批評黨內，就是他常說的“一手硬一手軟”那個意思，同時也批評了理論界。他整個談話的基本精神就是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當時一邊聽一邊想，政治家轉彎真快！說變就變。我還發現鄧小平真是“鋼鐵公司”，絕對的一言堂。連胡耀邦到他面前，都不可能有二話，更不要說別人了。記得 1962 年我隨田家英去湖南調查的時候，毛澤東曾在武漢接見調查組。他看上去一點架子都沒有，談笑風生，大家毫無拘束。可是到了鄧小平跟前，只能規規矩矩接受指示。這兩個人都是扭轉中國歷史的領袖人物，都是說一不二的“一言堂”。鄧小平

是表裡如一，斬釘截鐵，毫不含糊。然而毛澤東這個“馬克思加秦始皇”，看起來卻是那樣慈祥，那樣平易近人！難怪田家英生前長嘆：“伴君如伴虎。”毛的城府如此之深，真是深不可測！

鄧小平講話稿實際是胡喬木一個人寫的

這個新起草組從鄧小平家出來之後，再就沒有事了，根本就沒有開過會。鄧小平的講話稿實際上是胡喬木一個人給他寫的，連起草組都沒有討論過。我是一直到人民大會堂聽鄧小平講話時，才知道它的全文。

鄧小平白天剛剛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來京參



胡喬木

加務虛會的各省宣傳部長馬上連夜把這個“新精神”傳回本省，於是全國的風向立刻變了。我在河北呆過，聽河北的朋友講，省委聞風而動，人民公社剛發還給社員的自留地，又收回了。

如果用左右搖擺來形容中國政局的話，就是“左易右難”。往右擺，得費九牛二虎之力；往左擺，如順水推舟。就跟彈簧門一樣，總是向著左邊，你要往右拉開一點很費勁，可是你一撒手，它馬上就彈回去了。其實“左比右好”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左是“正路”，“寧左勿右”就是黨性強。“四人幫”往左邊跑得太遠了，搞的太厲害了，所以叫“極左”。因此才要“撥亂反正”。什麼是“正”？左就是“正”。就是這麼個局面。鄧小平的講話，中央根本沒有討論過，他個人拿出去就講，卻比中央正式通過的三中全會決議更有權威。一篇個人講話沒有經過中央討論做出決議，自然沒有法定效力，然而卻能風行全國，可見黨內左的傳統是多麼深厚，可以說已經成為這個黨領導骨幹的本能。

“文革”中有一句“表忠心”的流行語：“把毛澤東思想融化到血液裡”。在毛澤東領導下成長起來的這些高幹確實達到了這個境界，“黨性”特別強，聽到風就是雨。三中全會剛剛使中國進入溫暖的春天，“四項基本原則”掀起的反右風暴就橫掃中國大陸，政治形勢很快就逆轉了。

第二個《歷史決議》我認真看過，還參加了中央組織的傳達

組到河北省傳達過。我分到滄州地區，在全地區三級幹部大會上講了兩次。第一次講中央人事更動，集中說明胡耀邦對中國歷史轉折的偉大貢獻，當選黨的主席是眾望所歸；第二次針對與會者強烈反映的左傾流毒，著重講解三中全會路線，支持大家解放思想，批評了農村的左傾回潮風。但我沒有傳達鄧小平反覆強調的“毛主席的旗幟不能丟”。

鄧小平的“宜粗不宜細”就是為了文過飾非而掩蓋歷史。寫歷史要有“史德”，中國的史學傳統是秉筆直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都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氣，是我們中國史學最可貴的傳統。歷史無非是寫真實，按照事實老老實實寫出來就是了，做什麼“決議”呢？決議是政治性的東西，要大家都來服從。對歷史作個決議，這本身就是按照某種政治需要來改寫歷史，粉飾歷史，抹殺歷史，或者憑空捏造歷史。所以，不論第一個《歷史決議》還是第二個《歷史決議》，都是為當時領導者的政治需要服務的。當初我參加起草組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經過 30 年的風風雨雨，現在才明白過來。

我黨有傳統：鄧陳等高幹善於模仿毛澤東

徐友漁：我也談點看法，就是大家集中談論的《決議》的內

容。

討論和形成《決議》的過程，正是爭論、提倡思想解放的那段時間，上上下下各種人思想都很活躍。那時候我正在北京讀研究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按道理黨內上層討論《決議》，跟一個小研究生根本沒有關係，但我們那時候有個特殊的渠道，對於《決議》討論過程的情況有一定瞭解。社科院哲學所在當時是非常活躍的，不只是一般的研究學術的機構，更像是與意識形態有關的地方。哲學所所長是個從軍隊調來的軍級幹部，叫孫耕夫，據說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頭，副所長是在真理標準討論中介入比較深的邢賁思。他們可能沒有參加起草這



徐友漁

個決議，但非常深地捲入了對決議討論的過程，他們又是哲學所帶研究生最多的人，是毛澤東思想研究專業的導師，他們聽了情況馬上就回來給自己的學生講。我當時和這個專業的七八個同學住在一起，還有同寢室的，所以對黨內那種氣氛有一定瞭解和體會。我當初的感覺是這樣的（加上事後的判斷），當時黨內意見是尖銳對立的，一方面是保守的勢力非常強，左的觀念根深蒂固；但另外一方面，由於“文革”剛結束，那種想徹底否定毛澤東的聲音也常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有一個不成熟的判斷，如果鄧小平尊重黨內大多數人的意見，往否定毛澤東那邊走，完全有可能得到黨內的支持，是走得通的。比如我們的所長孫耕夫，他參加討論，每次他回來都講：“毛澤東差點把國家搞垮，做了那麼多壞事，整死那麼多人，現在他死了，難道大家嘴一撇就過去了？”我從他的言論中看，他絕不是民主派，也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最左的人，他代表很大一部分一般人，他們就是這麼想的。最後決議定稿的時候，給我的感覺就是給了他們當頭一棒，那種急轉彎他們實際上是很難接受的。他們不想改變這個制度，也不想改變共產黨的領導，但很多人被毛整得很慘，“文革”中受的苦，一肚子話想說出來。最後演變成《決議》、四項基本原則、務虛會氣氛和方向的逆轉，對他們來說我們能感覺到他們心理上接受不了，但是沒辦法。這是我當初感覺到的那種氣氛。

為什麼在“文革”剛結束，人們對左傾路線的痛苦還有強烈感受，黨內大多數人、黨內主流意見是要把毛澤東的錯誤說清楚、批判徹底的情況下，鄧小平、陳雲等人決定要維護毛澤東？我做了一個分析，我覺得我黨有一個傳統，高級幹部特別善於模仿毛澤東，毛澤東有一種實用的“政治智慧”，鄧小平對待毛澤東，是模仿毛澤東對待斯大林。毛澤東受了斯大林那麼多的氣，但最後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時候，毛不但要保，而且要把赫魯曉夫搞臭。他其實很清楚，他不是保斯大林，而是保他自己，保他和斯大林所共同締造、維護的那個政治制度。其實在毛的心目中，未嘗不希望有人罵斯大林，但他在盤算政治利害得失時還是非常理性的。鄧小平在這點上繼承了毛的“政治智慧”，他被毛澤東多次打倒，他未嘗沒有想有人出來罵毛的想法。但同時他有這種“政治智慧”，毛說斯大林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把“刀子”，鄧看到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搞專政的一把“刀子”。

30年前中共做《歷史決議》，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以借著對於“文革”的批判和清算，撥亂反正，把源遠流長的左的錯誤比較深刻地批判一下，把自1949年以來，甚至更長時間以來的各種經驗教訓好好總結一下，對於造成錯誤、損失的原因有一種比較正確、深刻的認識，避免以後再重複錯誤，再走彎路。可以借此比較正確地擺正黨和國家、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擺正

黨內領袖和下級、組織和個人的關係，如果能做到這樣，那麼中共就會得到人們的擁護，國家也會在法治的軌道上長治久安，這是多麼好的一件事啊！但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為鄧小平等人繼承。他們的眼界和胸懷不足，他們只關心這個黨要永遠掌握權力，所以最後弄出來的決議雖然不得不講一點“文革”的錯誤，但還是在拚命維護毛澤東，使得正確評價毛澤東這個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沒有及時解決，沒有在一個難得的、也可以說是最好的時機得到解決。

《歷史決議》有濃重“凡是”特徵

盧躍剛：1981年的《歷史決議》對毛澤東三七開評價，採用的策略是：早年肯定，晚年否定；革命肯定，建設否定；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宏觀肯定，微觀否定；政治肯定，經濟否定。成績七分，說得大實際小；錯誤三分，說得小實際大。實際上是把毛澤東“大卸八塊”，為我所用。

當年的“非毛化”至少有三個標誌，一是逮捕“四人幫”並且作為“反革命集團”審判，二是解放鄧小平及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毛迫害的老幹部，三是真理標準討論。長期以來，真理標準討論的定評是思想解放運動。這個評價是概念化的。那麼真

理標準討論的本意是什麼？首先要看當時中共面臨的是什麼問題。打倒“四人幫”以後，中共首先面臨的是“撥亂反正”，徹底解放鄧小平等被毛澤東打倒的老幹部，平反包括被折磨致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國防部長彭德懷、副總理賀龍在內的幾十年的冤假錯案，實現中共的工作重心轉移。如果不擺脫毛的束縛，所有問題都無法解決。所以，政治問題一解決，真理標準討論就結束了。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真理標準討論針對的是“兩個凡是”，為什麼真理標準討論具有明顯的機會主義特徵，僅僅是一次在既定政治框架中的有限度的黨內開明派的思想鬆綁運動。1979 年理論務虛會戛然而止並且轉向就是明證，1981 年《歷史決議》中共高層四千人大討論定的調子也是明證。

其實在中共黨內，誰也不要說誰是“凡是派”，就維護毛維護某些原則而言，大家都是“凡是派”。讓華國鋒、汪東興等獨享“凡是派”的桂冠不公正。《歷史決議》沒有濃重的“凡是”特徵？“反右”不是只能說“擴大化”？只不過此一時彼一時，此“凡是”不是彼“凡是”罷了。毛澤東屍骨未寒，接班人華國鋒就主持逮捕毛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毛決定鄧下台不到一年就恢復鄧小平的工作，不是對毛最大的不恭不敬？

鄧小平多次談話，為《決議》定調子，認為《決議》核心是評價毛，毛的調子定的好壞，關係到《決議》的好壞。本質講，是



盧躍剛(高伐林攝)

個策略。道理很簡單，不非毛化，沒法搞經濟體制改革。

鄧小平他一方面是舉毛旗，一方面又非毛化；否經濟，不否政治和意識形態。但是，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純經濟問題嗎？中國的經濟主張也好，經濟理論也好，經濟政策也好，是純的嗎？是政治經濟。只要改革，就是非毛化。只是不好或不敢這麼說罷了。

這就帶來了一個後果。就是鄧在政治上樹毛(當然很多時候也只是個說法)，經濟上非毛，言行不一，使中華民族精神分裂，社會斷裂。這就帶來了問題：今天我們在處理複雜的問題的時候，很難找一個統一的價值標準，都帶著策略的、技術的特

點，這樣看待歷史，看待具體的問題，使很多問題就混淆了，就是名實、言行完全割裂。共產黨的理論很清楚，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互相作用，政治經濟是為一體。反自由化為什麼最後不在思想領域上反，一定要反到經濟領域、科學領域去？從清汙到 1986 年底的反自由化最後都要幹下去，實際是它的內在邏輯，就是要反對“幹自由化”的。“幹自由化”是什麼？在我看來就是非毛化，是鄧小平確定的經改和政改目標。83 年耀邦、趙紫陽、方毅、萬里阻擊清汙，87 年阻擊反自由化，胡喬木和鄧力群看得很清楚，最大的威脅不是那幫思想異端的秀才，而是經濟領域“幹資本主義的”。

蕭克說《歷史決議》並不全符合史實

盧弘：對於中共中央的兩個《歷史決議》，不少人認為：都有“歷史局限”。早在 20 年前，即 1991 年，我就聽到這一說法。說這話的是蕭克將軍。

蕭克當時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的執行會長，實際指導著研究會的工作。研究會副刊《炎黃春秋》雜誌，由我擔任首任主編。有一次，我當面向蕭克報告辦刊方針和編輯思想時說：對於國內黨內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我們都以黨的兩個《歷史

決議》為準，按照它來定稿件的取捨是非。這時 1981 年《歷史決議》作出不到十年，正被人們奉為必須遵行的文件。蕭老聽到後卻明確指出：不必這樣。這兩個《歷史決議》都有著歷史局限，都只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政治需要，並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你們可以尊重它，但不必以它為準，更不能被它所限。你們記住一條，就是實事求是，一切以事實為準，按照事實說話，只要符合事實，言之有據，就應該如實說。

按照蕭老這一指導思想，我們連續編發了一些重要文章，其中一篇是徐向前元帥對黨史研究者的談話，講了些黨內軍內有爭議的問題。此文發表後我們受到指責，不應將內部談話公開



蕭克

發表，我們為此將作檢討。蕭老得知後向有關部門說，此文是他讓發表的，由他承擔責任，保護了編輯人員。這樣的事還有很多，表明他不唯上，不唯書，也不唯文件，只唯事實的有膽有識精神。《炎黃春秋》正是遵循這一精神，才越辦越好，備受矚目。

30 年來《決議》消極一面突顯出來

陶世龍：簡單介紹一下我在五柳村網站轉發有關討論的情況。2011 年 8 月 27 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 30 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時，我即注意到有與會者通過騰訊微博發布消息，當即轉發了部分微博，其後又將有關微博和其他網上的有關材料選錄編博客文件在五柳村發表。但微博在報道了不到十個人發言後，不再有消息。從胡德平先生的開幕詞來看，座談的宗旨是著重在回顧歷史，並非針對當前政策。後從郭道暉先生處得知，是因發言者超出了預定回顧歷史的範圍，而是針對現實問題的多，並互相感染有愈來愈激烈之勢，而將微博掐斷了。

8 月 28 日，我收到楊繼繩先生發來在這個座談會上的發言，當即與楊先生商定全文在“五柳村”網站發表。（因為他在發言中對《決議》批評較多，並指這個決議在很多方面違背了歷史事

實，估計不會給他公開發表。)郭道暉先生的《實現由革命黨到憲政黨的轉型，建設憲政社會主義》，因原說要發表此文的《南方周末》已明確告訴他不發表了，便也交給我發出了；王海光先生說他的發言是即席發言，以“歷史地看待《歷史決議》”為標題讓我發了。

過了一些時候，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作為主辦方發出的獨家報道，我也作了介紹；還介紹了蔡霞的《進行深刻檢討，以防文革重演》。此外，轉發了王希哲評《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30年座談，王希哲認為，不應用《決議》去壓制不同意見。

8月30日我將收錄的杜光的評論，有關微博和其他網上的材料匯集編為一個專題：“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30周年”。

後來我又發表了高瑜的《鄧小平搞〈決議〉的核心是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中國僅有思想解放還不夠》，也是因為感到現在社會上對《決議》的問題認識不足，還有不少人誤以為《決議》是胡耀邦的想法，這個澄清的工作還需要作。

綜合觀察各方觀點，我認為《決議》在30年前是對政治禁區的一次突破，“文革”中我因寫過普及太陽黑子知識而定罪，如無這個決議，下面是不敢去推翻的。而這種感受掩蓋了、忽略

了其維護專制主義的另一面。經過 30 年的實踐和歷史真相的更多揭開，《決議》消極的一面就突顯出來了，已成改革的障礙，如不加分析籠統地肯定《決議》，就會成新的“凡是”。我先後發出楊繼繩、郭道暉、王海光、高瑜等人的文章，也是因為與他們的看法基本一致。他們談得很好，我就不再多說了。

搞“文革”難道不是“分裂”黨？

張思之：聽了幾位的背景介紹和情況分析，結合《鄧小平年譜》看這份《決議》，有幾點突出印象：

一、這是在鄧的直接指揮、具體操持下搞出的一個編年體的資料匯集，基本上沒有著力於陳述、分析、總結“歷史問題”。



張思之

二、“歷史”《決議》，摻雜上眼前的事件與問題，例如批華國鋒，明白無誤地是在為鄧的政治需要服務，這是幹什麼？

三、歷史上一系列的重大問題，或敘述片面，或予以歪曲，或公然迴避。其中極為重要的如：關於抗日戰爭那段歷史的說法根本有違事實。抗美援朝，隻字未講。不說“三面紅旗”這個“綱”，按“目”分述，又略去了發動“大躍進”，強建“人民公社”的動機及其危害後果，餓死四千萬人的慘痛歷史竟敢勾銷！劉少奇不是說“人相食，要上書的”嗎？再如思想領域裡的反胡風，反胡適，特別是反右派連同反右傾，法制領域的重大史實諸如鎮壓反革命中的亂殺等等，對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無不發生了重大的歷史性作用，但在“決議”《決議》中不是走了樣，就是迴避了事！

因此，它是一個只講了一些“歷史”，但迴避了、歪曲了重大“問題”的鄧記《決議》！

特別令人不安的是，《決議》對毛的評價從根本上是不正確的。僅以他搞“文革”來說，與趙紫陽的所謂“錯誤”相比，按照中共思路，他為什麼不是“分裂”黨？“兩個司令部”之論難道是劉、鄧搞出來的？“炮轟”都可以幹，豈止幹“分裂”？“決議”說“林、江”是兩個“反革命集團”，可他分明是林、江的首腦與後台，僅僅劃為“反革命家屬”，用他慣用的句式也來套問一次：“夠嗎”？《決議》說“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

的一生來看”，他畢竟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我不得不提出問題：在長達 20 餘年的時期裡，在一系列極其重大的問題上，犯了那麼嚴重的、無法寬容的錯誤，怎麼還那麼“偉大”，而且還是個什麼“戰略家”？歷史上還有比這更為荒唐的《決議》麼？

我參觀過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黨屠殺猶太人、吉普賽人的紀念墓碑、園地，感悟歷史不僅應反思，而且要徹底。我們有一個反思後的提法，即“兩頭真”，似已得到很多贊同。不過我以為“真”的提法有點模糊。是否還應再進一步，反思是否達到了“兩頭‘對’”。如果雖不“假”但並不那麼正確，也還是立不起來。

寫出實事求是的“歷史決議”，難度大。關鍵在於有沒有正氣與勇氣。據說中共有“一支筆”，是下筆有神的才子，這並不够，因為猶缺“董狐筆”！千古以來，誰不讚佩、景仰他那筆裡的浩然正氣，真個是“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我從不懷疑，這一大段的歷史，會有當世“齊太史”重寫。

“文革”定義兩句對、一句錯

閻長貴：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評述是《決議》的重要組成

部分，而關於“文革”的定義又是《決議》“文革”部分的核心觀念。《決議》關於“文革”的定義是這樣說的：

“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個定義雖然僅有 42 個字，但它的職責和使命重大，因為出自中共中央的正式決議，它又是回答對“文革”評價的根本性質問題，內涵深刻、內容豐富，是具有政治權威的結論，需要和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所謂“文化大革命”“由領導者錯誤發動”：這是敘述歷史事實。它首次由《五一六通知》提出：“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



閻長貴

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本人對這點也毫不隱諱，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語言說：“火是我自己燒起來的。”（1966 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李宗仁說，見《毛澤東與國民黨愛國將領》）他在 1966 年 10 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說：

“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已經被選為接班人的林彪在這次會議上也說：“這個運動從頭到尾是主席發動的，主席領導的。”

所謂“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內亂”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這是承認“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後果。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種危害後果，人們還經常使用“浩劫”或“十年浩劫”來表述。

以上所說“文革”定義的兩層意思，或定義的兩個短語，在多數人中沒有什麼爭論；而“文革”定義的另一層意思，或“定義”的另一個短語，即所謂“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其爭論就多了。誰都知道，所謂“反革命集團”就是指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所謂“江青反革命集團”。所謂“文革”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就是說“文革”中的所有壞事都是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打著“文革”的旗號和名義做的，“文革”的災難都是他們造成的，他們是“文革”的罪人。當然，親自發動和領導“文

革”的毛澤東也要擔負責任，那只不過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犯錯誤”而已。這就是“文革”定義的這層意思，或這個短語（“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真正含義。

這個關於“文革”的定義，符合文革的歷史實際嗎？能夠說服人和站得住嗎？

已故文革史專家王年一先生在 2004 年 5 月 12 日一封信中談到《決議》關於“文革”的定義時說：“胡喬木說‘（毛澤東）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講政治實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實。汪東興在接受蘇采青採訪時說過：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從不上當受騙。”“說毛為林、江所利用，並無根據。‘文革’的‘偉大戰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無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確實做了壞事，但都是在毛的‘偉大戰略部署’下做的。‘文攻武衛’也是響應毛的號召。毛要武裝左派 100 萬，才有‘文攻武衛’一說。至於抓個保姆，抓個廚師，只是小打小鬧，並不決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做了不少手腳，但是打倒劉是毛下的決心，不能歸罪於江。”

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的吳法憲也說：“‘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的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說我們幾個

人(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內,對此都不是說了算的。”(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78 頁)

顯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災難的責任都推給林彪、江青(或者說: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毛澤東對江青的利用盡人皆知

在“文革”中,毛澤東對江青的利用是盡人皆知的事情。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是毛澤東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這件事是背著第一線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實際上即背著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過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做的。這把火點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沒想到的抵制。毛澤東的性格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一不做、二不休”,決心發動“文革”的毛澤東,又出新招。這就是,他利用江青懂點文藝,叫她去找林彪,所謂“請尊神”,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壇的關鍵一步棋,這樣使江青在他發動的“文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革”中更好地為他

所利用。

毛澤東為了發動和開展“文革”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書記處（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作為領導“文革”的專門機構，並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並一度任代組長），實際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組，這是在“文革”中毛澤東對江青最大的利用。

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江青極其信任，最有力的證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給江青寫信講“黑話”（毛澤東語），和1967年8月4日又給江青寫信，提出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等，這封信通過江青向政治局傳達，以在全黨、全國貫徹執行。而江青也不負毛澤東的厚望。江青作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急先鋒，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終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每一個重大戰略部署，不論是如前面所說的組織批判《海瑞罷官》，還是起草“文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五一六通知》，還有打倒劉少奇、打擊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積極響應和千方百計地變著花樣去做，所以毛澤東稱讚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批判劉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當然，毛澤東對江青也有不滿的地方，也不時地批評她，甚

至還讓政治局開會批評她，但他對江青的批評是“恨鐵不成鋼”、“小罵大幫忙”——這從他告訴鄧小平等人對江青“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的話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毛澤東從來沒有要打倒江青，而江青對毛澤東也是忠貞不二，始終如一的。在說到江青和毛澤東的關係時，江青在特別法庭的辯護詞《我的一點看法》中對著廣大聽眾公開說：“……你們借助國家名義，拚湊了一個特別法庭，給我羅織了一大堆罪名，這些罪名一條也不能成立。……古代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毛澤東與江青。

你們搞的就是這個伎倆。現在你們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要醜化毛澤東主席……現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鄉有句老百姓的話：‘打狗看主面’。就是說打狗還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們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卒子，不過，我是過了河的卒子……”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採寫《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6—277 頁）

江青辯護詞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說：你們哪裡是審判我，是審判毛主席！

江青說“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這話雖不雅，卻是江青和毛澤東關係的真實寫照。毛澤東對這條“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並且很是愛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為毛澤東的“狗”，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勢”，同時，她也是始終忠誠於其“主人”的，直到她 1991 年自殺都沒有說過一句不利於毛澤東的話。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難自圓其說

再從另一角度來看看所謂毛澤東“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我們姑且對“反革命集團”的說法不提出疑問，但卻要問：

這兩個“反革命集團”究竟是什麼時候產生和形成的？對這個問題凡經歷過“文革”的人恐怕都知道，在“文革”前並不存在什麼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我們看看官方正史的說法（《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一版，303、304 頁）——

“林彪反革命集團”：是“通過文化大革命而逐步發展起來的……1967 年夏通過‘五一三’事件和成立軍委辦事組，林彪集團初步形成。1968 年‘楊、余、傅’事件後，黃永勝任總參謀長兼軍委辦事組組長，林彪集團得到進一步發展。”1971 年 9 月 13 日後，“林彪集團宣告覆滅”。

“江青反革命集團”：“1969 年 4 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2 年 9 月，當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洪文調到中央工作，成為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核心成員，‘四人幫’初步形成。”

一個是在文革大動亂的 1967 年夏才“初步形成”，而到了 1971 年 9 月 13 日就已經“覆滅”（而文革在此後還持續了整整五年），一個是在 1972 年 9 月才“初步形成”（而文革在此前已經開展了整整六年），既然如此，說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被他們利用，在邏輯上顯然是說不通的。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

團”如果有、如果是的話，那也是在“文革”中產生和形成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和產物；現在把“反革命集團”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並列起來，甚至還要說它先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明顯違背歷史事實的。打倒劉少奇（包括批判他建國就開始推行的“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是“文革”主要和基本的內容，如此說來，是毛澤東利用反革命集團打倒反革命劉少奇，還是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打倒反革命劉少奇？這種邏輯的混亂，“文革定義”的提出者和製定者將怎樣做出令人信服的和合理的說明呢？

修一部中國共產黨的信史，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前進和興旺發達的重要工作和重要保證，而大量事實表明，這還是一項艱鉅而漫長的任務。

為給毛澤東辯護大搞文字遊戲

朱正：中共歷史上有兩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一個是1945年在延安做的，另一個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這一個，1981年做的。延安那個《決議》，現附在毛選第三卷後面了。那個《決議》很明顯就是毛澤東要反對王明過去在黨內的權威，為建立自己的權威而起草的，所以歷史上所有的錯誤都是王明他們

的，所有的正確都是他的。它實際上就反映了毛的觀點。

1981 年的《決議》是鄧小平為樹立他自己的權威，樹立他在黨內領導的合法地位。所以所有的錯誤都是“四人幫”他們的，所有正確的都是他的。由於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是毛的愛將，毛的主要助手，毛的許多錯誤他都有份，所以最後這個《決議》對毛要有所肯定。但是又不能完全肯定，為什麼呢？鄧小平在反對“兩個凡是”的時候說過：“如果按照那個‘兩個凡是’，我就不能恢復工作了。”所以“兩個凡是”是必須否定的。這就形成了這個決議的第一個亮點：就是對毛所謂“三七開”，可以講毛澤東的功與過了。過去只有人講毛澤東的功，沒人講毛澤東的過。所以說這實際上是批毛的開始，以前私下裡大家對毛的議論就很多，但是可以公開地寫文章發表來講毛澤東的失誤或者錯誤，這是從這個決議開始的。

鄧小平在“文革”中，是除劉少奇以外的第二個打擊目標，所以他也必須否定“文革”。決議提出“徹底否定文革”，否定這一空前浩劫，深得民心，也是它的一個亮點。在這個《決議》通過以後，至少在學術界，特別是研究近代史、黨史的人，就可以比較公開的徹底批判“文革”了。

但是談到毛澤東功過的劃分，所謂“三七開”，我倒想起一個比喻。我看到藍英年先生翻譯的莉季婭回憶錄，裡面引用了

阿赫瑪托娃的一句話說：“斯大林是一個魔鬼，但是口琴吹得很好”。所以我說毛澤東，他詩詞還是寫得很好的。鄧小平說的“三七開”，意思是三分過、七分功，老百姓是不是承認毛有三分功，恐怕都很難說。毛澤東最後總結他自己的歷史是“這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情是把蔣介石趕到幾個小島上去了，一件事情就是搞了一個文化大革命”。我覺得他把奪取了全國政權和“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是很有意思的，意思是沒有第一件事情，就不可能有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情就為“文革”的開始準備了劇場，準備了舞台。因此回過頭來看，他取得政權，對中國人民究竟是福祉多還是災難多，值得考慮。假如他真正給人們帶來很大的幸福，這是他的一個勝利；假如他取得全國政權以後給人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這個事情還是不是一個成績？

還有，這個《決議》對毛澤東的辯護，最好笑的就是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毛澤東本人的思想可以不算是毛澤東思想，別人講出來的主意可以算是毛澤東的思想——這完全是概念的遊戲。他們為了給毛澤東辯護已經到了一種理屈詞窮的地步，搞文字遊戲。我看過中直機關四千人討論決議的會議簡報，那些發言，有很多很精彩。比如薛暮橋，我只引他的一句話：“49年以來，我們沒有做對幾件事”。我覺得這就不是犯了多少錯、幾幾開的問題，照薛暮橋的這個說法，就是有過無功了。那麼像大

躍進餓死數以千萬計的人一類的事，就不止是有過而且是有罪了。而這個決議對於“八大”以前的事情卻採取全盤肯定的態度。例如對農業合作化、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等都是全部肯定的。這就不是一種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了。特別是今天，過了 30 年之後，我們有了開放改革的經驗以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個時候對工商業的改造，把一些守法的、規規矩矩的資本家都打垮了，現在與時俱進，出現了新生的資本家（現在資本家還可以入黨哩！），可就不那麼講規矩了。在農村裡，現在也看不到當年農業合作化的痕跡了。所以說這個決議講的這些成績並不符合事實。

“反右”大大推後民主化現代化法治化

再講一下“反右派”鬥爭，我自己就是“右派分子”，有切膚之痛。我在上述會議簡報上看到，在討論的時候，有很多人都發表要徹底否定“反右派”的意見，這個意見後來沒有被採納。決議裡說：“反右”“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鄧小平解釋“反右”為什麼必要的話更有趣，他說理由就是“有的右派殺氣騰騰”。“殺氣騰

騰”指誰呀？當年報紙上講的，就是人民大學的葛佩琦嘛。葛佩琦當時就寫信給《人民日報》，要求更正，他說我不是這麼說的，結果沒有更正。後來葛佩琦死了，開追悼會，新華社報道，黨籍給他恢復了，說他是地下黨，做了很多有益於黨的工作，等等。那麼，把葛佩琦的案子翻過來以後，還有哪一個“右派分子”說過要“殺共產黨”呢？沒有呀。鄧小平就是以一個錯誤的案例為根據，以一篇失實的報道為根據，就說“有的右派殺氣騰騰”，就說“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決議裡面說整風的時候有少數“右派分子”起來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 99% 以上的右派分子被



朱正

“改正”以後，那當年究竟還有誰真的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呢？

“反右派”鬥爭的後果是什麼呢？《決議》上說是“擴大化”，就是有多少知識分子、有多少黨的朋友即愛國人士、有多少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讓他們吃了多少年的苦頭。只看到打擊了多少人，這樣來評價“反右派”鬥爭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到位的。為什麼呢？解放以後，從土改殺地主開始，所有的運動都要打擊人（沒有不打擊人的運動），可是在打擊人的同時並沒有說要打擊這些人的思想和主張。“反右派”鬥爭則不同，不僅要把持有某種主張、某種見解的人打成“右派分子”，而且要把他所持有的這些見解打成“右派觀點”、“右派言論”，作為一種敵對的思想來批判。現在看來，很多當年“右派分子”的言論，比如說，法學界提出的獨立審判、無罪推定，現在都寫進法律，成為正確的主張了。經濟學界提出的控制人口增長速度，當年也是受到批判的“右派”言論！當時上海批判的一個“右派分子”高方，他提的一個主要觀點是講現在中國還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就是說中國經濟發展還不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所謂生產力標準問題。這個觀點一提出，當時就批判了。這個報道登在上海《新民晚報》上，毛澤東看了，叫胡喬木轉載到《人民日報》去，這就表示毛澤東也同意批判。後來十三大報告和十四大報告，都談到了所謂“初級階段”的理論，不就是這個

生產力標準的問題嗎？還有當年批判過“引進外資”，說是“賣國主義”，現在誰有本領引進外資誰的功勞就大嘛。所以我覺得，“反右派”鬥爭最大的災禍不僅是打擊了多少人，這些人只是這些政治主張的載體，打擊他們就是為了要打擊這種主張，就是要把這些主張作為“謬論”、作為敵對的言論來批判，實際上就是把中國的民主化、現代化、法治化的進程大大地向後推了。今天就應該這樣來評價“反右派”鬥爭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這個決議還故意回避了很多重要的歷史問題。比方說，1955年的“肅反”運動。這個“肅反”運動，我也是“肅反”對象。運動的規模有多大，偏差有多大，現在不用我來說，胡喬木提供了證詞。胡喬木在1957年7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我很感謝他寫了這篇社論，因為他提供了官方的數字，提供了這個運動規模有多大，偏差有多大的證據。社論上說肅反運動有四大成績（第四個成績是無法計量的，就是“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政治警惕性和識別能力”，這個我不知道提高了多少，不能說什麼）。第一個說是清查出了81000多名反革命分子；第二個說是有19萬餘名反革命分子在運動的威懾之下，投案自首了。第三個說的是，弄清楚了130多萬人的政治歷史問題，使他們可以放下包袱，好好工作了。這一條是什麼意思？很顯然，就是給130多萬肅反對象寫出的結

論是“你不是反革命分子”，換句話說，就是有 130 多萬的錯案，批鬥、折騰了一年。據他說“抓對了” 81000 多，即便如此，也不到 6%，肅反中的錯案率高達 94% 強！1955 年的肅反運動總可以算是建國以來的一大公案吧，可是這個《決議》中間一字不提，不光是《決議》，後來那個《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也是胡喬木最後終審定稿的，也是一字不提。

所以，我覺得這個《決議》實際上是很不到位的。如果要弄清楚這些問題，恐怕要有第三個《歷史決議》。但是因為前兩個《歷史決議》都是在歷史的轉折點做的，第一個是在由王明時代過渡到毛澤東時代，第二個是鄧小平取代“四人幫”的時候，現在做第三個《決議》，我覺得時機還不夠成熟。

《歷史決議》是關於歷史問題的政治決議

蕭冬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十卷裡面，關於《歷史決議》專門寫過一章，五六萬字。我認為，《歷史決議》應當這樣定義：它是一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政治決議。講的是歷史問題，但它是一個政治決議。我之所以說它是“政治決議”，有三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它是為了解決當時急需解決的政治問題做出的

一個決議。鄧小平想要用一個決議來結束黨內黨外對歷史問題議論紛紛的局面，以便集中全力搞建設。起初，鄧小平並不想急著做這件事。最早在 1978 年 11-12 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有人要求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和重大歷史事件。鄧小平說，不要匆忙做決議，因為時間越遠越看得清楚。他甚至說，有些事情留給下一代去解決。真實的考慮可能是，鄧小平感到事情比較複雜，急於觸動敏感話題，很難達成一致認識，還會招來許多麻煩。但不久鄧小平就改變了想法。那是因為葉劍英 1979 年 9 月 30 日有一個建國 30 年的講話，這個講話對 30 年歷史有一個總的評價，已經涉及到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鄧感覺到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個藍本，在這個基礎上搞出一個決議來。也就是說，有了葉的講話，鄧比較有底了。另一方面，按照鄧力群的說法，這個 30 年講話出來以後，不但沒有統一思想反而議論更多了，對毛的評價，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爭論很大，要統一思想還是要搞一個決議。鄧小平還有一個想法，要不做這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沒有基本評價，國外的投資是不會進來的。因為外面猜測中國的政局是不是又是一個周期，所謂周期就是不斷的反覆嘛！三中全會也可能不過就是歷史上不斷反覆的一個周期而已，說不定什麼時候又返回到過去了。所以，鄧說不能等，國際上在看你能不能拿出一個決議來。歷史決議達到目標沒有呢？從以

後的情況看，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目標。儘管並沒有完全統一黨內的思想，但的確從此冷卻了對歷史問題的議論，不過決議也限制了人們進一步對歷史的反思。

從政治上看，《歷史決議》要解決的是一個雙重合法性問題。一個是三中全會路線的合法性。鄧要推行他的路線，必須要作出符合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解釋，證明你搞的這一套是社會主義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更為根本，就是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這當然是現在的說法，當時的說法是“三信危機”，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要解決這兩個問題，不是沒有矛盾的。比如說，要確認三中全會路線的合法性，當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過去的一些錯誤政策，因為你搞的這些東西過去都是當作修正主義批判的呀。不批判過去“左”，你現在就是“右”。然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解釋一個“非毛化”問題。當時國內國外都有一種議論，說鄧要搞“非毛化”，國內甚至有人議論鄧是“非毛化”的頭子，鄧決不願背這個名，不願當中國的赫魯曉夫。他必須把高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抓到自己手上。從更深層政治考慮，對毛的批評也不可能徹底。如果對毛否定過多了，等於把共產黨過去的 30 年否定了，抹黑共產黨，也把自己否定了。因此鄧反覆講，要“宜粗不宜細”，要“恰如其分”。堅持把確立毛

澤東歷史地位作為最核心的一條原則，不論有多少人提出多少意見，鄧毫不讓步。當然不只是鄧，陳雲與鄧完全一致，黃克誠等多數老一代領導人都是這種考慮。

還有一個附帶的問題，就是通過對《決議》稿的討論解決華國鋒下台的問題。也許這不是最初的考慮，但至少事實是這樣。事前還沒有經過高層討論，就已經把第四個階段，把華國鋒的錯誤寫到《決議》討論稿裡面去了，而且準備直接拿到四千人中間討論。華國鋒不同意才把這一段拿下了。華的理由很正當，因為中央政治局還沒討論。然而，在四千人討論前，鄧力群就把風放了出去，說《決議》稿講了華八條，一條功績，七條錯誤。林潤青在四千人討論會上也講了這個情況。林潤青一說，大家就起鬨了，說華“你一個人有什麼權利拿掉這一段啊？”四千人一起鬨，起到了“逼宮”的作用，那四五千人是囊括了幾乎所有重要領導幹部啊！在四千人討論時，什麼問題都有分歧，唯獨在華國鋒問題上幾乎沒有分歧。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個人為華說了公道話，他說當初華國鋒上台大家還是擁護的嘛，鄧小平向中央寫信也表示“衷心擁護”嘛。其他人基本上一邊倒。華國鋒這個人是一個弱勢領導人，換成其他的強勢領導人，他是主席，是第一把手，下面誰敢說這個？當然了，不做決議，鄧也可以採取其他辦法把華的問題解決了，但《決議》正好起到了這麼個作用。

《歷史決議》對經濟改革起了正面作用

第二個意思，《歷史決議》對中國改革特別是經濟改革的作用還是正面的。《決議》通過重新闡釋毛澤東思想給實踐留下了較大空間。《決議》並沒有直接提改革、開放，實際上它也不能夠對正在進行之中的經濟改革做出結論，當時看不清楚，儘管大家說要改，但怎麼改，實際上誰都沒看清楚。但是，《決議》講“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並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於繼續前進的生產關係的具體形式。”實際上是開了



華國鋒與葉劍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幫”慶祝大會上。

口子的。我們看，中國 30 年改革實踐沒有止步於《決議》。即使從黨本身的文獻看，也已經大大超越了《決議》。首先一個是所有制的提法，《決議》講的是，國營和集體兩種公有制是“基本的經濟形式”，後來提“公有制為基礎”，後來提“公有制為主體”，後來提“公有制為主導”。它是一個不斷往後退的過程，這可以說是“與時俱進”，也可以說是“順勢而為”。《決議》只講了個體經濟是必要補充，沒有提到是否允許私人經濟存在，當時還沒有私人經濟。現在私營、民營經濟的規模已經超過了國有經濟。所以在中共十五大的提法中，私營、民營都包涵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之中了。再比如，《決議》的提法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後來提“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後來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你不承認也得承認，這就要在理論上重新闡述、重新說明，你想堅持過去的說法也堅持不住了。再比如“三個代表”，實質就是要允許資本家入黨嘛！過去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三個代表”的提出對黨的性質作了重大修改。這也是“與時俱進”，社會結構變了，共產黨要擴大它的基礎。所以實踐沒有止步於《決議》，不可能說《決議》說什麼我們就幹什麼，《決議》沒有說的就不能做。當然，鄧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很清楚的，在政治上控制，在經濟上放開。經濟上你怎麼搞都可以，

他沒有劃定一個界限。鄧小平開始就說，關鍵就是要發展生產力，只要有利於發展生產力，什麼都可以試，都可以闖。就是不斷往前走。他八十年代也講不能兩極分化，不能出現百萬富翁。但這是一個經濟現象，經濟規律，一旦放開了不可能不出現，你擋不住的，當然鄧也沒有擋呀，經濟上放得很開，但在政治體制上卡得比較嚴。

第三個意思，“歷史決議”與歷史研究應當有區隔。用“歷史決議”為歷史研究劃定界限，我認為是很荒唐的事。歷史研究是不可能做“決議”的，如果可以做“決議”的話，那還要歷史學幹什麼呢？要歷史學家幹什麼呢？我記得有句話說，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時代不同，會產生不同的研究課題和研究視角，同一件歷史事件，不同時期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讀。這很正常，歷史的魅力就在這裡。我認為，做歷史決議與搞歷史研究所要遵循的原則不一樣，做決議首先考慮的是政治需要，是政治可接受性，比如說“宜粗不宜細”，“恰如其分”。這個分寸怎麼掌握？分寸就是政治上的可接受性，或者如當時胡喬木說的，要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搞歷史研究“宜粗不宜細”怎麼研究呀？從科學研究的要求看，應當是越細越好，因為歷史的真相往往就隱藏在細節之中。歷史研究也不可能去尋求最大公約數，而是要還原歷史真相。當然，完全還原不可能，但你至少應當

朝這個方向努力。現在當代史研究已經大大超出了《決議》。從“鎮反”、“三反五反”、土改、過渡時期總路線、“肅反”、“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躍進”、三年困難、“四清”、“文革”、林彪事件等等，都有很多研究、很多觀點出現。我認為是一個好的趨勢。

我最後有一個基本看法：《歷史決議》作為一個政治決議，它的使命基本上完成了；但它本身作為一個當代史研究的對象，還是一個話題。

以後再也沒有“統一思想”這一說了

孟繁華：這是一個黨的政治決議，而且是為黨的工作服務的政治決議。剛才說它開了一個口子，這個口子到底是怎麼開的，那就見仁見智了。但是《決議》本身存在著一個誤區，就是說，它肯定或否定的某個歷史事件的是非標準，是以它建國的一種模式為標準的。譬如講，如果肯定了當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那麼是肯定了什麼東西呢？是肯定了那種全民所有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和1981年當時的思想認識水平以及現實經濟所達到的程度是有關聯的。實際上中國今後怎麼發展，最後達到一種什麼狀況，它也不清楚，所以摸著石頭過河，這真實地反映了它

的一種心態。《決議》的思想基礎從源頭上來說還是原來那種模式。按照後來的發展結果看，你就不能肯定社會主義改造了，你改造的結果是把一大批私營企業沒收了，變成國有了，現在又創建這麼大量的民間資本，你肯定了“三大改造”就是不對的。你怎麼肯定那個呢？你按照改造前的模式走下來不就完了嗎？結果繞了個大彎又轉回去了。

如果今天要做這個決議它還會不會這樣寫呢？那不可能。為什麼？並不是說現在你認識多麼高，而是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各種新的社會經濟成分產生出來了，那麼你怎麼樣描述過去那段歷史才能符合現在的情況？你或者輕描淡寫，或者



孟繁華

要承認那是一個錯誤。譬如說“反右”，也包含著這個東西（後來的“反自由化”，這個也要寫呀），寫決議的年代就有“四個堅持”，那麼你說“反右”反錯了，但是只要堅持原來那個目標，“反右”是遲早要出現的，當然程度可能會有所不同。全民所有和社會的自由發展，或者思想解放，本來就是矛盾的。人們如果自由發言，就可能妨礙你的這一套方針政策（包括你進行的改革開放），那它就會要處置你，實際上是和“反右”性質是相同的嘛，只是在程度上、範圍上不一樣罷了。所以我覺得《決議》是表現了以未來的、當時還看不清楚的某個目標來回看歷史，實際上還是以從前的意識形態為基礎來寫的，它就是一個黨為了當前工作的方便，對它自身的幾十年情況的一個總結。決議能不能起到統一思想的作用呢？當然不能。不但這個《決議》不能，今天再做一個決議還是不能——以後再也沒有“統一思想”這一說了，13億人統一不了，7000萬共產黨員也統一不了。“統一思想”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永遠過去了。

《決議》是個籠子

劉家駒：《決議》在當年是有積極作用的。1990年初我們創辦《炎黃春秋》，就是舉著兩個《決議》邁開步子的。我們的老

同志在每個會議上都講過，兩個《決議》對當時思想開放是起了很好作用的。《炎黃春秋》最初的干擾，不是來自上面，而是在群眾中間，橫向的，非常厲害。比如，我們第一期就發了批毛的文章，後來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薄一波把我們社長教訓了一頓：“杜導正呀，你們哪壺不開提哪壺，多少人來我跟前告你們的狀啊。”後來雜誌登了西路軍的問題，莫文驊把我叫到他家裡，狠狠地教訓了一頓。也有很多壓力來自各個方面軍的一些老將們，我們發表的一些文章，把這些人之間的矛盾揭開了，也招來了不少麻煩。後來為什麼出現轉變呢？是一個偶然的機會，長春的靳樹鵬收集了陳獨秀不少的詩，要找蕭克寫序，我對蕭克講了，蕭克一聽很高興，說“把他叫來，我跟他談話”。蕭克熱情地寫了序，從此我們連續發表了十幾篇關於陳獨秀的文章。新聞出版署一些老總來跟我們算賬，蕭克告訴我們：“你就告訴他們說，蕭克同志看過了。”嘿，管用！以後，找麻煩的事就少了。這就是兩個決議起的作用。以後我們還是小心翼翼。我編稿子涉及“文革”重大問題都不敢動手。比如，為了傅崇碧的一篇文章，我往他家跑了三趟，反覆核實，就怕史實不準確，給人抓辮子。2003 年以後，謝韜的文章發表了，才有了非常大的改變，比我們以前小打小鬧前進了一大步，所以說《炎黃春秋》是一步一步地闖出來了，我認為《決議》對我們的思想解放確實有很大的幫助。我是從部隊



劉家駒

出來的，過去編《解放軍文藝》，只能圍繞“偉大、光榮、正確”做文章，絕不能離開這個規範，誰發表負面文章要受到問責。恰恰在《炎黃春秋》就可以敞開來談，這確實是《決議》起的作用。

但是，《決議》越到後面越不行了。為什麼？我們發現《決議》是個籠子，很多寫歷史的文章，其中總有一些和《決議》的說法有矛盾，就會衝擊這個籠子，受到制裁。所以我覺得這個《決議》在今天已遠遠不適應了。現在全黨全社會都在鋪天蓋地思考討論被歪曲的歷史和現實問題，我希望籠子大些，包容更多人的訴求。 ■

還原鄧小平 阻撓改革開放的真相

所謂“改革開放”，對外是要開門，對內就是鬆綁，對思想，更不應施加任何束縛。鄧小平恰恰是以權力為施政的圓心，他的左右搖擺，他的倒行逆施，他對黨史重大事件的裁決和處理，一切都是圍繞鞏固自己的權威，他是自由的敵人

很早就知曉阮銘其人，中國官方媒體上他的姓名前常常冠有“文革打手”“台獨分子”等等頭銜。但他十多年前從美國前往台灣任教，很少回美國，直到 2013 年年初，這位 82 歲的退休老人才從台灣“回到”美國定居，於是我登門拜訪，請他回顧他的人生中的幾個重要階段。

按中共論資排輩的算法，阮銘堪稱“老革命”——他 15 歲就在上海加入中共，比江澤民的黨齡都長，雖然江澤民比他大 5 歲。阮銘告訴我：江澤民是在大學裡入黨，我是在高中一年級



阮銘。(高伐林攝)

入黨，入黨介紹人是一個高三學生，“我的上級是錢李仁，後來當過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和人民日報社社長。”

中共黨章不是規定 18 歲才能入黨嗎？年齡這麼小、思想尚未成熟，怎麼就能入黨？阮銘告訴我：那時地下黨對年齡沒有那麼嚴格，他還知道有一個 13 歲就入黨的黨員呢。阮銘夫人阮若瑛在一旁說：入黨不限年齡的不是光地下黨，我也是 15 歲就被批准成為預備黨員的，年滿 18 歲轉正——我是在晉察冀解放

區入的黨，但入黨時也是秘密的，當時黨並未公開。

看來，共產黨不守自己訂的規矩，源遠流長。

阮銘雖然黨齡長、資格老，但在中國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風浪中，飽受顛簸，就像坐上了過山車。中共建政初期，他就被任命為清華大學兩個系的團委副書記（後升任書記），與胡啟立、艾知生、何東昌這些後來炙手可熱的政要同堂議事；1958年，他調任《北京日報》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論部主任；1961年更調至中宣部，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因為寫了批周揚的一篇文章，他頗受陶鑄青睞，被欽點擔任調查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但隨著陶鑄垮台，阮銘也就一頭栽下，被抄家六次。改革開放初期，他應胡耀邦之邀，到中央黨校為《理論動態》效力，又擔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但隨著胡耀邦政治上失勢，他再次遭遇厄運，受到嚴厲批判，1987年被開除出黨。

阮銘對我說，“我這個人的個性就是不願受束縛，我說話隨便，想到什麼就冒出來，那時批評我最多的就是“自由主義”。

他說，自己82個春秋的經歷以1988年出國劃界，分成兩段，兩段的主題，都圍繞“自由”：

第一段是在中國的日子：自由的追求與毀滅

第二段是在美國、台灣的歲月：自由的見證與挑戰

“自由”確實就是理解阮銘命運和理念的關鍵詞。他在60多年前的1950年夏天，在北京團市委主辦的高等院校團幹暑期訓練班上發言時，講過一個故事：馬克思去世後，美國一家雜誌創刊，請恩格斯用一句話概括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恩格斯回信說，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找到了一句話：在他們所期望的未來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讓阮銘深深地折服。他在接受我的採訪時談到馬克思主義有合理成分，脫口而出的例證也正是這句話。他說：“我一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就被這句話抓住了心！”

阮銘對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搞改革開放的評價，也是以“自由”為準繩。他說：所謂“改革開放”，對外是要開門，對內就是鬆綁，“市場經濟就是要自由，把束縛的繩子解開。”而思想，更不應施加任何束縛。而鄧小平恰恰是以權力為施政的圓心，他的左右搖擺，他的倒行逆施，他對黨史重大事件的裁決和處理，一切都是圍繞鞏固自己的權威，他是自由的敵人。

阮銘的親身經歷很有獨特性，既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社會轉型的參與者，也是台灣民主走向正軌、政黨輪替的見證人。他對《新史記》記者的回憶，也涉及這兩部分內容。這裡刊出關於他談及中國大陸的部分。

鄧小平周期性地左右搖擺

新史記：阮銘先生，你是中國“文革”之後大轉折的親歷者，最敏銳地感受到當時氣氛。我讀過你的《鄧小平帝國30年》等著作，書中你寫道，鄧小平左右來回搖擺，一年偏向改革派，一年偏向專政派。那段日子我也在北京工作，也親身感受到中央的風向一年一變，單年左轉，雙年扳正——鄧小平為什麼會這樣搖擺呢？

阮銘：鄧小平左右搖擺，是以權力為中心的。多年身在高位，鄧小平將國家的權力、黨的權力，與他個人的權力分不開、分不清了——他認為他自己就是黨、就是國家。從蔣介石、到毛澤東，到鄧小平，都是一樣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我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謂一年一變，其實不離其宗：他要維護自己的權威。

人們都說鄧小平“三落三起”。這第三次，當他爭取復出時，他寫信表態：要輔佐華國鋒——葉劍英倒是真的要輔佐華國鋒，鄧小平說要“輔佐”呢，我看是假的！鄧小平看不起華國鋒。他逼華下台，實際上沒有什麼正當理由。鄧有很強烈的個人權力欲。他說過他不抓權，不想當第一把手，說要讓“年輕人”來幹，但他又要控制“年輕人”。

現在人們形成一個很錯誤的印象，說鄧小平要改革開放，

鄧小平改變了中國。實際上哪裡是這樣?!

對鄧小平,如果只看其“南巡講話”,他當然是講了倡導改革開放的話。但另一方面的話他也講得很厲害呀:反和平演變,警告“無硝菸的世界大戰”、提防和平演變中國等等。他自己誇耀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看看“鄧選”第三卷,就很清楚了!1991年之後他還說過:中國絕不能出戈爾巴喬夫。

有人說他“否定毛”,我看他沒有“否定毛”;有人說他“否定文革”,我看他也沒有“否定文革”——他把“文革”的禍害說成是“大民主”,他“否定文革”其實是否定民主,他把1989年的請願抗議風潮,也說成是“文化大革命”!

新史記:鄧小平不是在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講話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阮銘:是的。我寫過這段歷史,我參與過,知道情況。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實非常重要,但是跟鄧小平有多少關係呢?——全會前開中央工作會議開了將近一個月,工作會議前一段,他在國外,根本沒參加;出國之前他委託胡喬木寫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發言稿,但是他出訪回國之後,發現中央工作會議整個會場的氣氛與他預想的完全不同,胡喬木起草的稿子根本不能用,這才讓胡耀邦趕快給他臨時找了幾個人,連夜趕出你提到的那

篇講話稿，後來被稱爲是“給十一屆三中全會定調的報告”，但這其實是個急就章。而且，僅僅三四個月後，1980年春天，他就在理論務虛會上講話，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這才是他真正心中所想的。

改革開放的歷史始終被顛倒

新史記：你認爲中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並沒做出多大貢獻？

阮銘：傅高義在《鄧小平傳》中認爲，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我看不能這樣講。鄧小平在一定階段、一定程度上，確實對改革有推動；但是許多事並不是他的功勞，也記到他的帳上了。

例如，在鄧小平還沒有控制全部權力、還在輔助華國鋒的時候，葉劍英、鄧小平和胡耀邦，還有谷牧這些人，都在華國鋒領導下工作，那時就開始搞開放了呀，被陳雲批成“洋躍進”，這種批評，我看沒有什麼道理！陳雲批得最厲害的無非就是要引進十幾套化工、化肥、化纖成套設備。過去毛澤東自誇我們中國“沒有外債”——那時是想借外債也借不到啊！到了華國鋒時代，外國願意借錢、願意投錢了，當時要投資 100 個億，現在看起來，也算不了什麼！這些項目，雖然是華國鋒最後批准的，但是

當時鄧小平、胡耀邦都贊成。——胡耀邦就很光明磊落，沒有把責任推給華國鋒，而是承認自己有份。

新史記：胡耀邦批評華國鋒搞“兩個凡是”。

阮銘：“兩個凡是”當然是錯的，但是華國鋒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自己認錯了嘛。我對胡耀邦的觀感是，他對華國鋒很尊重。因為他與華國鋒“文革”前就在一起共過事——那時胡耀邦下到湖南，他認為華國鋒這個人很務實，重視生產，重視經濟。華國鋒並沒有反對改革開放啊，在理論務虛會上，華國鋒是支持胡耀邦的，反倒是鄧小平打擊理論務虛會，讓胡喬木起草了那個



鄧小平與胡耀邦在一起。

“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

這段歷史，我覺得，始終是被顛倒的！

後來陳雲向改革開放發難，對特區都說是“租界”，要廢掉，鄧小平覺得這樣不行，才又偏向改革。但是碰到專政問題，鄧小平總是向陳雲屈服的：1981年的中央工作會議，1983年的批胡耀邦，1985年的全國黨代表會議……在政治思想領域，黨內高層一發生爭論，鄧小平要麼附和陳雲，要麼一聲不吭。

像胡耀邦等黨內改革派的處境，我看，在葉劍英參與中央事務的時候還好一點——葉帥是支持華國鋒、支持胡耀邦的。如果華國鋒不下台，改革派的處境可能更好一點。回過頭來看，胡耀邦能發揮作用的時候，還是在華國鋒時期；華國鋒被鄧、陳搞下去了，黨內保守勢力馬上就把矛頭指向胡耀邦了。

這個歷史後來又重演了一遍：胡耀邦一下台，他們馬上就將矛頭指向趙紫陽。

胡趙自己可能不醒悟，但是我作為旁觀者，是很清楚的！

華國鋒並未阻撓鄧小平復出

新史記：記得把華國鋒整下去時，說他的一項錯誤是多次阻撓鄧小平復出。

阮銘：不是這麼回事！華國鋒並未阻撓鄧復出，他主要是強調，“文革”剛結束，震動很大，在全國範圍內要讓人民轉彎，要有一個過程。那時要否定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判，並不容易。

真正不願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是汪東興。我親耳聽見汪說過：“鄧小平有什麼了不起？他那兩下子根本就不行！”汪東興那時的口氣很大，因為他覺得抓“四人幫”是他的功勞——確實也應該說，他與華國鋒是起了主要作用，他們倆首先有這個念頭，華國鋒才去找葉劍英商量，行動中主要也確實是靠汪東興的8341部隊。所以後來把葉劍英抬得很高，汪東興就不太服氣。後來外面傳得更多了，又是王震、又是鄧小平……其實當時連李先念也與此事沒有關係；鄧小平得知“四人幫”被整掉的消息比我們這些人還晚，他得知了，才給華國鋒寫了兩封信——跟給毛澤東寫“永不翻案”的信一樣肉麻。

新史記：有一個說法：鄧小平、胡耀邦與趙紫陽是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

阮銘：是的，現在一般人認為，鄧、胡、趙在一起的“三駕馬車”，是中國最好的時候——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他們三個人，每人的想法都不一樣，趙紫陽當時與胡耀邦也有矛盾。當然後來“六四”，趙紫陽遭到那樣的打擊，有些事現在就不提了。

新史記：胡績偉晚年口述寫書《胡趙新政啟示錄》，有人要他在

書名最前面加個“鄧”字——“鄧胡趙”，說這樣國內說不定就可以出版了，但他堅決不肯加這個字。

阮銘：是啊，胡績偉當然最瞭解情況，他知道不是那麼回事嘛！

像吳江這些人都認為，陳雲最懂經濟，鄧小平和胡耀邦都不懂經濟。我看，鄧小平是不太懂經濟，對一切問題他都是從政治著眼，還是毛澤東的那一套，搞平衡。他自己講，鄧力群是不改革開放的，胡耀邦是不反自由化。但他認為，經濟上不改革開放，是可以原諒的，政治上不反自由化，是不能原諒的。所以他不能原諒胡（耀邦）趙（紫陽），卻能夠原諒胡（喬木）鄧（力群）——毛澤東也是這樣，對左派就比對右派寬容得多。

他們這一夥勢力——主要是陳雲、王震、李先念、姚依林、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要陳雲出面，向鄧小平施加壓力，要鄧小平支持他們。我後來看鄧力群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他寫得非常清楚，自誇自己的功勞，所以那幾年逢單，是他們將鄧小平拉過去，跟陳雲站在一邊了，就是馬克思主義；逢雙呢，就是鄧陳有點不一致了，馬克思主義就不行了——鄧力群這本書，很能驗證我自己親歷的那段歲月。當然，他這本書現在也是不讓出版、不讓流通的。

新史記：中共多年來總是認為：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



華國鋒雖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但為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決策付出很多努力。

題。

阮銘：對，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的。

鄧在政治上是毛的繼承人

阮銘：否定毛澤東，肯定鄧小平，現在不僅是中國的潮流，也是世界的潮流。有人對習近平不滿意，說習要將毛與鄧都肯定，他們極力要求全盤肯定鄧，全盤否定毛。實際上，鄧在政治上是繼承毛的。

那一年，我受命參加起草葉劍英的國慶 30 周年的講話，把黨史理了一遍，要否定所謂“黨內 11 次路線鬥爭”。那次講話是由葉劍英出面講，但精神、內容實際上是由鄧小平控制。本來我們起草人對“高饒聯盟”，對“反右”，對“反右傾”，都要否定，但是鄧小平不同意我們的意見——只要他有份參與的運動，他都不同意否定。像整高崗、饒漱石，是他和陳雲兩人去向毛澤東告的狀嘛——毛澤東後來都沒參加整高崗的會，讓劉少奇去主持——鄧小平堅持不給高饒平反；對“反右”是最典型的了，鄧小平堅持說“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承認“擴大化”，非要留下幾個人不平反。只有 1959 年批彭德懷的那次廬山會議，鄧小平因為打乒乓球摔壞了腿沒去參加，既然跟他無關，他才同意徹底否定。

這些問題，只有到將來公布了歷史檔案，才能真相大白！

現在中共黨史把毛、鄧、江、胡這麼排下來，胡趙那一段主政的歷史，都被勾掉了。傅高義那本書，把胡耀邦寫得很不堪，

說他“像個蟋蟀跳來跳去”——當然，傅高義費了很大工夫，對鄧的許多細節掌握了很多……

“上海不為天下先”

胡耀邦這個人胸懷是很寬宏的，他在講話中、批示中，一直都非常支持趙紫陽的工作——他甚至支持鄧力群。鄧力群日子最不好過的時候，是發動“清除精神汙染”受到上下抵制和批評、最不得人心那一段，連鄧小平都對鄧力群很不高興——後來鄧小平的態度才又變了。海內外都罵鄧力群之際，胡耀邦接見外賓時把鄧力群找去一起見，對外賓介紹說，這是我們黨和國家在理論方面的主管。

當時有人說胡啟立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不以為然，說胡啟立雖然在團中央跟我在一起，但是提拔胡啟立的，是鄧小平。胡啟立被派到天津去當市長，讓鄧小平覺得滿意，就提到中央來了——鄧有這個特點：從一件事看人。對王兆國不也是這樣嘛，鄧小平聽了彙報說王在“文革”中抵制“批鄧”，就一下把他提到那麼高。

胡耀邦就不是這樣的。後來王震到黨校來，說胡耀邦在黨校有個“智囊團”，他發狠要打掉這個“智囊團”。胡耀邦說我

哪裡有？確實，胡耀邦不出面保那些被看成是他的人。

胡耀邦有軟弱的時候，他的度量也大，能够容忍反對自己的人。可是你這麼對人家，人家不是這樣對你啊，他們是時時、處處挑胡耀邦的毛病！

新史記：胡耀邦與趙紫陽有時也意見不一？

阮銘：胡耀邦覺得，既然讓我當總書記，我不能只管黨務——他是非常重視經濟的，特別是農村經濟、地方經濟。當時的經濟，講是講改革開放，其實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趙紫陽呢，認為自己身為國務院總理，就得統管全國的經濟。

胡耀邦到下面各個縣，鼓吹發展地方經濟，各地當然也巴不得發展，但爭先恐後，肯定突破陳雲提倡的“計劃經濟”，趙紫陽也不高興。這樣到1981年中央工作會議，是胡剛當上總書記後主持的第一個會，他沒有講話。那時陳雲已經發話批判兩個東西了，一個是經濟赤字，實際上也批判了趙紫陽，再一個是波蘭團結工會。他的矛頭對著胡、趙，也是對著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黨和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的。那次會上，鄧、趙完全是投降，鄧小平讓鄧力群起草講話，“完全同意陳雲的意見”，表態說要退、退夠！——陳雲主張經濟零增長。胡耀邦只好不作聲，但他心裡是不贊成的。

那時我寫了關於特區的報告，我主張特區不要放慢，還要加快發展。胡耀邦一看，馬上批轉下去。後來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他們看到了，才鬆一口氣。

陳雲、胡喬木他們都是攻擊特區的，陳雲至死都不去特區。這些問題上，鄧小平搖搖擺擺。我寫了那個報告之後，陳雲對特區仍然反對，鄧小平也仍然不吭氣。直到1984年，鄧小平自己去看了，才後悔沒有將上海定為特區。

那時我跟童大林他們也去了廈門，當時廈門經濟很落後，特區也很小——珠海、汕頭、廈門……80年代初都是中國很落後的地方。如果要是選在上海這樣的從30年代以來就是中國管理得最好、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一旦搞成特區，那影響就非同小可！

那年鄧小平視察了廈門，又開了14城市包括上海的會議，胡耀邦找了阮若瑛的弟弟阮崇武來參加北京這個會，阮崇武當時是上海副市長。那天上午胡耀邦找阮崇武談，說上海要是帶頭開放，就會大大加速中國經濟發展。中午阮崇武就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打電話通氣傳達耀邦的講話，但陳國棟是聽陳雲的呀，他就說了一句話：“上海不為天下先。”

所以上海就還是依然故我，按兵不動！一直拖到了1991年、1992年。本來八十年代中期就可以起飛的，14城市包括上海



阮銘的內弟阮崇武
曾經擔任過公安部長和
海南省委書記。

呀！陳雲的勢力控制住上海，動不了，耽誤了多少時間！

記得我 1988 年是從北京經上海到美國的，在上海住在重慶南路。那個時節，上海跟我上中學的時候相比就沒什麼變化——我離開了 40 年呀！直到 1992 年以後，才面貌大改觀。

不搞設計的“總設計師”

我那個特區報告，胡耀邦批給特區會議，但是他們還是聽陳雲的，不聽胡耀邦的，特區會議開過之後，福建的項南給我寫信說，他們分明是要限制特區，而不是發展特區。

說到阮崇武，後來調到公安部當部長。1986 年那一次學潮，

鄧小平也是不惜流血啊，幸虧胡耀邦不肯。當時阮崇武叮囑我們說，你們千萬不要去天安門，鄧小平說了，去一個抓一個，不惜流血！後來下起大雪，學生還是去了天安門。阮崇武弄了一些大車，把學生送回學校去了。

有人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自己都說：誰設計了？他的“貓論”，“摸論”，哪是設計？改革開放，一是對外開門，就是引進資本、管理；一是對內鬆綁，市場經濟，就是要自由，把束縛的“繩子”解開就好了。要說鬆綁，是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他們起的作用更大。

習仲勛離開廣東之後，省委書記袁南生他們就很困難啊，因為陳雲給他們念“計劃經濟緊箍咒”。那時他們做膠鞋，袁南生給我看過一個陳雲的批語：膠鞋只許出口，內銷一雙就是賣國——他就是這麼批的！陳雲就是這樣的人！

廣東後來派了任仲夷去，形勢才又好轉了。他把秘書雷宇派到海南島去，也幹得很好。但是任仲夷、雷宇、項南，三人都被陳雲他們一夥幹掉了。

對專制派，信而不用；對改革派，用而不信

新史記：如果當時胡耀邦態度更堅決一些、對圍攻更強硬一

些……

阮銘：鄧小平支持胡耀邦，胡就敢講話；但是只要陳雲欺負胡耀邦，鄧小平就一言不發。在胡遭受圍攻、比較困難的關頭，鄧小平都不作聲。最明顯的一次，就是1982年，十二大剛剛開過，陳雲他們要把胡耀邦搞掉，開第一書記會議時，鄧力群已經布置下去了，準備了很多拱倒胡耀邦的材料，當時是葉帥旗幟鮮明，堅決反對他們這麼幹，鄧小平才下令都封存起來了。

陳雲很厲害呀，整倒胡耀邦，他是想讓鄧力群上。鄧小平說，鄧力群是要把我們往左拉，往左拉可以，但是總書記還是要讓趙紫陽當。趙紫陽又被整下台了，鄧小平還是不讓鄧力群和李鵬上，另外找來個江澤民。這就是鄧小平！因為他覺得，胡趙有自己獨立的見解，是右的；鄧力群也有獨立見解，是左的。可以容忍左的，但是不能讓他當總書記——這跟當年的毛澤東如出一轍，毛澤東信任江青，但他心裡明白：江青他們要是掌權，天下會亂；但又不能信任鄧小平，於是就找來個華國鋒。

江澤民是很糟糕的，幹的時間最長，比鄧小平主政的時間還長，造成的腐敗最嚴重。

新史記：鄧力群倒還是敢跟鄧小平頂的，鄧小平要他在會上表態，說一句支持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件，他居然當面拒絕說“我不說”。鄧小平也拿他沒轍，只說：你不說，有人說。



鄧小平曾經九上《時代》周刊封面，但是阮銘認為，他的貢獻被大大誇大了。

阮銘：是啊，胡耀邦就不敢當面頂鄧小平。他要頂的話，早就完蛋了！這也就說明了，左派可以頂鄧小平，右派不能頂他。

鄧小平早就要拿下胡耀邦

新史記：1986年胡耀邦去主持起草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決議，當時給我的感覺，是想“挖牆角”，把鄧力群控制的地盤爭奪過來，在意識形態、觀念更新等領域爭取主動。

阮銘：因為別的不讓胡耀邦搞啊！連政治體制改革，鄧小

平都指定趙紫陽來抓。這個時候的鄧小平，已經不是像 1980 年那樣主張搞黨和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了，而是要搞行政改革，所以交給趙紫陽，搞黨政分開那一套。胡耀邦沒有什麼可作的了，但他還有幻想，因為他 1984 年搞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得到鄧小平的高度讚揚，所以他想搞一個精神文明方面的決議，跟普世價值得軌，肯定人類的優良傳統。搞這樣一個決議，也不致於觸碰一些政治制度的敏感話題。

新史記：如果沒有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式上的那場爭辯，導致鄧小平強硬地要保留“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國 1986 年底到 1987 年初的風向是不是就不會出現那麼大的逆轉，又連鎖反應到 1989 年？

阮銘：歷史的走向，不會有根本不同。如果不發生那一場爭論，鄧小平可能會按照原來的盤算，到十三大上再拿掉胡耀邦，而不會提早整掉他；但是就拿掉胡耀邦而言，是鄧小平早就下了決心的——主要還是為權力問題。鄧小平對胡耀邦表示：在十三大上自己要全退，胡耀邦表態贊成，還說自己也半退。鄧當時也當面許諾了讓胡半退，但私下裡，他卻跟王震這些人講胡耀邦同意他全退。所以王震才那麼大膽，跑到黨校去公開地講：誰讓鄧小平下台，誰就是“三種人”！（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定下黨內清理“三種人”：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

搶分子。——高伐林注)

還是趙紫陽聰明啊，他一聽鄧小平這麼說，馬上回答：你不能退。

新史記：我聽到一個說法，楊尚昆得知鄧小平要全退，就說，你要退的話，你放心，我們還不放心呢。楊尚昆是暗指趙紫陽（當時鄧是軍委主席，趙是軍委第一副主席，楊是軍委常務副主席）。

阮銘：這是很可能的。在拱倒胡耀邦問題上，楊尚昆是非常活躍的。胡耀邦被迫辭職，黨內反應很強烈，紛紛質問，薄一波就讓胡喬木、鄧力群趕快炮製材料，把“生活會”上的批鬥發言拚湊成胡耀邦的“十個問題”，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後來又陸續發下去五個“補充材料”。楊尚昆在軍隊的傳達最出格，竟把胡耀邦說成向鄧小平“搶班奪權”，比喻成同林彪一樣。楊的講話稿曾印發軍隊高級幹部，影響極壞，鄧小平讓他收回——鄧雖然對胡耀邦不滿意，但是他知道胡耀邦不是這種人，那些說法講的完全不是事實。我們有親戚在軍隊裡，得知這些情況。

我覺得鄧小平最開始的設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的目的還是要走向“均富”。倒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更壞。他跑到華爾街去敲開市鐘，把高盛引進中國，壓低農民工的工資，讓圈地的地產商發財……中國腐敗的高峰，還是江澤民時代。

他的兒子、李鵬的兒子也都是那個時候起來的。趙紫陽的子女也有經商的，哪有他們搞的那麼厲害？王震、胡喬木的孩子更厲害。

江澤民時代是中共最腐敗的時期。說中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誰是“先進生產力”？過去說只有勞動創造價值，當然不全面，但是到了江澤民時代，變成勞動不創造價值，只有資本才創造價值——只有華爾街創造價值。後來爆發金融海嘯，我看追禍源就要追到華爾街和江澤民。市場經濟並不會自動符合公平正義的準則呀，亞當·斯密就另外寫了《道德情操論》，現在的經濟自由主義分明就是反自由、反平等的！

自由是一生的追求

新史記：我注意到，你高度強調自由的意義，你的自傳，書名就是“尋找自由”，這或許是你對自己一生經歷和志向的高度概括？自傳第一部（上下冊）的標題又是“自由的追求與毀滅”，你在半輩子生涯中多次經歷過蔣介石、毛澤東，以及八十年代鄧小平對自由的摧殘。

阮銘：我覺得，自由，是所有價值追求的核心，是最根本的價值。我一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就深深地被他這句話抓住了心：每一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必要條件！馬克思的話有

合理成分，這句話我至今非常贊成。

新史記：是個人本位還是民族本位，是當前國人爭論的焦點之一。

阮銘：有個人才有民族，鄧小平否定人權，只有國權；否定人格，只有國格。但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如果不建立在尊重個人的基礎上，就都是假的：不尊重一個一個的中國人，怎麼可能尊重整個民族呢？台灣也是這樣，國民黨搞中國的民族主義，民進黨搞台灣民族主義——互不相讓，真打起來怎麼解



陳水扁(右)接見阮銘。

決? 只能靠拳頭、靠槍炮導彈來解決了!

現在那些經濟自由派、新自由主義, 我看, 都是偽自由主義。自由應該是每一個人的自由, 不能有了資本的自由, 勞工就失去自由。只要有一個人不自由, 就沒有自由。自由與平等, 是不應該對立起來的。

新史記: 你從這個意義上, 將自由派與左派的訴求結合起來: 應該每個人都平等享有自由權利, 才是真正的平等?

阮銘: 平等不等於平均——每人的天賦不一樣啊, 不可能都平均。我說的是, 要給予每個人平等的機會。羅爾斯說社會對殘疾人、對弱勢者, 要給一些照顧。亞當·斯密主張讓市場自動調節, 但人性有貪婪的一面、功利的一面, 他指出了市場不會自發地產生道德——華爾街這些人就是典型。格林斯潘的書裡有一章寫到“虛假性繁榮”, 美國的虛擬經濟超過實體經濟的幾十倍, 這個就是“虛假性繁榮”“非理性繁榮”。美國應該追究那些公司搞的衍生產品, 我看對格林斯潘也應該追究, 問題的根子, 就在他當權的那些年“非理性繁榮”, 他明明知道啊。(《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

阮銘小檔案

1931年出生於中國上海，15歲（1946年）加入中共。1948年考入燕京大學，後併入清華大學，擔任機械、水利兩系學生黨總支書記、團委副書記（後任書記）。1958年調任《北京日報》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論部主任；1961年調至中宣部，後任調查研究室主任。

“文革”後1977年調至中共中央黨校，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中央文件、領導人講話起草。1987年，被中共開除黨籍。

1988年，前往美國，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做訪問研究。1997年到台灣，在淡江大學任教，2002年取得中華民國國籍，2004年至2006年被聘為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他是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

著有《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鄧小平帝國》、《中共人物論》、《兩岸統一百年大計》、《透視總書記》、《民主台灣 vs. 共產中國》、《從寧靜革命到寧靜建國》、《歷史的錯誤——台美中關係探源》、《我看台灣與台灣人》等書，以及自傳《尋找自由》（第一部）。

不能用今天的形勢 要求當年的鄧小平

專訪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

多次聲稱要推進政治改革的鄧小平，卻沒有對政改邁出實實在在的步子。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對此的解讀是，鄧怕亂——他不同意有些外國人說鄧完全反對民主，反對政改。“鄧認為，只有在安定、團結的局面下，才能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如果 1979 年、1980 年鄧小平以非常嚴厲的措施來懲治腐敗，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面。因為當時很多幹部的主要問題，是怕錯，不敢幹，不想幹，寧可不幹事，也要不犯錯。鄧小平只能是鼓勵他們大膽改革，他當時沒有別的辦法嘛。”美國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傅高義 (Ezra Vogel) 在接受《新

史記》記者專訪時，非常強調我們必須還原到鄧小平當政時期的環境、他面臨的主要難題，才能正確、公允地評價鄧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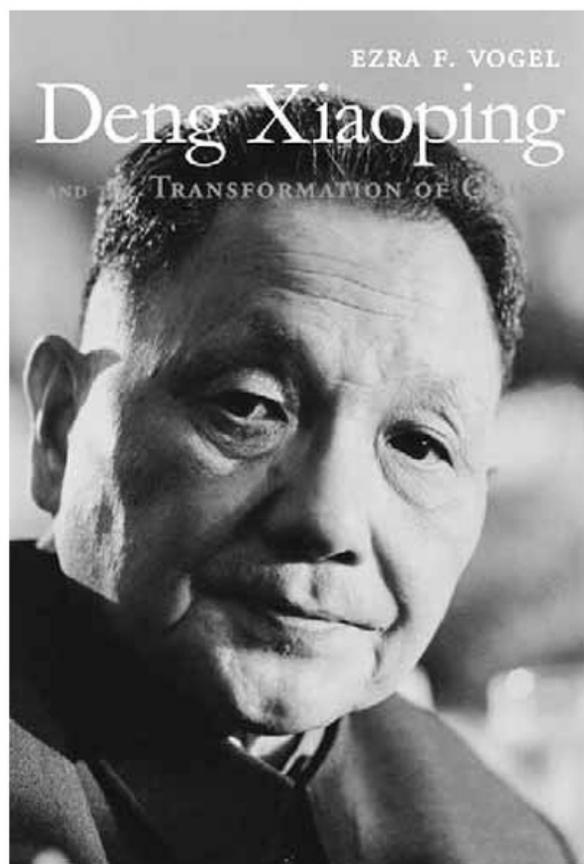
已高齡 81 歲的傅高義教授，既是“中國通”，也是“日本通”，用流利的中文回答提問。幾乎每次回答完，都以這句話作結：“我是這麼看的。”

1979 年，傅高義教授所著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造成轟動，32 年後，這位東亞歷史權威推出了他潛心撰寫 10 年、900 頁的新書——《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傅高義 1958 年取得哈佛大學社會關係博士學位之後，傅高義前往日本學習日語、進行研究，1961 年至 1964 年間，傅高義在哈佛擔任博士後研究員，開始學習中文和歷史，接著留在哈佛任教，教授日本和中國社會等課程。

在此期間，傅高義曾任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國際事務中心美日關係項目主任等多個組織的領導者，並出版多部日本、中國相關著作，1993 年至 1995 年，傅高義暫時離開學校，擔任華盛頓國家情報委員會負責東亞情報事務的官員。

傅高義爲了這本鄧小平傳，前前後後共在中國待了 12 個月。拜訪了鄧小平的家庭成員、同事及其家人、歷史學家，包



《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英文版。

括江澤民、李銳、錢其琛、鄧小平女兒鄧榕和鄧林、陳雲的子女陳元和陳偉力、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和胡德華等；也採訪了異議人士，光是書前的感謝名單就長長一串。為更瞭解鄧小平的經歷，傅高義教授探訪過鄧小平的出生地四川省廣安縣、鄧小平打游擊的江西瑞金、山西太行山、1949年至1952年間鄧小平主掌西南半壁的基地重慶和成都……等等。

《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出版之後，受到廣泛重視，其中關於鄧小平並非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六四”鎮壓讓中國保持了穩定等觀點，也引起紛紛議論。《新史記》第六期刊出了本刊記者柯宇倩對傅高義的專訪（見本書），2012年5月1日，在傅高義教授即將啓程前往訪問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之前，百忙之中，接受《新史記》記者的電話專訪，重點闡述了他對鄧小平的思考和評價。

兩千多年來最根本性變革之一

新史記：傅高義教授，您好！您這次去香港，主要是為您關於鄧小平的新書中文版出版的事宜吧？

傅高義：是的。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我這本書的中文版，大概5月18、19日就要發行上市了。我這次去去香港，還要去新加坡、台灣和澳大利亞。我還考慮與中國大陸一家出版社談談，是否能基本按照我的意思，在大陸出版這本書，現在正在討論之中。如果大陸同意基本按照我的意思，我很樂意這本書能在大陸出版，與大陸讀者見面。不過，香港已經決定，將出版簡體字、繁體字兩種版本。

新史記：同時出版？

傅高義：我不是很清楚，應該基本上是同時的吧。

新史記：我們得到的消息是，這本書是由翻譯家馮克利教授翻譯的？

傅高義：開始是馮克利先生翻譯，他很能幹，但他太忙了，後來香港一些編輯部人士也參與校訂，參與的就不只是他一個人了，但主要是他翻譯的。（2012年5月中旬，傅高義新著中文版在香港出版了，書名為《鄧小平時代》，馮克利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譯校）

新史記：您在尊著中說，鄧小平領導下中國發生的結構性變革，“是中國兩千多年以來最根本性的變革之一”。您是從中國歷史的長時段、以歷次重大變革為參照系，來衡量鄧小平領導的變革的。

傅高義：我不是歷史方面的專家，不如中國和美國的歷史學家。但根據我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像漢朝漢武帝時期，中國走向富強，就有制度化的原因——依我看，秦始皇沒有怎麼建設，而漢武帝對建立中國組織和制度有很大貢獻；再如科舉制度，毛澤東要的是“又紅又專”，不僅要專業知識，更在前面加上了政治標準；鄧小平的做法是，中國人只要有能力就能參加考試，這就回到了科舉制度——宋朝的科舉制度專門是為了選拔官員，而鄧小平恢復的考試，不僅僅是為了選拔官員，而是廣

泛普及到科技、經濟等各行各業。1949 年之後也有考試，但是那時候政治條件十分重要；全面擴大到各行各業，都完全按照能力，這一制度的確立，還得歸功於鄧小平。

辛亥革命，將中國過去幾千年的帝制基本改變了。但是蔣介石時代沒有組織好，後來就垮了；毛澤東很多方面也不成功，“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失敗了。1949 年共產黨執政之後，雖然建立了很多組織，但是，還是鄧小平時代，才有了以建設強大國家為目標、而不是幹革命的固定制度。

鄧對毛：服從，但保持距離

新史記：鄧小平與毛澤東兩人 40 多年的複雜關係，是中國二十世紀後半期最令人關注的問題之一，在某些重要的歷史關頭，他們的關係直接左右了中國政局；其路線交鋒，也成為中國發展路向爭論的主軸，影響深遠。鄧小平對毛澤東的真實看法如何？

傅高義：鄧小平從其革命生涯一開始，一直到“大躍進”年代，都很崇拜毛澤東。1920 年代後期，他在廣西百色發動起義，想創立蘇維埃政權，結果完全失敗。他來到江西，發現毛澤東建立的政權很成功，鄧有自己的甘苦，瞭解這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他看到毛澤東寫的文章說，共產黨要取得勝利，需

要很嚴明的紀律、很嚴格的組織，成員都要聽從領袖，服從組織，在軍隊裡面也要這樣。鄧小平相信這些確實是取勝的保證。他出於這樣的考慮，一直到“大躍進”時，對毛澤東都是服從的——跟國民黨打內戰時，毛澤東要求他做什麼，他都馬上去做，即使部隊有很大傷亡，他也要堅決遵從毛澤東。1957年“反右”也是這樣。鄧小平的內心到底怎麼想，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他要聽毛澤東的話，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去做。

但是到了“大躍進”，他發現毛澤東的政策確實發生了問題：對待彭德懷的做法不行，對老百姓的做法也不行啊。1959年時，鄧小平心裡產生了矛盾：第一，他還是要聽毛澤東的話，第二，他為了中國的前途，要考慮另外的途徑。

在這種矛盾中，鄧小平採取什麼做法呢？毛澤東說了的，他得照辦；但是，保持一些距離，就可以按照自己認為對中國前途有利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文革”初期毛澤東不是說嘛：我講話的時候，鄧小平坐在後面，離我很遠，他不太聽我的話。我認為這就是鄧小平採取的策略：一些事情，他不告訴毛澤東。因為一告訴了，毛澤東發話了，他就得聽毛澤東的話。要是不講呢，就可以自己根據實際情況來解決問題。我想，這就是1959年到1966年的情況。

“文革”中，他對毛澤東的想法，因為沒有材料，我們沒

法說。但是我估計，他對毛澤東是非常不滿意的，特別是在1966年。但是沒辦法，毛還是領袖啊，毛發了號令，他一定要緊跟。他1956年去莫斯科，看到了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引發的震動，鄧小平認為那對共產黨的權威、領導地位，都產生了非常大的衝擊。所以他在毛澤東去世、自己復出之後決定：不能全盤否定毛澤東，這是為了中國的政治穩定。我個人認為，他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出於這種考慮，他保護毛澤東的名譽，來維護共產黨的領導。簡而言之，1979年到1981年，鄧小平主持搞出了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就是把毛澤東放進博物館，稱讚“非常好，非常好”，但是呢，在具體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採取鄧小平自己的一套做法——我認為，這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新史記：也就是說，鄧小平之所以搞出“歷史決議”，是他1956年看到了蘇共全盤否定斯大林，產生了嚴重震蕩，他要吸取教訓？

傅高義：是的，不僅是鄧小平這麼認為，那段時間很多人、很多黨員，都在說、在警惕“中國的赫魯曉夫”，雖然毛澤東犯了不小的錯誤，產生嚴重後果，但還是要保住他、保住中國領導人的權威，要避免變成對前任領導全盤否定的赫魯曉夫——鄧小平1956年就理解了這一點，高層也討論過。

東亞諸國都走權威主義道路

新史記：您對鄧小平的成就給以高度肯定，尤其是在開放國門和經濟改革方面。您在尊作中 *Deng's Place in History* 這一章，對鄧小平歷史功績的全面描述，給人深刻印象。不過，有評論認為：鄧小平沒有開展對歷史、特別是對“文革”的徹底清算，這影響了中共徹底放下包袱，告別過往，以全新的姿態走向未來。對這種看法，您如何回應？

傅高義：這個問題，涉及一個矛盾，就是您書面向我提問中後面的那個問題：我們在對歷史的研究探求中，有時會感到追求歷史真實與堅持自己的價值理念的矛盾。

我們西方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都需要民主，都需要人權。蔣介石時期，就有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專家批評蔣，不能容忍他那套壓制民主的權威主義。這是從我們自己的道德標準來看待的；但是，我作為一個學者，應該很坦率地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來說話。

我認為，必須考慮個人的道德觀念對整個國家的發展進步有什麼好處。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很多國家發展起來了，我研究這些國家的發展過程，在我看來，比較成功的，都遵循權威

主義的方式。日本的明治維新是這樣，日本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也是這樣，是按照權威主義、而不是按照民主主義方式來實現現代化的。韓國、新加坡，都不是完全按照民主主義思路，而是按照權威主義思路。因為轉型，出現的問題太多，社會太亂了，需要強有力的領袖。所以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鄧小平沒辦法完全按照民主國家的做法來解決問題。

腐敗情況現在看確實很嚴重，但是當時——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面臨的主要難題是，做一點事很危險，幹部做事時怕這怕那。鄧小平“文革”後再次復出之後，想得最多的是讓幹部大膽幹事。他千方百計地鼓動他們：幹事出了錯，是小錯，沒什麼了不起；對腐敗，他也覺得不必管得太死。按照當時情況，他沒有別的辦法。

現在有很多人說，腐敗發展到這麼嚴重，是因為鄧小平對腐敗放任，我認為，1979年之後，腐敗問題無法避免，鄧小平只能抓住當時的主要難題，沒有別的辦法。

5月20日之後鄧小平別無選擇

新史記：對鄧小平歷史評價的最大爭議，是在對1989年學生運動的處置方式上。您在書中做了回答。不少學者對您所說的

“鄧小平鎮壓之後讓中國保持了穩定”的說法，表示不能接受。

傅高義：我認為，在 1989 年 5 月 20 日之後，鄧小平可能確實是沒有別的辦法了。但在之前，並不是這樣。要是自己下台讓別人來做，要是 1988 年沒有犯價格放開的錯誤的話，可能就沒有“六四”的問題了。5 月 20 日，他下令調軍隊用和平方式來恢復秩序，但學生和市民不讓部隊進城。以後，為了控制局勢，鄧小平別無選擇。這是太可惜、太可惜了。

1989 年到現在的 20 來年，中國非常成功，經濟發展很不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對外的地位也提高了。我認為，不能說鄧小平當時是對的，他在“六四”之前的一些事情沒有做好，但是到“六四”時，他沒有別的辦法了啊。

新史記：您在研究過程中，讀過了黎安友、林培瑞等教授聯合整理發表的“天安門文件”（Tiananmen Paper，明鏡出版社出版了其中文版，書名為《中國六四真相》）吧，您如何看待這些文件？

傅高義：我很仔細地看了他們這本書。我早就認識黎安友、林培瑞，都是很好的朋友。學中文的時候，我與黎安友是同班，關係非常好，現在也是；林培瑞曾經是我的學生，他聽關於中國的課，第一課是聽我的課。對他們兩個人，我個人是很佩服的，他們公布這些材料，是做得對的。但其中文件的情況不一，有的無疑是可靠的，可以從別處查證、核對；另外有一些

材料，例如那個“八人會議”，用電話——我知道鄧小平是不太用電話的，不太可靠，我個人是懷疑其真偽的。關於此事，有很多材料還沒有發表，我不能斷言到底對不對。

鄧不反對政改，只是怕亂

新史記：鄧小平對選擇接班人是怎麼考慮的呢？

傅高義：我分析，八十年代初，他認為胡耀邦非常能幹，也做了很多事情，但1986年他對學生運動軟弱了一點，所以為了保持國家的權威和秩序，鄧小平就放棄了胡。對趙紫陽，1988年經濟出現波動，高層保守的那些人不支持趙紫陽，迫使鄧小平考慮，將趙作為接班人，合適不合適？我認為，趙紫陽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貢獻非常大——這兩個人，胡耀邦與趙紫陽，我個人都非常佩服；但是一個領導人，儘管貢獻非常大，但不能受到中央領導人的支持，這就是問題。鄧小平就得另外考慮，選拔別人來北京。

新史記：不少人認為，多次聲稱要推進政治改革的鄧小平，卻沒有對政改邁出實實在在的步子。您在大作中以及回答媒體採訪中指出，鄧小平不是反對政治改革。但是他怕中國亂，主張先有安定、和諧，再搞政治改革……

傅高義：是的，鄧小平主要就是怕亂。如果情況允許，他還是可以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他認為，只有在安定、團結的局面之下才能啟動政改。有些外國人說他完全反對民主，反對政改，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現在許多中國人能上網瞭解國家和世界大事，也能到外國實地觀察，有了對比，他們發現自己的政府透明度不夠，產生了懷疑；後來發現政府沒有說真話，就不相信了。我認為，在提高老百姓的素質之後，政府必須提高透明度，更多地實行民主，也應該更嚴厲地處置腐敗——現在當局也在反腐敗，但是做法不是很有力、很堅決。為了贏得和保持老百姓的支持，應該做出改變。當然不能太快，太快了，情況一亂會控制不住，但是我認為，應該漸漸地提高透明度，漸漸地讓老百姓更通暢地表示出自己的意見，慢慢地實現民主。這不是為了讓外國人滿意，而是為了中國自己的成功。

怎樣看待對鄧的非議漸多？

新史記：鄧小平 1992 年的南巡講話，對於今天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鄧小平當時也是著眼於與美國抗衡和競爭的，中國目前果然成為美國最大競爭對手，這是否對

美國推行的世界戰略和主導的世界秩序構成挑戰？

傅高義：第一，不管美國反對不反對，中國都會發展；其次呢，有了美國幫助，中國會發展得更快。打個比方說吧，我們當教授的培養了一個非常能幹的學生，比我們還聰明，研究比老教授做得更好——在我看來，這是非常值得高興的，我們應該培養，對我們沒有壞處啊。

美國能幫助中國的老百姓富起來，我認為是非常好的事情；中國發展了，對全世界的發展和秩序，也是好事。

雖然中國也算美國的競爭對手，我相信，兩個國家能處理好這個問題。當然雙方有軍事上的防範，彼此之間有不信任，甚至還存在發生衝突的危險……但基本上，與中國合作，對美國有好處，對中國也有好處。中國的立場，與美國不可能一樣，有的方面可以說是“威脅”，但是兩個國家還能合作，也能處理作為競爭對手的問題。

新史記：與您剛剛著手準備寫作這本書的那段時間相比，最近十多年來，我們聽到了中國民眾和知識精英對鄧小平的路線、他的成敗功過，有了更多的非議，認為他的路線給中國帶來的問題越來越明顯。您如何看待十多年來對鄧小平評價的這種變化？

傅高義：一個國家富起來了，這個國家人民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人們的要求，是從現在的局面中產生的，是針對現在的

情況的，但是並不符合鄧小平剛當政時面對的主要問題。例如剛才我說的腐敗問題，如果 1979 年、1980 年鄧小平以非常嚴厲的措施來懲治腐敗，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面。因為當時很多幹部的主要問題，是怕錯，不敢幹，不想幹，寧可不幹事，也要不犯錯。鄧小平只能是鼓勵他們大膽改革，他當時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嘛。

對待民主，也是一樣。當時中國非常窮，最急迫的問題、多數老百姓最大的願望，是要擺脫貧困，對民主的要求不是那麼緊迫。現在不同了，人民富起來了，知識水平越來越高，所關注的問題越來越多。我記得我第一次去中國是 1973 年，當時老百姓什麼都怕；1980 年我在中國呆了兩個月，我找老百姓談話，他們都不敢說什麼。這麼多年來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我們現在可以坦率地談很多問題了，但當時不可能。我認為，不能用今天的形勢來解釋、來要求鄧小平當時的決策，當時的局面下，他盡到了自己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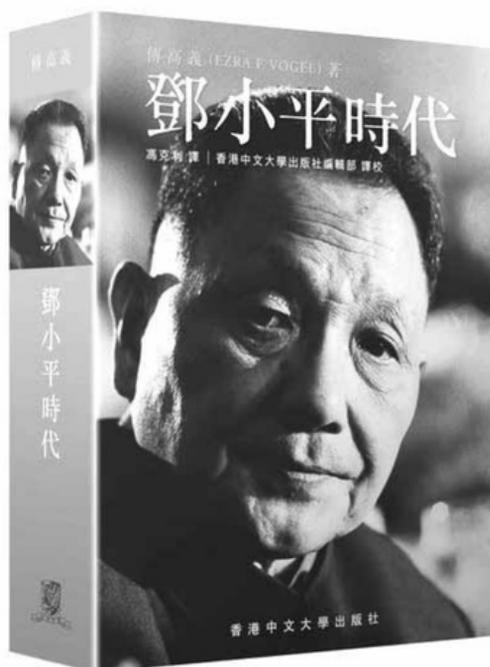
新史記：我們在對歷史的探求中，有時會感到追求歷史真實與堅持自己的價值理念的矛盾、認同某種群體利益（例如愛國）與認同某種普世觀念（例如自由、民主）的矛盾，內心有很大的衝突。您是否也遇到過類似的矛盾？

傅高義：對，我有這種體會。“六四”的時候，看電視，我覺

得當局的做法太錯了，太糟了，怎麼能採取這樣的辦法啊！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如果當時沒有軍隊來控制亂局，行不行？我考慮，國家能做的事情，不能完全按照我自己個人的期望來判斷；歷史的進程，不能完全按照個人的道德來分析，還得考慮複雜、具體的實際情況。你說得對，這裡面是存在矛盾，要承認這個矛盾，但是沒有辦法來一勞永逸地解決。

研究者撞上“保密”問題

新史記：許多學者在研究中國問題時，都撞上“保密”問題。



傅高義新著的繁體中文完整版書名為《鄧小平時代》，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關於鄧小平的檔案資料，有很多迄今在中國大陸仍屬保密範疇。您在收集資料中有何突破？

傅高義：我相信，美國人很多關注鄧小平的人，並沒有看過很多關於鄧小平的材料。我看過的很多材料，比方說于光遠所寫的關於 1978 年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還有朱佳木（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曾先後擔任胡喬木、陳雲的秘書——編者注）等人所寫的材料，我相信很多美國人以前沒有看到過。還有關於 1975 年——我看到一家中國研究所一批人寫到那年的事，雖然在中國已經出版，但是很多美國人也不知道。我想利用這些材料：關於 1975 年的情況，關於 1978 年的工作會議，在英文資料中本來沒有。

還有，很多美國人，對鄧小平當年的處境瞭解得不夠。比方說，1969 年～1973 年，鄧小平在江西考慮什麼問題？雖然材料不多，只有他女兒的一些文字，但是如果瞭解了當時鄧小平的處境，也瞭解了鄧小平個人的思維方式，就能夠推導、分析。我認為很多美國學者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

現在有很多秘密材料，我還沒有看到。例如，1978 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華國鋒的態度，可能有很多材料，葉帥、李先念，等等一批人，我沒有看到；再如 1988 年，關於價格闖關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對趙紫陽批評得很厲害，我也沒有看到；

1988 年到“六四”期間，關於對趙紫陽的看法，例如戈爾巴喬夫來到北京後不能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歡迎儀式，因為學生占據廣場，現場很亂，認為趙紫陽應該負責任……等等這一類材料，我也還沒有看到。

還有，1976 年，毛澤東去世以後，鄧小平對自己恢復工作怎麼考慮？當時他就已經預見自己早晚要取代華國鋒，還是後來才考慮的？我也沒有看到什麼材料能說明。我相信他這麼聰明，在 1978 年恢復工作以前，應該是考慮過取代華國鋒。但是因為沒有史實依據，我無法下什麼斷言。

許多檔案還沒有公開，如果公開了，以後的學者會比我做出更正確的評斷——歷史的發展應該就是這樣的。

我現在所考慮的是，要是現在中國的一家出版社願意出版我的書，我的主要的研究成果是不是都能夠完整體現？我的英文書中、在香港出版的中文版中，是不是（有些內容）在中國大陸不方便談得很清楚？但我主要的看法，希望能在今年 7、8 月在中國大陸出版——如果順利的話。我也希望跟你、跟別人、跟很多學者討論這些問題，不知能不能實現？這是我的希望吧。

談中國人不能談的，不是壞事

新史記：您還會繼續研究鄧小平嗎？

傅高義：我現在沒有更多的計劃，我已經 81 歲，能做什麼事，我要看身體怎麼樣？當然我對鄧小平有興趣。如果我能在大陸出版這本書，能跟大陸的朋友繼續商談，在兩三年之內，能看到新的材料，我的身體也允許，我想，至少這本書應該充實修改。現在沒有計劃寫新的另外的書。

新史記：最後一個問題：您採訪過那麼多人，包括鄧小平的子女們、中國高級領導人，這本書出來之後，他們有什麼看法？

傅高義：我還不太知道。但我估計，一些知識分子朋友，像李銳，像《炎黃春秋》的一些朋友，他們可能會覺得我對鄧小平的評價不夠嚴格；一些領導人，會覺得我把太多的秘密、太多的矛盾都寫出來了，是不好的；但是我也估計，他們會覺得一個外國人，對中國有好感，這麼寫，比較客觀——“親中派”麼，有一些問題，中國人不能談，我能談，這也不是壞事。寫完這本書之後，我沒有直接跟中國領導人談話，這裡說的，都是我的估計。你對我的估計怎麼看？

新史記：我想，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程度並不是個個都很好，所以他們是否看過……

傅高義：那當然！但他們有中央編譯局啊，我估計，他們會

及時地翻譯出一些重要的章節，給領導人看。我想香港出版了中文版之後，一定會有不少中國領導人看到這本書。

新史記：感謝您花了這麼多時間來回答我的問題。祝願您的亞洲之行順利、愉快！

傅高義：謝謝！（《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附：《鄧小平時代》大陸版少了什麼？

傅高義傾十年心力完成的巨著《鄧小平時代》於 2013 年 1 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在中國大陸首度公開發行了簡體中文版。

《鄧小平時代》一書英文原著於 2011 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2012 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未經刪節的中文版，譯者為馮克利。港版全書約 58 萬字，其中註釋 6.1 萬字。三聯書店的大陸版仍採用了馮克利的譯本，但對內容進行了刪節。

大陸版正文較港版刪節約 5.3 萬字，其中包括“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Key People in the Deng Era）一文約 2.6 萬

字。附錄部分，大陸版的註釋從港版的 105 頁縮減為 78 頁，索引由港版的 39 頁縮減為 11 頁。

在給《紐約時報》的郵件回覆中，傅高義坦承了他對《鄧小平時代》大陸版的看法。他表示，三聯書店能夠獲准出版《鄧小平時代》中文版並保留了他想表達的核心內容（占原著篇幅 90% 以上），令他感到欣慰。他稱讚三聯書店“努力地呈現了所有我想要表達的核心內容”，“當我抱怨我想說的話被省掉的時候，他們（三聯）有時會想出辦法把（我想說的）話說出來。”

傅高義還確認了他與三聯書店達成的協議，即三聯方面保證將大陸版所有的刪節之處告知傅高義並做出說明，而且不添加傅高義原話之外的任何內容。這一承諾從《三聯生活周刊》對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的訪談中，可以得到佐證。《紐約時報》曾就《鄧小平時代》一書在大陸出版的情況聯繫三聯書店置評，但三聯方面表示不便就此接受採訪。

客觀地說，大陸版《鄧小平時代》對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南巡前後對改革停滯的不滿、鄧小平子女的腐敗傳聞等敏感話題並未避而不談。那麼，正文部分蒸發的約 2.7 萬字都涉及怎樣的內容？這無疑是一個瞭解今日中國歷史敘述禁區及出版審查紅線的難得機會。筆者在認真比對《鄧小平時代》英

文原版、香港中文大學版和三聯書店版的基礎上，將《鄧小平時代》大陸版編輯取捨的主要思路歸納舉要如下。

黨內的矛盾和鬥爭

《鄧小平時代》記載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共高層領導人之間存在的矛盾，如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矛盾，華國鋒和鄧小平的矛盾，鄧小平與陳雲的矛盾等。在大陸版中，對這些矛盾的描寫被不同程度地刪減和淡化。例如：

第2章《放逐與回歸》(Banishment and Return, 1969–1974)中，兩段對毛澤東既不喜歡周恩來，又離不開周恩來的心態的描寫，第5章《靠邊站》(Sidelined as the Mao Era Ends, 1976)中對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的冷漠態度的描寫被刪去。

第12章《重組領導班子》(Launching the Deng Administration, 1979–1980)中寫道，葉劍英反對華國鋒去職但最終向多數意見妥協，後來葉帥病重時鄧小平沒有禮節性地前去看望他；以及為了更順利地使華國鋒下台，鄧小平分階段施加壓力——這些暴露中共黨內分歧的細節也被刪去。

1980年代後期，主張大力改革的鄧小平和主張穩健的陳

雲在 1984 年之後分歧日益明顯。為了弱化這種分歧，第 14 章《廣東和福建的實驗》(Experiments in Guangdong and Fujian, 1979–1984) 部分刪去了對陳雲保守態度的刻畫，例如“與此同時，廣東的幹部則認為他(陳雲)始終是個讓他們頭痛的人。幾乎所有的高幹都去過特區至少一次，對特區的成就予以表揚，祇有陳雲和李先念不去。陳雲每年都去南方過冬，比如杭州和上海等地，但他總說自己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去廣東。”

類似對鄧小平和陳雲分歧的淡化處理在第 14 章節中出現了 3 次，第 16 章中出現了 7 次，在第 22 章(由於內地版將第 20 和 21 章合併為一章，所以英文版和港版是第 23 章，內地版是第 22 章)《終曲：南方之行》(Deng's Finale: The Southern Journey, 1992) 中也刪節了部分有關二人矛盾的內容。不過，在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一文中，也強調了鄧陳之前合作的一面。他寫道，“鄧小平和陳雲還是在這種路線分歧中儘量做到了和平相處。”

鄧小平 1992 年南巡前後，黨內改革與保守路線的鬥爭也成是大陸版《鄧小平時代》努力迴避的一個話題。傅高義認為，鄧小平 1992 年南巡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使江澤民站到了改革者的行列中。有軍方要人出席的“珠海會議”是其中一個重



鄧小平和胡耀邦在一起。

要事件。大陸版刪去了大半有關珠海會議的內容，如鄧小平會上“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是在做事，但其實他們沒有做任何有用的事”的嚴厲講話，及“如果江澤民不推行改革，得到軍隊擁護的鄧小平將用喬石來替換他”，“江澤民向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的賈慶林索要珠海會議錄音”等。不過，大陸版第 22 章中仍保留了與“珠海會議”相關的一個段落（大陸版第 626 頁）。

天安門事件的經過和細節

大陸版《鄧小平時代》將原著及港版的第 20 章《北京之

春: 1989年4月15日至5月17日》(Beijing Spring, April 15–May 17, 1989) 和第21章《天安門的悲劇: 1989年5月17日–6月4日》(The Tiananmen Tragedy, May17–June 4,1989) 合併為第20章《北京, 1989》。

在描述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 傅高義英文原著中使用了“鎮壓”(crackdown)、“悲劇”(tragedy)、“災難”(catastrophe) 和“人類的苦難”(human suffering) 等詞彙, 但沒有使用西方世界形容天安門事件的另一種流行說法“屠殺”(massacre)。大陸版《鄧小平時代》對傅高義的表述進行了弱化, 描寫6月4日的“鎮壓”(The Crackdown) 一節, 標題被改為“清場”。此外, 大陸版用“六四”代替了港版中“天安門事件”一詞, 來稱呼這場政治運動。

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內容是大陸版刪節最明顯的一部分(比港版少了約一萬字), 不過該事件的大致經過基本得到保留, 包括以下十六個標題: “胡耀邦去世”, “騷動的根源”, “從悼念到抗議”, “四二六社論”, “李鵬和趙紫陽的分歧”, “為戈爾巴喬夫的訪問做準備和絕食抗議”, “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 “戒嚴令和趙紫陽離職, 5月17–20日”, “戒嚴受阻, 5月19–22日”, “準備清場解決, 5月22日–6月3日”, “籌組新的領導班子”, “強硬派學生的堅持, 5月20日–6月2日”, “清

場，6月3-4日”，“溫室中的一代和被推遲的希望”，“天安門意象的力量”，“假如”。

下列內容則被不同程度地刪減：悼念胡耀邦的天安門抗議與1976年悼念周恩來的“四五運動”的類比；“四二六社論”加劇衝突，李鵬的生硬態度和趙紫陽對學生的同情（如“李鵬的態度甚至無法贏得官方媒體的支持”，而趙紫陽在5月3日和4日的兩次重要講話則“像是一個長者去勸說本質還不錯的孩子”）；鄧小平接待戈爾巴喬夫時因為廣場局勢不斷惡化而將餃子從筷子上滑落下來的細節；趙紫陽和一批自由派退休幹部——李昌、李銳、于光遠和杜潤生——為避免暴力鎮壓做的最後的努力；趙紫陽去職和被軟禁的細節，比如他在廣場對學生說話時“聲音顫抖，眼含淚水”；趙紫陽試圖寫信給鄧小平，解釋他與戈爾巴喬夫說過的令鄧氣憤的話，並於同一天被軟禁；鄧小平決定使用武力，如何在高層領導中取得一致，如何準備坦克，裝甲兵車，把遠距離的軍隊運送到北京；軍隊在6月4日夜間行動的經過，等等。

對於1989年6月3日夜至4日凌晨鎮壓的描寫，未刪減的港版有1283字，而大陸版只有325字。此外，對於傷亡數字，原著提供了6種版本：中國官方估計的200多人，李鵬對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說的310人，遇害

人之一丁子霖的母親截至 2008 年搜集到的近 200 個姓名；外國觀察家估計的 300 人至 2600 人，外國媒體報道的，“被嚴重誇大的”的上萬人；以及外國武官的估計和來自北京 11 所醫院的報告的 478 人；但大陸版只保留了中國官方報告的 200 人以及外國媒體的上萬人，並指出那是“嚴重的誇大”。

對領導人的評說

大陸版《鄧小平時代》中對有關中共高級領導人評價的內容字斟句酌，其中不乏“為尊者諱”的情況。

傅高義用“喜歡報復(vindictive)”、“邪惡狡猾(devious)”等詞語來形容毛澤東，而這些詞語在大陸版中被弱化。他在第 2 章《放逐與回歸》中寫道，“毛澤東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領袖，都是個強勢人物。他功高蓋世，整起好同志來也毫不留情；他精於權謀，任何人在對他的評價上都很難做到不偏不倚”（英文版第 54 頁、港版 47 頁）。這句話在大陸版中被改為：“毛澤東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領袖，都是個強勢人物，任何人在對他的評價上都很難做到不偏不倚”（大陸版第 67 頁）。序言部分也有類似的刪節，如“在他統治的 27 年間，毛澤東不僅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也毀掉了很多知識

分子和老幹部”。

針對周恩來的一些負面情節也被大陸版略去。例如，在第2章《放逐與回歸》裡，傅高義寫道：“周恩來對文革受害者的幫助是有限的。周恩來在1956年一次政治局會議後曾惹惱毛澤東，他當時私下對毛說：他從良心上不贊成毛的經濟政策。自從那次受批評後，他在長達15年時間裡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讓毛澤東找到理由懷疑他沒有全心全意貫徹毛的意圖。儘管如此，毛澤東在1958年1月還是對周恩來大發脾氣，他說周恩來離右派只有50步遠，這一斥責讓周恩來進一步退縮。”又如，第2章中，“並非人人都把周恩來視為英雄，例如陳毅的家人就對他沒有保護陳毅很氣憤，一些沒有得到周恩來幫助的受害者家屬也有同樣的心情，還有一些人說他助紂為虐，對於‘文革’的浩劫難辭其咎。”（英文版第66頁、港版57頁）

大陸版剔除了第16章《加快經濟發展和開放步伐》中對鄧小平1988年推行物價闖關失敗的批評：“鄧小平宣布進行全面物價改革這一決定，後來被證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價最高昂的錯誤”，以及“83歲的他已經遠離了群眾”（英文版第470-471頁、港版420頁）。

不過，與“為尊者諱”相反的是，大陸版淡化了原著對胡

耀邦和趙紫陽的正面評價，如在第 16 章《加快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步伐》中，傅高義寫道：“在智囊團為趙紫陽工作的人，都十分尊重和欽佩趙紫陽，他們喜歡他毫不做作的隨和作風，不拘一格，廣納賢言的開放態度，以及把想法轉化為推動國家前進的實際政策的能力。” 這段話在大陸版中被刪去（英文版第 455 頁、港版 407 頁）。

港版第 20 章《北京之春：1989》寫到李鵬“固執而又謹慎”的性格，與“熱情且富有同情心”的胡耀邦，或“超然而具有紳士風度和分析才能”的趙紫陽形成鮮明對比，而在大陸版中，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性格描述被刪去（但保留了李鵬性格“固執而又謹慎”的說法）。不過，在“胡耀邦去世”一節中，對他的正面評價仍然被保留：“群眾能夠長久被胡耀邦感動，不僅因為他熱情親切，還因為他做人正派，對黨忠心耿耿。他是知識分子的希望，曾為他們做過勇敢的鬥爭。他是他們心目中好幹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無任何腐敗劣跡。他曾長期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能夠與他所培養和提攜的年輕人打成一片。”（大陸版第 567 至 568 頁）

此外，書的末尾“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一文包含了傅高義對陳雲，鄧力群，胡喬木，胡耀邦，華國鋒，李先念，毛遠新，任仲夷，萬里，王洪文，習仲勛，葉劍英，餘秋裡，趙紫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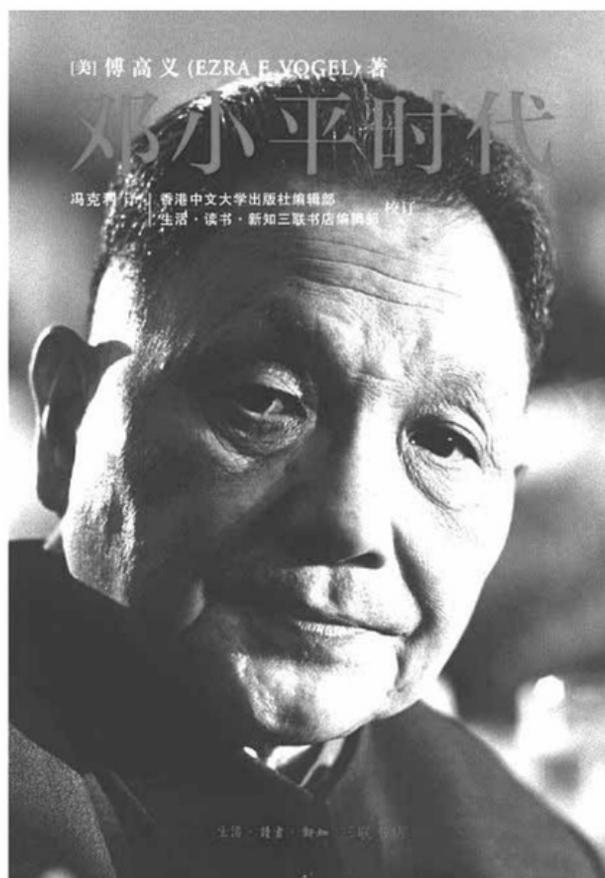
生平和他們個人性格的簡介，而這個 2.6 萬字的部分在大陸版中被省去。

一些極富爭議的國際人物和事件

對於中國與波爾布特 (Pol Pot) 的關係、1979 年中越戰爭，齊奧塞斯庫 (Nicolai Ceausescu) 之死及東歐劇變這些極富爭議的國際人物和事件，大陸版《鄧小平時代》也進行了刪節。

第 18 章《為軍事現代化作準備》(The Military: Preparing for Modernization) 寫道，鄧小平為了遏制蘇聯與越南的軍事合作，要通過攻打越南來展示不惜一戰的決心。當越南出兵柬埔寨之後，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請鄧小平派兵幫助柬埔寨。儘管波爾布特的暴政受到西方的強烈譴責，鄧小平依然決定與他合作。第 9 章波爾布特的名字和第 18 章對越戰爭的一些細節（如戰爭之後，鄧小平指示大量中國軍隊在邊境駐紮，對越南人進行騷擾），以及高層領導人對對越戰爭的不同意見在大陸版中被刪去。

第 22 章《穩住陣腳》(Standing Firm) 寫到，羅馬尼亞領導人、中國的老朋友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子因為向平民開槍被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鄧小平時代》簡體中文版。

槍決。中國媒體對齊奧塞斯庫的向平民開槍未作任何報道；當齊奧塞斯庫被槍決兩天後，《人民日報》在第四版下方簡短地發布了一句話：“羅馬尼亞電視台 12 月 25 日宣布，羅馬尼亞特別軍事法庭宣判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子死刑，這一判決已經得到執行。”

又如，原著第 22 章中對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及中國反應的記載，“波蘭在 1989 年 6 月 4 日以公投的方式選

出議會，東德於 1989 年 10 月 7 日爆發大規模抗議，1990 年 2 月蘇共全會討論放棄黨對權力的壟斷，這些重大事件都被中國媒體淡化和掩蓋。”在大陸版中，中國媒體對東歐劇變的蓄意淡化也被淡化為兩句話：“通過《參考資料》上每天從西方媒體翻譯過來的材料，中國的官員要比一般的群眾更瞭解真相”，“儘管中國的領導人在向民眾報道蘇東劇變時動作遲緩，但很快就根據新的現實調整了其外交政策。”

註釋中的禁書

傅高義撰寫的《鄧小平時代》旁徵博引，其中也引用了一些在大陸尚無法公開出版的著作。在大陸版中，這些涉及禁書的註釋被大量刪減，但也有一部分被保留了下來。

曾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的、周恩來生平研究專家高文謙所著《晚年周恩來》一書，在第 2 章英文註釋共出現了 19 次，大陸版中被悉數刪去。

張良、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林培瑞(Perry Link)編著的《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是很多學者研究天安門事件使用的重要史料，該文件集在英文版註釋中出現了 26 次，但在大陸版中僅了 1 次：它與《李鵬六四

日記》，另外兩位學者的論文和著作，《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的著作一併出現在第 20 章的註釋 12 中。《天安門文件》被刪減的 25 條註釋中，有 12 條對應的正文被刪去，其餘 13 條則保留了引用內容，但將出處單獨刪去。《李鵬六四日記》英文版註釋出現 19 次，內地版 12 次，刪減的 7 處相應引文均被刪去。

根據趙紫陽軟禁期間口述整理的《改革歷程》（Prisoner of the State），在英文版中出現 12 次，大陸版出現 1 次。其中 4 條註釋被單獨刪去，引文保留，其餘 7 條則與對應引文一齊刪去。《杜導正日記》在第 19 章出現了 3 次，但註釋與引文都被刪除。

原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雖然在第 20 章中的註釋被刪去，但在第 14 章註釋 7 和第 19 章註釋 59 中得以保留。

第 17 章《台灣，香港和西藏問題》註釋 102 中提到的王力雄著《天葬：西藏的命運》和蘇紹智、陳一咨、高文謙編《人民心中的胡耀邦》也被保留下來。

儘管大陸版刪節了 5.3 萬字，對於很多大陸讀者來說，它還是披露了大量的細節，許多關於 1980 年代中國歷史的敘述在大陸公開出版物中都屬首次出現。讀者仍然有機會從書中

領略到歷史及歷史人物的真實和複雜。對於在出版審查中生活，並建立了“自我審查”的筆者，大陸版中許多保留的內容已令筆者感到意外驚喜。

參考資料：

1. [美] 傅高義 (Ezra F. Vogel) 著，馮克利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輯部 譯校《鄧小平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 傅高義 (Ezra F. Vogel) 著，馮克利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譯校《鄧小平時代》，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香港；
3.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y Ezra F.Vogel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2011 (李慧敏, 《紐約時報》) ■

鄧小平不是啟動改革的人

傅高義眼中的鄧小平，歷史地位相當高。他認為，鄧小平在提升百姓生活水平與影響世界歷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鄧小平知道鎮壓會導致糟糕的結果，但不這麼做，國家可能分崩離析。鄧小平的領導方式對後來的中國領導人有深遠的影響

1979年，美國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傅高義所著的《日本第一》造成轟動，30年後，這位東亞歷史權威帶來了另一本書，一本他潛心撰寫10年、900頁的書——《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這一次，他要讓美國人了解中國何以能在一個人的努力下，發展成今日的面貌。

友人建議：“你應該寫鄧小平”

已高齡 81 歲的傅高義既是“中國通”，也是“日本通”，一開始，傅高義的研究領域為日本。1958 年取得哈佛大學社會關係博士學位之後，傅高義前往日本學習日語、進行研究，1961 年至 1964 年間，傅高義在哈佛擔任博士後研究員，開始學習中文和歷史，接著留在哈佛任教，教授日本和中國社會等課程。

在此期間，傅高義曾任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國際事務中心美日關係項目主任等多個組織的領導者，並出版多部日本、中國相關著作，1993 年至 1995 年，傅高義暫時離開學校，擔任華盛頓國家情報委員會負責東亞情報事務的官員。

1980 年代，日本的崛起曾令許多西方人震驚，但傅高義於 1979 年出版的《日本第一》讓許多美國企業領導和政府官員早一步認識到日本的崛起，並對此有所準備，《日本第一》也長期雄踞日本非小說類暢銷書排行榜，因此，傅高義希望再寫一本書，幫助美國人瞭解亞洲的重要發展。

2000 年夏天，即將從學校退休的傅高義在韓國濟州島與友人奧博多佛（Don Oberdoefer）聚會時，把寫書的念頭告訴了這位有 50 年報導東亞事務資歷的資深記者。奧博多佛毫不遲

疑地對傅高義說：“你應該寫鄧小平。”幾周後，傅高義覺得奧博多佛說得沒錯，亞洲事務裡，中國議題的份量最大，而對中國現代化影響最深的就是鄧小平，瞭解鄧小平的生活與職業生涯，同時也能瞭解促成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因。

“我希望讀者藉由這本書，對領導者的想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傅高義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表示，例如許多人都認為鄧小平反對民主，但實際上鄧小平不是一個單純反對民主的人，在此議題上，他有自己的顧慮，而在改善中國老百姓生活方式的議題上，鄧小平的想法也不完全與美國的想法、與在美國的華人想法一樣，如果能更瞭解他，就更能理解他的所作所為。

這本 14 頁前言加 876 頁正文的書分為六大部分，分別講述了 1904 年至 1969 年鄧小平的背景、1969 年至 1977 年鄧小平前進高層的曲折之路、1978 年至 1980 年鄧小平時代的建立、1978 年至 1989 年的鄧小平時代、1989 年至 1992 年鄧小平時代遭遇的挑戰，以及鄧小平在歷史中的地位。

雖然往後幾年，在共產黨檔案逐漸向公眾開放後，與鄧小平有關的書籍越來越多，但在傅高義動念撰寫鄧小平傳的當時，市場上還沒有一本夠份量的書。傅高義認為，當時是研究鄧小平的最好時間點。與許多年鑑、回憶錄不同的是，傅高義親自拜訪眾多鄧小平的家庭成員、同事及其家人、中共的歷史學家，



傅高義(《新史記》
記者 柯宇倩攝)

包括江澤民、李銳、錢其琛、鄧小平女兒鄧榕和鄧林、陳雲的孩子陳元和陳偉力、胡耀邦的孩子胡德平和胡德華等，獲得一些獨特見解的啓發，以及一些重要的細節，而這些資料，在白紙黑字的檔案記錄中未必能見到。除了官員、前官員和高官子女之外，傅高義也採訪了許多知識份子、異議人士，光是書前的感謝

名單就長長一串。

傅高義前前後後共在中國待了12個月。採訪之外，為更瞭解鄧小平所經歷過的環境，傅高義在幾個對鄧小平來說重要的地點各待了幾天，包括他的出生地四川省廣安縣、1930年代鄧小平住了幾年的江西瑞金、鄧小平打游擊八年的山西省太行山、1949年至1952年間鄧小平掌控西南時的基地重慶和成都……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和學者均向傅高義提供幫助，使傅高義得以收集到方方面面的資料。

研究鄧小平不是容易的事

研究鄧小平的過程中，傅高義對鄧小平的觀點也有了改變。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首先，他發現鄧小平不是啟動改革的人，在與江澤民談話中，傅高義發現事實上改革在華國鋒手下已經啓動；第二，當他查閱鄧小平與外國領導的交流紀錄和訪談時，他對鄧小平的知識和關係的廣度感到訝異。

傅高義在撰寫著作時，除了在中國採訪外，也到世界其他國家拜訪，如在新加坡，傅高義與前總理李光耀會面，也見了前總理吳作棟、前副總理吳慶瑞、前總統納丹（S. R. Nathan）和其他官員、學者。在香港，傅高義拜訪了物理學家楊振寧、船王包玉

剛的女婿鄭維健，包玉剛是中國境外與鄧小平會面最多次的人。傅高義也到訪澳大利亞、莫斯科、英國、日本等國，與當地的專家交談，在美國，傅高義更是有機會從許許多多的官員學者口中獲知有關鄧小平的訊息。

“李光耀告訴我，鄧小平對冷戰如何開啟、二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應對方式等都有所瞭解。鄧小平對國際事務的認識，他的外交技巧，他所見過的人之多，都非常驚人。”傅高義對《新史記》舉例，包括前美國總統里根、老布什、福特、卡特、尼克松，都尊敬鄧小平。“對於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認為做了很糟糕的事，但很多外國領導對他的智慧與能力都感到印象深刻；雖然大家對鄧小平的看法非常分歧，但最後都對他抱有一份很深的敬意。”

傅高義也指出，鄧小平擁有良好的記憶力，這樣的記憶力使得研究鄧小平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例如 1920 年代，鄧小平在巴黎和上海進行秘密活動時，並未留下任何筆記，他憑藉的全是自己的記憶；“文化大革命”時，批判者想收集鄧小平的“罪證”，卻發現找不到。鄧小平在正式會議上的演說稿，是由助手寫的，留下錄音紀錄，但其他絕大多數的談話或會議，鄧小平都不需要使用筆記，在全憑記憶的情況下，鄧小平還能進行一小時以上演講，思路也相當有條理。

此外，傅高義對《新史記》強調，鄧小平是個嚴格遵守黨紀的人，這點可從一個細節看出來：“文革”期間，鄧小平與妻子、兒子被流放到江西，即使妻子、兒子都是共產黨員，鄧小平也未對他們透露黨高層事務。

鄧小平總批評那些在書中大力讚揚自己的傳記作者。他不寫自傳，也堅持要求別人寫他的時候不該誇大或過度表揚，此外，鄧小平鮮少在公開場合回憶自己的過往經驗，他的不愛說話、謹言慎行都是大家公認的。

傅高義說，開始研究鄧小平時，《鄧小平年譜》是最基本的資料來源，此份由黨史專家團隊完成的年譜，客觀記載了1975年至1997年間鄧小平的每日行程。年譜並未提供任何解釋、推測，未提及某些重大敏感議題或政治對抗，也未批評或讚美鄧小平，但年譜對於瞭解鄧小平的所見所聞、其言其行，都提供了幫助。

《鄧小平文選》則收錄、編輯了鄧小平的講話。傅高義認為，與當時的中國與世界情勢相結合來考察，《鄧小平文選》對於瞭解鄧小平的重要政策相當有用。而最能瞭解鄧小平個人想法的著作，則是鄧小平最小的女兒鄧榕的《我的父親鄧小平》和《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除了上述資料外，傅高義也閱讀了大量的中文、外文著作。

對於現在要研究鄧小平的人來說，難度已經降低。傅高義告訴《新史記》，雖然鄧小平有很多秘密、很多事情被官方刻意壓下，也有很多事沒有留下書面記錄，但與過往比起來，現在與鄧相關的資料、追思等都很豐富，關於鄧小平的信息比關於胡錦濤的信息更多，與研究其他中國領導比起來，研究鄧小平不一定更困難。

天安門鎮壓後中國保持了穩定

外界對鄧小平的評價褒貶不一，而傅高義眼中的鄧小平，歷史地位相當高。他認為，鄧小平在提升百姓生活水平與影響世界歷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鄧小平決定中國在國際事務上，要扮演有建設性、和平的角色，他的領導方式，對後來的中國領導人有深遠的影響。”傅高義對《新史記》說。

鄧小平的國際觀，從年輕時代已開始培養。傅高義解釋，鄧小平 15 歲的時候就通過考試，16 歲時跟著其他學員到法國留學。在法國待了 5 年之後，鄧小平還到蘇聯求學 1 年。

接替罹患癌症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之後，鄧小平逐漸遠離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傅高義對《新史記》解釋，毛澤東死後，許多黨內高層開始懷疑這種將如此大的權力集中於一個

人身上的體制，在此機制下，若此人犯錯，就不可能去糾正他。因此鄧小平接班後，並未得到如毛澤東那樣多的頭銜和權力，鄧小平也小心翼翼地關注著政治生態和權力平衡，試圖在保持和爭取其他主要領導人支持之下，處理困難的政治議題。雖然鄧小平仍屬所謂專制型領袖，但他沒有像毛澤東那樣集大權於一身。

傅高義認為，若將鄧小平與毛澤東相比較，1959年後或可看出最大的不同：當時，毛澤東希望持續“大躍進”，但他不站在第一線，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則對毛澤東的“大躍進”產生疑慮，認為持續“大躍進”會讓中國經濟崩潰，因此開始調整經濟方針，找到讓中國快速恢復、發展的道路。許多分析普遍認為，正是鄧小平走了一條與毛澤東不同的道路，使得兩人的關係產生裂痕。

傅高義說，他不同意那些認為鄧小平純粹想引入資本主義的說法，或認為鄧小平用其它名義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最終，土地仍是國有，人們沒有私有財產，中國的國有企業也比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大得多。”

寫鄧小平，不可能迴避 1989 年的天安門鎮壓與相關事件。有些人認為傅高義在書中並未對人權議題有所著墨，旅居美國的天文物理學家方勵之在《紐約書評》雜誌發表書評，批評“人

權”這個詞沒有在《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書後的索引中出現，而“這種忽略並不是索引製作者的疏忽。這本書的一個特色就是系統性地不考慮人權問題”。

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他在書中講述了1986年和1989年學生抗議事件，以及胡耀邦所支持、推動的改革。“內容都在那兒，雖然可能我沒用那些會讓方勵之開心的字眼。”

政治問題方面，《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一書並未太多地探討“文革”或“六四”天安門事件對鄧小平的影響。傅高義解釋，由於鄧小平在許多事件中都沒留下記錄，因此他寫書的重點在於描述情況和事實，讓這本書有更大、更長遠的價值，而非加入過多個人的評判。

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實際死亡人數，傅高義並未自己下判斷，中共當局宣布的死亡人數為300人，而海外記者起初報導稱死亡人數有數千人，傅高義認為記者的報導可能有些誇大，他個人認為比較重要的數據是當時住在北京的學者、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死亡調查》中根據北京13家醫院等各方資料統計出的死亡人數——479人。

如今回顧“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少人認為鎮壓與死亡是應該而且能夠避免的，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是否可能透過對話的方式和平落幕，由於很難去判斷並未發生的事，因此他只

願意用已經發生過的事去證明自己的推斷。不過傅高義相信鄧小平在 1988 年確實犯了些錯誤，當時鄧小平主張“價格闖關”，結果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全國性恐慌，住在北京的人也感到日子更難過。

同樣的，在“四二六社論”上，傅高義也認為處理不妥。示威風潮開始後，趙紫陽到訪朝鮮之際，鄧小平、李鵬等開會，最終出台了“四二六社論”。傅高義指出，該社論讓學生更加失望和激動。“我認為李鵬和其他人害怕與學生對話，因為他們想讓官方學生組織保有主要學生組織的地位，認為對話會給其他學生組織合法性。但社論招來了學生們的怨懟，在這個決定下，當時官方沒有任何一個人對學生組織採取可能讓情況改變的行動。”

“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步入社會穩定和經濟成長的時期，1992 年，鄧小平在南巡時強調改革開放，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思想基礎。傅高義指出，鄧小平知道鎮壓會導致糟糕的結果，但不這麼做，國家可能分崩離析。“很難因為中國之後的穩定和經濟成長，就說天安門鎮壓有其正當性，但確實採取行動後，鄧小平讓中國保持了穩定，過去 20 年，中國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傅高義對《新史記》說。

維持自己、黨和政府的權力，是鄧的原則

批評者認為，鄧小平一邊極力推動經濟改革，但一邊又堅持限制政治改革，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這樣的認知並不正確。“1978年鄧小平支持讓民主牆持續4個月，還有1980年8月鄧小平所做的重要講話呢（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必須改革權力過分集中、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記者註）？或者為什麼他允許1986年對政治改革的討論（該年鄧小平在聽取中央領導同志匯報時，表示政治體制改革應提到日程上來。——記者註）？他也支持趙紫陽，所以他對政治改革的想法，並非如他人所說。”

對於鄧小平在經濟上的貢獻，其他人也有話要說。方勵之認為傅高義所謂“鄧小平讓億萬人脫貧”的說法本末倒置，因為在後毛澤東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靠的是億萬中國人的苦力勞動。

傅高義對《新史記》解釋，數以萬計的勞工和許多明智的官員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上，當然有所貢獻，但在毛澤東時代晚期，中國經濟陷入非常糟糕的情況，正需要一個帶領中國走出困境的強有力的領袖，而鄧小平正是這樣的領袖，讓中國局勢的轉變成為可能。“所以當然，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功勞，但對於改

變中國，他的領導是必要的。”

鄧小平於 1997 年逝世。傅高義表示，如果鄧小平還在世，應該會在外交和經濟上發揮深遠的影響力。他一定會對中國的發展感到高興，但也可能擔心中國的腐敗越來越嚴重。鄧小平非常希望中國變得更富裕、更有影響力，他在職業生涯尾聲時表示，一方面要推動中國的開放，一方面要懲治腐敗，從嚴治黨。

鄧小平也曾說過，先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富起來，再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如果他仍在世，將認為現在就是富裕地區幫助貧困地區的時候。外交方面，傅高義分析，鄧小平強調睦鄰友好，比起現任領導對軍方又擁有更大影響力，因此鄧小平可能會推動更多軍方對軍方的交流，降低解放軍在南海發生衝突的機會。

雖然鄧小平本人留下的書面資料不多，但傅高義勤於收集，可撰寫的內容讓編輯都不禁要說“太多了”。“我的編輯說，既然這本書的重點是鄧小平如何改變中國，我應該簡單介紹鄧小平的背景就好，而把完整的解釋留給鄧小平的後半時期，所以我縮短了前面的介紹。”但也因此有人認為傅高義太快地略過鄧小平艱苦及黑暗的過去，不過傅高義覺得刪減內容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在這種書的撰寫上就應該這樣做，但如果你讀得仔細，會發現我在描述鄧小平早年的時候，講述了他支持‘反右’運動



傅高義(右)在紐約介紹新書,左為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Stephen A. Orlins)。(《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攝)

等,我覺得自己對他的重要所作所為都寫到了——篇幅較短,並不意味著就忽略某些事。”傅高義對《新史記》說。

傅高義表示,鄧小平從沒徹底否定“反右”運動,1975年,鄧小平在胡耀邦的幫助下,大大減輕了“反右”運動的負面後果,當時鄧小平認為正式為“右派”平反還太早,但他們也想改善“反右”運動受害者的境遇。1978年鄧小平取得權力後,承認自己對“反右”擴大化負有責任,但仍堅持對部分人不予平反。“我認為對鄧小平來說,政府需要權力,如果他太快承認政府犯了錯誤,

則民衆的批判會衝擊到政府的權力，他想維持自己、黨和政府的權力，這是他的原則。”

懷疑自己還有力氣再寫另一本書

由於篇幅有限，有些傅高義認為有趣的故事，並未收錄到書中，他對《新史記》記者舉例，美國國會認為中國應該更加尊重法治，在促進法治上做更多努力，鄧小平答道：“你們說的沒錯，但你們的律師太多了。”

令傅高義感到遺憾的是，自己未曾與鄧小平談過話。1973年5月，在美國國家科學院(NAS)的支持下，傅高義與代表團一行第一次到北京，見到了周恩來等中國領袖，傅高義在那次參訪中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中國領袖們談論鄧小平近日回到權力圈的事，認為他將扮演要角，帶來重大改變，但那時沒有人預期到中國在之後20年間產生的驚人變化，以及在這位領導人的努力下，中國的未來如何大幅改觀。

1979年1月，傅高義在位於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的美中正式建交歡迎會上，與鄧小平有了最近距離的接觸，該歡迎會聚集了來自美國政府、學界、媒體、企業的中國專家，許多人已認識多年，有些人則許久沒見，因此廳中充滿交

談聲，加上國家美術館的音響效果非常糟糕，使得傅高義完全聽不到鄧小平與其翻譯的聲音，儘管他與鄧小平只相隔幾英尺遠。鄧小平身邊的人告訴傅高義，鄧小平對於現場的噪音和與會者的忽視感到難堪，不過在旁人看來，鄧小平就像對著一群安靜端坐的中國聽眾發表講話一般，此點讓在場許多人印象深刻。

《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即將於 2012 年 5 月由香港中文大學推出繁、簡體字版，由於中國大陸的出版社要求傅高義刪節內容，因此傅高義未將書稿交給後者。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未來他不會再為其他中國領導人寫書，他甚至不知道是否會寫下一本書。“我已經 81 歲，光寫鄧小平的傳記就花了 10 年的時間，我懷疑自己還有力氣再寫一本書。”

接到許多演講邀請的傅高義，未來一年的計畫是到訪世界各地。“我已經準備到美國、歐洲、亞洲各地進行演講，也希望在更多地方講述鄧小平，我也希望評論美中關係議題、日中關係，所以未來會投入更多心力在這些事上。”（《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傅高義筆下的 現代中國“總經理”

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與鄧小平見面。聽了麥理浩的擔憂後，鄧小平指出：“如果你覺得香港難治，你應該試試治理中國。”當時，中國剛經歷“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已經看出中國的處境艱難

美國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傅高義所著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一書，將鄧小平描繪為現在中國的“總經理”角色。

國外求學擴展鄧小平世界觀

傅高義寫道，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rse)訪問北京，向中國新領導層解釋香港前途問題，

當與鄧小平見面時，麥理浩指出，香港人對 1997 之後的情況深感憂慮，北京需正視此問題。聽過麥理浩的擔憂後，鄧小平指出：“如果你覺得香港難治，你應該試試治理中國。”當時，中國剛經歷“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已經看出中國的處境艱難。

1904 年生於四川省廣安縣牌坊村的鄧小平，其先祖鄧時敏為清代高官，鄧小平的父親鄧紹昌向來希望鄧小平也能謀得高官職位。鄧紹昌對於村中事務積極參與，但對家務卻甚少關注。在鄧紹昌因賭博變賣土地、幾乎破產，以及與高官關係搞壞後，鄧紹昌逃往他處，但他仍持續支持鄧小平的教育。與對父親比較，鄧小平對於一手持家的母親則非常敬重。

1919 年，14 歲多的鄧小平已展現出愛國精神，與其他學生參與廣安縣的“五四”運動遊行，也加入重慶的聯合抵制日本行動。鄧小平本人更寬廣的世界觀，與年輕學子間的國家觀一同萌芽，此刻開始，鄧小平的個人認同與全國上下想讓中國擺脫恥辱、讓中國更強大的心情密不可分。

到國外求學，更加拓展了鄧小平的世界觀。1919 年，15 歲的鄧小平與族叔鄧紹聖一同離開廣安縣，到重慶一所留法預備學校就讀。1920 年，鄧小平和其他 83 名學員乘船到法國勤工儉學，他是其中年紀最小的。在法國的巴約 (Bayeux)，鄧小平曾學習了 3 個月法語，但隨後由於四川基金會的資金不足，

鄧小平與其他學生必須離開巴約，在其他地方找工作，生活相當不穩定。最後，鄧小平到達巴黎。

雖然在法國的中國學生生活困頓，做的是法國人不要的工作，且工作也經常更換，但仍保持對中國形勢的關注，組織各式各樣討論中國政情的團體，在此期間，鄧小平和其他人探索救國途徑和尋找組織。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3年，鄧小平成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周恩來則是該團的書記。在周恩來指揮下的組織中，鄧小平做著各式各樣的工作，但主要負責印製宣傳中國革命的團部雜誌，鄧小平曾被稱作“油印博士”。1924年，此團部雜誌改名為《赤光》，主要讀者是在法國的中國學生，鄧小平也在這年正式成為中共黨員。在周恩來手下工作，鄧小平對中共的事業有了更深瞭解，也有更進一步的參與。

1923年，共產黨宣布與國民黨合作；1925年，鄧小平成為國民黨歐洲支部領導人之一。當年5月，鄧小平加入抗議法國政府持續與專制的中國政府合作的行動，年底，抗議行動的領頭學生遭到遣返，鄧小平在團體中的角色也日漸重要。1926年1月7日，得知將被逮捕的鄧小平，乘火車經德國逃到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校方很快發現鄧小平的能力，他被分配在7號團隊——“理論團隊”中，這個團隊裡的學生被視

為未來的政治領袖，成員還包括蔣經國、馮玉祥將軍的兩女與一子。

在法國，鄧小平接觸到西方各種社會思潮、馬克思主義，感受到了社會多元化，也實踐了黨組織工作。法國生活也影響了鄧小平的口味——在之後的日子裡，鄧小平喜愛喝紅酒、喝咖啡、吃起司和麵包。



16歲的鄧小平在法國。

在莫斯科的鄧小平積極學習、嚴守紀律，某些鄧小平在莫斯科時期擁護的觀念，如遵從上級的指示，終其一生都沒有改變。

回到中國，嶄露頭角

1927年1月12日，鄧小平回到中國，曾為馮玉祥工作過一段時間。當年4月，國共合作破裂，隨後鄧小平與新婚妻子、同為中共黨員的張錫媛前往上海，住在周恩來夫婦的隔壁，一同進行地下工作。1927年8月7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於武漢舉行的緊急會議上，負責該次會議的會務工作，第一次見到高大、自信的毛澤東——當時毛澤東還未成為中共最高領袖。

1929年，鄧小平前往廣西，建立紅色根據地、試圖與當地軍閥建立統一戰線。鄧小平的工作反映了在一個快速轉變的政治環境裡領導人的所需技能：處理好與軍閥、當地民衆、黨中央的複雜關係。但之後連連受挫。

鄧小平與戰友隨後發起百色與龍州起義，卻因為廣西軍閥李宗仁返回進行鎮壓，鄧小平的戰友部下傷亡慘重，紅7軍剩下的幾百名官兵只能逃離。在一場戰役中，鄧小平與自己的軍隊走散，鄧小平決定離開紅7軍回到上海。在向中央說明的

匯報裡，鄧小平表明自己離開是紅 7 軍領導們同意的，但他坦承在軍隊仍陷於困境中時離開，這樣的決定並不妥。“文化大革命”時，鄧小平因為這項行為遭到指控。

鄧小平回到上海，探望了即將生產的妻子，這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張錫媛隨後因產褥熱逝世，嬰兒也很快死亡。

1931 年 8 月，鄧小平與第二任妻子金維映在黨的安排下來到江西瑞金。經過深入調查，為當地幾百名被當成“特務”、“內奸”的中共黨員和民衆平反。1932 年，鄧小平擔任會昌縣委書記。

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相信共產黨應該建立農村根據地，發展壯大後再去進攻城市、挑戰對手。但當時的黨中央指控鄧小平跟隨羅明失敗的政治路線，在這場被稱為“鄧小平第一次被打倒”的事件中，鄧小平被撤職，其妻子也離開他，嫁給鄧小平的指控者之一李維漢。鄧榕指出，在第一任妻子和孩子死亡、與第二任妻子離婚，以及遭受嚴厲指控前，鄧小平是快樂、風趣的人，但之後他變得更加壓抑、更不愛說話。

當時被當作“毛派”而受到處罰的鄧小平不知道，往後毛澤東因為鄧小平的這份忠心，從未允許黨驅逐鄧小平。

1934 年，紅軍展開長征。1935 年 1 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毛澤東取得了掌管軍隊的權力，為他

走向中共最高領袖鋪平道路；鄧小平也重新受到信任。

1936年12月，“西安事件”爆發，張學良、楊虎城綁架蔣介石，共產黨終於在絕境中迎來轉機，國共第二次合作，一同對日抗戰。之後鄧小平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與八路軍主力師129師師長劉伯承並肩作戰多年，並誕生“劉鄧”一詞。1939年，鄧小平與卓琳在毛澤東、劉少奇、李富春等人的見證下舉行簡單的婚禮，卓琳也是鄧小平往後一生唯一的妻子，兩人育有三女兩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鄧小平實質上是晉冀魯豫根據地排名最高的領導人，協助整編與國民黨內戰時需投入的軍隊。國共內戰中，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的淮海戰役，是軍事史上最大規模的戰役之一，共投入60萬國軍與50萬解放軍，共產黨還動員了上百萬農民“支前”，運糧、運武器和其它補給品。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總前委書記，負責統合所有50萬解放軍，終於打敗了國民黨軍隊，致使蔣介石對國共戰爭的結果轉為悲觀。這場戰役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在軍力對比上轉入劣勢。1984年，鄧小平在面對“什麼事一生中最快樂時光”的問題時，給出的答案是：內戰期間共產黨以較少的軍隊、較差的裝備克服難關取得勝利的三年。

隨後解放軍渡過長江，節節向南挺近，1949年，共產黨控

制大半個中國，鄧小平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培訓官員，發動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階級，毛澤東對鄧小平土地改革的成功大表讚賞，鄧小平還主導了這一區域的經濟恢復。

1952年開始，鄧小平奉調進京，先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財政部長、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長、政協副主席等職務。毛澤東在鄧小平一到達北京時，就表達了對他的信任。當鄧小平在中央擔任要職時，他親眼見到毛澤東如何權衡中國所面臨的議



毛澤東與鄧小平。

題，以及他的決定如何影響中國，鄧小平也能見到周恩來如何處理國際關係和主持中央政府的運轉。此外，鄧小平還有機會瞭解共和國的主要決策模式，並思考重大改變下的框架，這些都讓他在 1980 年代重新打造中國政經框架時提供幫助。

1957 年 11 月，鄧小平隨毛澤東飛往莫斯科，毛澤東對蘇共理論權威蘇斯洛夫極力稱讚鄧小平，說：“你看到那個矮個子了嗎？他非常聰明，前途不可限量。”赫魯曉夫也回憶，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領導層中最有前途的成員。

1957 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鄧小平大力支持毛澤東，鄧小平在“反右”中扮演的強硬角色，中國知識份子永遠忘不了。

“大躍進”開始後，毛澤東聽不進官員們的逆耳忠言，許多對毛澤東忠心的人也沈默下來。但毛澤東重視鄧小平和林彪等人，因為他們在公開場合很少出言批評，在毛澤東面前則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鄧小平知道毛澤東的喜好，便克制自己批評毛澤東的衝動，同時忠實遵從毛的指示。不過後來鄧小平曾告訴女兒鄧榕，對於沒有進一步阻止毛澤東犯下如此嚴重的錯誤，他感到後悔。

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在稍後還是逐漸破裂了。1962 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公開批評“大躍進”蠻幹的失敗，令毛

澤東相當惱火。而會議之後，鄧小平持續與劉少奇密切合作。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革”，攻擊劉少奇的同時，也將炮火對準鄧小平，指出鄧小平是“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8年，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所有的職務。

鄧小平倒台後，歷經了人生的痛苦時期，“九一三”事件給了鄧小平回到北京的機會。周恩來曾透露，毛澤東考慮的兩個接班人選為林彪和鄧小平，因此兩人敵視彼此是意料中事，鄧榕表示，除了林彪元帥之外，鄧小平與所有元帥都有往來，毛澤東本人也察覺到此事。鄧小平從兒子鄧樸方的口中得知“九一三”事件，鄧樸方則是從短波收音機獲知林彪飛機墜毀消息。然而，鄧小平等了幾乎兩個月，待事件被官方證實後，才有所行動。

在政治鬥爭中屢敗屢戰

1972年，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讓汪東興轉交。信中他表示自己在勞動和學習中已經改過自新，表達希望回到中央的願望。在1973年10月舉行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重返中央。當時毛澤東已病重，這次大會為毛澤東最後一次參加的黨代表大會。毛澤東選擇了王洪文作為接

班人。中央委員會成員大幅更新，宣告林彪時代的結束，同時因許多資深官員回到中央委員會中，讓鄧小平在 1973 年底掌握更大權力時，得到有力的支持。

1973 年 12 月，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表態批評周恩來，與周恩來關係一直有疙瘩的毛澤東得知後，下令政治局安排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之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使鄧小平集中央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於一身。

隨著周恩來健康情況的惡化，鄧小平的重要作用越來越大。1974 年春天，鄧小平成為第一位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的中國領導人，闡述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可看出毛澤東對鄧小平重新漸增的信任。

傅高義認為，1975 年對鄧小平來說是最關鍵的一年，在周恩來病重的情況下，該年鄧小平正式接掌周恩來擔負的事務。對鄧小平來說，他需要思考如何維持毛澤東的支持，又能令中國走在發展道路上。鄧小平於是不斷讚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避免直接批評“文化大革命”，並在毛澤東“三項指示為綱”的名義下，大刀闊斧消滅混亂、讓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鄧小平認為，必須根治領導班子的“軟、懶、散”狀況；他也開始整頓科技、教育系統；他還要求讓官員遴選不再只靠關係，而是靠知識與能力。

鄧小平也整頓軍隊，重建紀律、縮編、改善訓練。尤其是整頓半軍事化的鐵路和交通運輸，效果十分顯著。鄧小平多管齊下，一方面確保毛澤東繼續信任和支持自己，一方面依賴有能力的官員；他最終整頓了徐州鐵路樞紐，快速增加運輸能力，鼓舞士氣。在徐州取得成功後，鄧小平將徐州模式擴展到其他領域，大幅增產煤炭、鋼鐵……

1975年4月，毛澤東發出打算賦予鄧小平更大權柄的清楚信號。當時，毛澤東讓鄧小平參加他與金日成的會面。毛澤東對金日成說：“我不會跟你談政治事務，我讓他跟你談，那個人叫鄧小平，他能發動戰爭，他可以反對修正主義，紅衛兵攻擊他，但現在沒問題了，那時，他有幾年的時間被打倒，但現在他又回來了，我們需要他。”

5月27日和6月3日，鄧小平首次取代王洪文，成為政治局會議的主持人；5月，鄧小平前往法國，這是中共領導第一次到西方國家的國是訪問，鄧小平有機會認識到這個他曾待過一段歲月的國家如何發展變化，並思考中國應該如何達到“四個現代化”。

不過，也正是從1975年春天開始，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戒心越來越濃。毛澤東擔心自己死後，鄧小平會召回被打倒的政治領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損害毛澤東的聲譽。11月，毛

遠新告訴伯父毛澤東，鄧小平甚少談及“文革”的“成就”，甚少批評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也很少讚美“批林批孔”運動。毛遠新還表示，鄧小平可能會恢復“文革”前的組織架構，這說中了毛澤東內心最深處的擔憂。此次談話後，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的緊張關係急遽上升。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仍是副總理的鄧小平將政治局擬宣布周恩來死訊的草稿送交毛澤東審批，毛澤東並未否決107名治喪委員會任何一名成員，包括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朱德等人；毛澤東也同意讓鄧小平致悼詞；不過，毛澤東並未出席葬禮。隨後，毛澤東既未選中鄧小平，也未選中鄧小平的政敵張春橋，而是任命華國鋒為總理。毛澤東也欲削弱鄧小平在軍隊中的權力（當時鄧小平擔任總參謀長），讓鄧小平更難掌管軍權。

此時，與鄧小平原本就有矛盾的“四人幫”不斷攻擊鄧小平，4月5日，由悼念周恩來引發的天安門事件爆發，鄧小平被視為“反革命份子的總代表”，在4月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的旨意：撤銷鄧小平的黨、政、軍所有職務，鄧小平再度被打倒。

1976年5月11日，毛澤東因心力衰竭極度虛弱，9月9日逝世。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

人幫”，華國鋒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但因為黨內對是否應該逮捕“四人幫”質疑聲不斷，甚至也懷疑毛澤東是否真的選擇華國鋒為接班人，畢竟毛澤東從未公開提及這點，因此華國鋒亟欲尋求黨的支持。

10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表達擁護之意，他是第一個向華國鋒表示擁護的領導人之一。不過，是否該恢復鄧小平的職務、恢復什麼職務，在“四人幫”被逮捕後一直是個問題。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為回應許多人對鄧小平受到



1977年7月，鄧小平重新出山。這是鄧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50周年大會上。

不公正指控的指責，華國鋒指示中宣部不要再提起天安門事件抗議的話題。華國鋒也承認鄧小平沒有策劃天安門事件。

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終於正式恢復1976年4月5日之前的職務，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物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排名第三，在華國鋒和葉劍英之後。

鄧小平時代的來臨

1978年，鄧小平時代開始成型。3月，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1975年帶領高級官員訪問法國，五日內考察工業、交通、管理、科學等領域，為海外考察團開了先例；1977年至1980年間，許多高級官員海外考察團，為中國的觀念更新創造了條件。

1978年，鄧小平訪問了緬甸、日本、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鄧小平在訪問新加坡時，訝異於新加坡的發展水平，意識到中國的體制需要改革。傅高義認為，整體來說，經過一系列訪問後，鄧小平對未來中國該走什麼道路的想法，變得更具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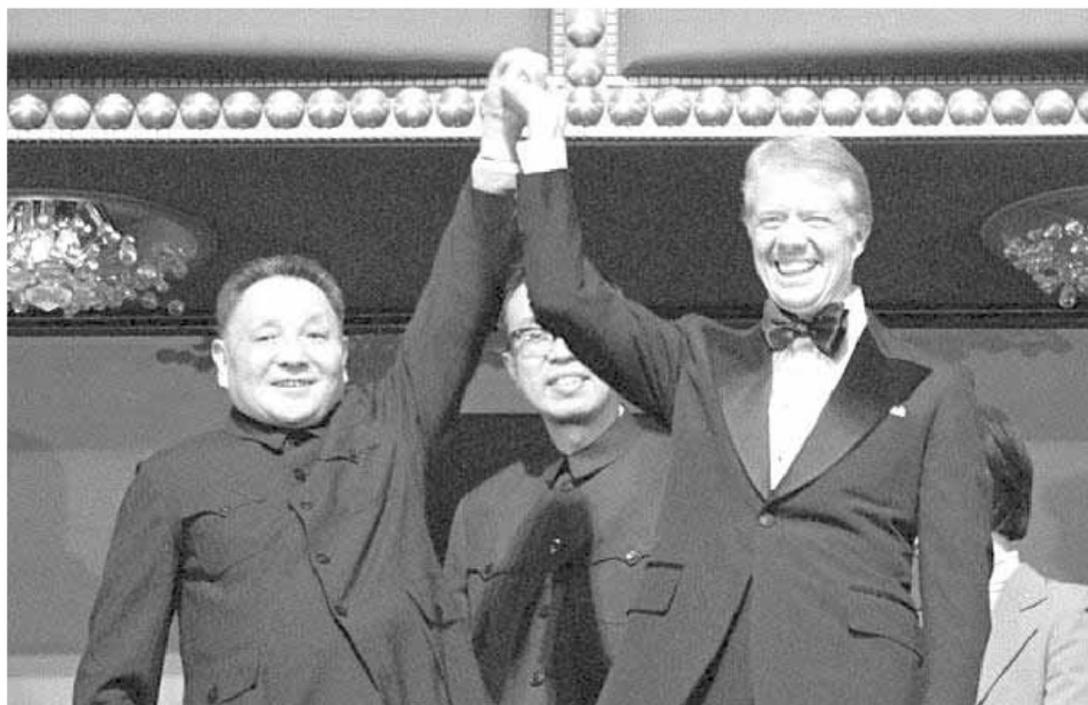
1978年底，鄧小平總結考察團的成效時表示，見得越多，

越瞭解到中國的落後。許多高層也認為鄧小平“中國必須採取新路線”的觀念是正確的，中國走改革開放的路線逐漸成爲全黨的共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被視爲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的開端。但是傅高義指出，改革開放，實際上在華國鋒手上就啓動了，但確實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才實現。提出“兩個凡是”、與鄧小平路線相左的華國鋒，在此次會議中進行了檢討，最高領導地位也被鄧小平所取代，中國正式進入鄧小平時代。

1978年開始，中國陸續對日本和美國開放、交流，1979年2月的中越戰爭，讓鄧小平決定精簡軍隊，他也辭去解放軍總參謀長一職。擁有12年軍隊領導經驗的鄧小平，重視權威和紀律，鄧小平也推崇“黨內民主”的概念，認爲爲了減少犯嚴重錯誤的危險，領導要聽取有建設性的意見。鄧小平也相信經濟成長能強化黨和他個人的權威——這個觀點後來證明是正確的，1983年至1984年，當經濟起飛時，鄧小平的權威幾乎是無法挑戰的。

1979年起，中央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試辦經濟特區。地方官員學習到，要吸引外商（以及港商、台商）來投資設廠，必須設立“一站通”決策中心，讓境外投資者



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到達美國首都華盛頓。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第一次訪問。

免去與無數政府部門打交道、過無數關卡的麻煩；此外，地方政府也學習到該如何向外來投資者收費。一開始，地方政府的索價往往超過全球標準太多或太低；其次，地方官也瞭解到公信力的重要：若希望外來者擴大投資，則地方官員必須取信於人。

經濟現代化也在農村地區推動開來。雖然鄧小平喜歡說“摸著石頭過河”，但事實上，對於如何渡過那條經濟現代化的特別的河，鄧小平發展出一些強烈的信念，其中之一就是共

產黨應該掌權。鄧質方曾告訴美國友人，鄧小平認為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傻子(idiot)”，因為戈爾巴喬夫先改變政治體制，如此他便失去解決經濟問題的權力，人民就會要他下台。

鄧小平想知道中國境內的真實情況，他不喜歡聽誇大的進度報告，他相信人民需要實質的激勵，必須見到明顯的進展，以保持動力，他也堅信蓬勃的經濟來自於競爭。

鄧小平瞭解達成“四個現代化”不容易，他也沒有耐心研究每個細節，因此他首先選擇陳雲，之後提携趙紫陽，協助他處理經濟事務。經濟之外，鄧小平在軍事、外交、教育、黨內幹部的培訓和退休上，都做了改革，其中，為了收復台灣、香港、保有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如同其他中國領袖一樣，如必要，鄧小平也準備動用武力，但他更偏好透過和平手段擴展和保持控制力。

鄧小平在 1982 年詳細闡述“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政策並系統化：香港、台灣得有 50 年獲更久的時間保有相異的社會體制，鄧小平也願意授予西藏相當份量的自治。1984 年 12 月 19 日，趙紫陽與撒切爾夫人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明示在“一國兩制”制度下，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在香港正式實施。

天安門鎮壓保持了中國往後的穩定

1989年學生運動時，鄧小平已84歲，他既沒有走到街上與示威學生會面，也未處理黨每日回應的細節部分，但他仍在幕後專注地觀察事態進展，也是最終的決策者。傅高義說，在鄧小平看來，示威者是改革開放下的受益者，現在卻是社會穩定的威脅者，因此鄧小平對示威者沒有太多的同情。

當時高層領導間的政治分歧，特別是趙紫陽和李鵬，以及鄧小平逐漸減少涉入日常事務的情況，都是導致衝突和矛盾的原因，這樣不確定的環境又在底層產生社會騷亂與惡化的根源。大部分的學生對政治自由較不關心，他們關心的，是個人自由，例如選擇自己工作的自由和逃離政治導向的自由。對一般大眾來說，許多人擔心的則是通貨膨脹。

一開始，鄧小平試圖避免流血衝突，因為這樣只會激怒示威者，但從一開始，他就相信強硬的手段是必須的。胡耀邦葬禮後，鄧小平更直接涉入監督黨對示威者的回應，他要確保官員準備執行任何他認為重整秩序必要的步驟。

人民日報《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四二六”社論加深了示威學生的不滿。為了恢復公眾的支持，鄧小平準備廢黜趙紫陽，選定一位新領導，在軍隊接管天安門廣場後立刻上

任，對外亮相，而此人必須與天安門鎮壓無關。5月19日，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選定有對外經驗、科技知識，並承諾改革的江澤民，作為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

傅高義寫道，沒有證據推測鄧小平對於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的決定有任何遲疑。6月3日下午2時50分，鄧小平對遲浩田下達“用一切手段恢復秩序”的命令。在鄧小平看來，即使6月3日街上被清空，示威運動仍非常可能沒有停止。“示威者只會暫時撤退，在往後匯集成更大的勢力……6月4日使用的力量確保了運動立即、確定、一勞永逸地終止。”

鄧小平的家人指出，儘管鄧小平遭受許多批評，但他從未懷疑過自己做的決定是否正確。雖然許多觀察家相信不使用暴力也能清場，但鄧小平所擔心的，不只是廣場上的學生，還有國家整體的權威喪失，他的結論是，強力的行動是恢復政府權威所必須的。

傅高義認為，許多對於天安門悲劇的種種推測，都無法給出確切答案。能肯定的是，天安門鎮壓後的20年，中國處在相對穩定和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今日，中國人享有比1989年更舒適的生活，也比中國過去任何時候要更便於得到世界各地的資訊，中國人的教育水平和壽命都持續增長，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成就也感到驕傲得多。

“六四”天安門事件導致中國在國際間受到抨擊，西方高層停止訪問中國，西方國家對華限制科技輸出，特別是軍事科技，許多人懷疑中共在中國是否還有未來？在此嚴峻的情況下，鄧小平相信，要重新取得公眾的支持，黨絕對需要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此外，他也認為需要對外部世界開放，而不是關閉國門。鄧小平也提出，必須快速調查、懲罰貪腐大案，不論誰涉案；他重申，第三代領導人必須持續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

將指揮棒交給江澤民後，1992年1月17日，87歲的鄧小平登上專車，開始了南巡。沒有任何一位中央領導，即使是江澤民，事先得知鄧小平的出發時間和行程。中央領導與地方接待人員都只知道這是場鄧小平的“家族出遊”，成員有鄧小平、夫人、四名子女（小兒子鄧質方不在內），以及子女的配偶共17人。

鄧小平在此次“出遊”中考察了武漢、廣州、深圳、珠海、上海，發表一系列講話，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促成了這些地區更大的市場開放與更快的成長，也為中國往後五年的變化定下路線。江澤民把鄧小平的觀點提升為“鄧小平理論”，稱讚鄧小平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的精神覆蓋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的中共



1992年1月19日，鄧小平到深圳皇崗口岸眺望對岸的香港。

十四大，即使他到最後一個環節才現身會場。該次會議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等基本路線寫進中共的黨章，鄧小平也安排了在十四大上胡錦濤成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後來成為江澤民的接班人。

鄧小平說過，他希望後人記得的自己，是真實的自己。他希望留下好的一面，但他也不願意受到如毛澤東那樣被浮誇的

讚揚，與毛澤東將自己比作偉大君王不同，鄧小平不認為自己是“天之驕子”，他希望自己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的形象被後世銘記。

鄧小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 1994 年新年。1997 年 2 月 19 日凌晨，鄧小平逝世，享年 92 歲。3 月 2 日，遵從鄧小平的遺願，他的骨灰被撒向大海。

多處讚揚鄧小平遭質疑

傅高義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出版後引起廣泛關注，也受到多方肯定與讚許。書中對鄧小平帶領中國走向市場經濟改革、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等成績予以正面評價，傅高義問道：“20 世紀政治領袖中，有誰在提升如此眾多人民生活水平上做得更多？”“20 世紀政治領袖中，有誰擁有如此深刻、持續地影響世界歷史的能力？”傅高義認為，鄧小平實現了讓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夢想。

鄧小平在歷史上的評價不一，傅高義對鄧小平的讚揚，也遭到一些評論家的質疑。方勵之便在《紐約書評》載文批評此書的“一個特色就是系統性地不考慮人權問題”。方勵之也認為鄧小平“讓億萬人脫貧”的說法本末倒置。

《紐約書評》專欄作者、評論家祈士遵(Christian Caryl, 一譯祈士坦)也撰文指出,《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一書中,一些部分的描述令人讀起來感到疲憊,在書中可找到對於鄧小平職業生涯的描寫,但如果想瞭解鄧小平的生活,恐怕會讓讀者有點失望。“從文體上說,一本傳記還是該講一個故事,最好是讀者不必費力就能解讀的故事。”

祈士遵認為,傅高義似乎快速地略過鄧小平經歷過的艱苦、黑暗的一面,對於鄧小平身後的大量迷團、驚人的陰謀詭計、四川人的辛辣氣息等,幾乎都被忽略。雖然傅高義確實提到一些黑暗面,但經常太過小心翼翼,例如描述鄧小平成為最高領導人,或者取締北京民主牆的部分。

祈士遵也指出,傅高義在敘述鄧小平不那麼體面的時刻時,沒有展現足夠的大師風範。例如在描述 1957 年“反右”運動時,並未介紹這場運動中受害者遭到的虐待、自殺、被判刑勞改或流放。“傅高義過於傾向用黨的邏輯來解釋,例如天安門鎮壓或西藏議題。”

不過,祈士遵稱讚傅高義出色地把中國巨變的政治細節重建出來,《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是眾多鄧小平傳記裡最完整、最有信息量的一本書,“如果不是他,很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可能我們就不再有機會知曉。”傅高義所揭示的新鮮內容,通常來

自於內部人士口述的貢獻，而不是來自於書面材料。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在《亞洲周刊》撰文指出，當世界驚嘆於“中國統治世界”時，卻忘記了它有個多麼卑微的開始、經歷了多麼顛簸的道路，《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是傅高義 10 年研究、超過 900 頁的作品，似乎也匹配他的傳主與個人雄心。

但許知遠認為，傅高義一廂情願地把中國成就都歸在鄧小平的名下，“他讓 3 億人擺脫了貧困”這一說法自身就存在著邏輯錯誤：傅高義忘了是共產黨的統治讓這 3 億人陷入困境，也是這些人的勞動與才智讓自己擺脫了貧困，而鄧小平是此壓迫性體制的重要締造者，當經濟改革啟動時，積鬱已久的巨大能量噴薄而出。

許知遠認為，現在的中國由於鄧小平的不徹底改革和暴力鎮壓學生運動，官僚系統重新迅速膨脹，且普遍性道德崩潰。不論鄧小平多麼開明、作了多少讓步，都沒人能忘記共產黨對於權力的壟斷。“如果我們不能批評鄧小平的弊端，則對他的所有讚美都不令人信服”。

英國資深記者、歷史學家梅兆贊 (Jonathan Mirsky) 認為，傅高義對鄧小平經濟改革所做的研究調查，是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但梅兆贊在稱讚傅高義撰寫功力與所做的研究之



傅高義。(《新史記》記者柯宇倩攝)

際，也提出了疑問。他在《紐約時報》的書評指出，傅高義對天安門鎮壓的描述主要準確，但他略過了周日早晨的開槍，以及許多家長在廣場邊緣搜尋孩子的過程，傅高義其實可以採訪當時在現場的記者，而不只是閱讀他們的報導。

梅兆贊表示，令人失望的是傅高義解釋為什麼天安門悲劇引發西方的一片嘩然，其程度遠大於在亞洲發生過的類似規模的悲劇。傅高義的答案包括在天安門的同步轉播，對此梅兆贊也認同，但其餘的答案，如觀者“解釋”他們所見到的是“對經濟、資訊和政治自由永遠勝利的美國神話的攻擊”、斷然指

出鄧小平“不是為了報復”，以及對外國記者來說，天安門運動是“職業生涯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等，都讓梅兆贊覺得不對頭。

《華盛頓郵報》前駐北京站站長潘文(John Pomfret)也認為傅高義太過分地讚揚鄧小平。他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傅高義在回答鄧小平如何於毛澤東權威下存活過來，以及鄧小平如何利用與美國和日本的關係、使其有益於中國等問題上，都有出色的描述。

但潘文指出，傅高義對鄧小平熱情的歌頌，讓此書有時讀起來像是中共的出版品。傅高義似乎也高度認同鄧小平“如果讓中國有更多自由，將轉化為混亂”的觀點。潘文補充，傅高義認為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事實上，經濟改革似乎是公社制度廢除下中國人民的要求。在西方對天安門事件的關注上，潘文指出，傅高義沒提到的解釋是，比起其他國家地區發生的屠殺事件，中國更為重要，這也是為何傅高義花了超過 10 年時間寫此書的原因。(《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

傅高義為何代中共 鼓吹“屠民治國論”？

在傅高義看來，中國人與西方人就是不一樣，不需要民主，不需要人權，只需要物質生活改善就行了。這部煌煌鉅著，專為獨裁者歌功頌德不說，還公開宣揚種族歧視，把中國人民打成了不配享受與西方人同等待遇的劣等民族，真是莫大的諷刺

鄧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

去年，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出版了《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今年4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鄧小平時代》之名翻譯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版。傅高義在書中提出：“鄧小平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個人，因為他改變了中國這麼一個大國的命運。”“假如

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貢獻方面，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夠與他相比？”

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中國確實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奇蹟。然而把這奇蹟完全視為鄧小平的個人貢獻，不但是對中國人民的矮化，而且反映了傅高義那位“中國老手”（Old China Hand）對中國國情民俗的隔膜。

中國人本是世界上最能苦吃苦做的民族，勤勞致富的本領天下無雙。這一優點早已為全球華人的表現證明。中國之所以在帝制時代沒能發起來，完全是因為民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遭受了幾千年的制度性壓迫。

當這種制度性壓迫終於在晚清新政期間被解除之後，中國又不幸陷入無休止的戰亂，失去了和平發展資本主義的環境。等到戰亂結束，中國又更加不幸地落入毛澤東的極權統治，人民的創業自由被徹底剝奪，於是世上最勤勞的中國人民就只能在苦難、困頓與匱乏中掙扎。就這樣，中國被足足耽誤了將近 80 年的時間。必須對此承擔責任的，除了在中國發動代理戰爭、乃至直接入侵中國的蘇聯與日本兩家帝國主義外，就是事實上的內奸孫中山與毛澤東。作為毛澤東的心腹愛將，鄧小平也難逃罪責。

此後中國騰飛，鄧小平本人當然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最主要的貢獻也就只有兩個：第一，將人民被毛澤東無理剝奪的經濟自由極度有限地歸還給他們；第二，維持了中國的和平環境。第二點實際上是繼承了毛澤東的遺產，因此，他獨特的貢獻也就只有第一個。但這所謂“改革”，不過是“改錯”，亦即極為有限地糾正了中共此前犯下的巨大錯誤，部份恢復了某些“解放”前的作法而已。然而光是這些極度有限的改錯措施，就極大地解放了中國人民被束縛已久的創業能力，使得中國在短期內就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若真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人民能夠重獲在 1949 年後被剝奪的全部自由，不知道還要創造出何等奇蹟來！

因此，鄧時代與毛時代的最主要的區別，就是人民是否擁有有限的經濟自由，而兩個時代人民生活水平的鮮明對照，也只能證明中國人民是何等善於利用那十分有限的經濟自由，反證了毛共剝奪人民自由的荒謬絕倫。

其實，用不著等到改革開放，這一結論早就 60 年代初中共短暫實行的“三自一包”的對照實驗證明過了。在大饑荒中後期，中共以適當放鬆國家對農民的控制來消極救災，立即就顯出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在短短兩三年內，中國人民就從死亡邊緣掙扎回來，城市居民就基本能吃飽了。若沒有那短暫的政策鬆

動，很難說我還能活下來。對劉鄧這一功績，歷史學家當然應予實事求是的肯定，但難道可以閉眼不看這災難的發生原因，以及劉鄧在“大躍進”中必須承擔的罪責，卻去歌頌他們是“生死人肉白骨”的大救星？這與被某些“右派分子”被中共無理迫害 20 多年，獲得“改正”後卻歌頌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有何區別？

當然，除了將被中共剝奪的經濟自由有限地歸還給人民外，鄧共也利用極權政體的“優勢”，人為壓低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價格，形成了具有強大吸引力的“資本黑洞”，把國際資本大量吸引到中國，使中國藉助外力迅速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短期內就為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如果中國是民主國家，當然就不可能有這種無視民意的“優勢”，發展速度或許要慢一些。然而這種作法卻造出了一個為所欲為的龐大的權貴資產階級，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官民矛盾以及其他社會矛盾空前加劇，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無望解決，只會越演越烈。遺憾的是，這一系列後患無窮的嚴重社會弊病，卻不在傅高義的視野中。

“六四”屠城不可避免？

在《鄧小平時代》出版後，傅高義接受了多家媒體採訪，多次為六四鎮壓辯護。在回答《亞洲周刊》專訪時，他說：

“鄧小平當時認為情況太亂了。1989年5月20日，他派軍隊去鎮壓學生運動，當時沒有開槍，也沒有打人。他覺得要是平靜下來了，就不需要再派軍隊去。但是，5月20日老百姓不讓軍隊進城，不讓軍隊到天安門，所以他為了全國安定團結，只能用軍隊去鎮壓，沒有其他辦法。”（注1）

而在回答《新史記》的採訪中，傅高義如是說：

“如今回顧‘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少人認為鎮壓與死亡是應該而且能夠避免的，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是否可能透過對話的方式和平落幕，由於很難去判斷並未發生的事，因此他只願意用已經發生過的事去證明自己的推斷。”

“傅高義指出，鄧小平知道鎮壓會導致糟糕的結果，但不這麼做，國家可能分崩離析。‘很難因為中國之後的穩定和經濟成長，就說天安門鎮壓有其正當性，但確實採取行動後，鄧小平讓中國保持了穩定，過去20年，中國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注2）

他的意思很清楚，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六四”屠城“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不鎮壓，中國就會分崩離析，也就不會有後來的“穩定和經濟成長”。

這裡最有趣的，是他的論證方式：他一方面說，不能輕易用鎮壓後的穩定和經濟成長來證明鎮壓的正當性；一方面卻又說，

自己“只願意用已經發生過的事去證明自己的推斷”，而“這已經發生過的事”就是“確實採取行動後，鄧小平讓中國保持了穩定，過去 20 年，中國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哪怕就是高中生，思維如此自相矛盾都是智力笑話，而發出這種宏論的人卻居然是哈佛教授、美國政府的智囊！

最絕的還是，傅高義教授也承認“很難去判斷並未發生的事”，然而他卻就是有那本事認定，如果不鎮壓，“國家可能分崩離析”。可無論是“不鎮壓”，還是“國家分崩離析”，都是“並未發生的事”，他怎麼就能作出這一確鑿判斷呢？這到底是鄧小平的還是他的判斷？如果是鄧小平的，他是從哪兒知道的？如果是他本人的，他作出這個假言判斷的根據是什麼？又為何要把這話硬塞到鄧小平嘴裡？

可惜傅高義為我黨辯護積極得過了頭，就連當時的北京市長陳希同都不同意。他對姚監復承認：

“回想‘六四’，我認為‘六四’是鄧小平不容易下決心的，沒有辦法時的辦法，是一場可以避免、應當避免而沒有避免的悲劇，中央動盪，我不願意。上邊的鬥爭、爭論，我不知道。”

“總之，‘六四’是一場悲劇。值得研究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悲劇？本來可以避免也應當避免的悲劇為什麼會發生？如果黨內問題不解決，上層爭論、鬥爭激烈，沒有及時採取必要措

施，不願意發生的悲劇就必然發生了……應當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歷史的客觀真相是什麼，要準確，光憑感情下結論不行，流血的問題，原因的分析，可能要留給歷史解決，為什麼不應出現、不願出現的事，卻出現了？”（注3）

雖然陳希同在其自述中竭力洗刷他的罪責，但這些話基本還是實事求是的。任何一個有點常識的過來人都得承認，所謂“八九民運”，說到底不過是學潮而已。其他階層的人民除了普遍同情學生、去遊過幾次行外，並沒有實質性的介入。工人不曾罷工，商店不曾罷市，社會並未陷入動亂，治安良好，中共更沒有喪失對軍隊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到了“六四”前夕，學運已呈自動消亡之勢，以致學生們不得不在廣場上樹立所謂“民主女神”雕像，藉此把市民吸引回廣場，然而收效甚微。因此，“六四”悲劇的確是“本來可以避免也應當避免的”。所謂“國家分崩離析”的危險前景，只不過存在於傅高義活躍的病態想像中罷了。

“屠民治國論”毫無依據

“為什麼不應出現、不願出現的事，卻出現了？”陳希同作出了明確無誤的解答，那是因為“中央動盪”，“上層爭論、鬥爭激烈”。這與我過去對六四的分析完全一致。

在舊作《老鄧為何決定開槍？》中，我指出，促使老鄧起了殺心的初始原因，是趙紫陽的背叛。共產黨人最痛恨的惡德就是背叛，而在鄧眼中，趙就是背恩反噬的叛徒，讓他怒不可遏。更嚴重的是，當時黨內四分五裂，非但輿論對學運持一邊倒的同情態度，而且在李鵬日頒布戒嚴令後，就連老師們也公開表示不能用軍隊去鎮壓學生。這就更強化了老鄧的殺心——他需要一個大屠殺懾服全黨，重建他說一不二的威望。

這是中共領袖的思維定式，他們深知賤民心理，知道要讓人民真心擁戴你，先得讓他們怕你。所謂“敬畏”，畏是因，敬是果。毛澤東把這點參悟得很透徹，在建國之初便指示：“要殺掉一批人，不殺政權不能鞏固。但要殺得有理有據有節，讓各界無話說。”張春橋也曾在筆記中寫道：“如何鞏固政權：殺人。”因此，老鄧最終決定以屠民結束學運，乃是中共領袖們“突出重圍”、解決難題的典型便捷手段。

我這分析可不是傅高義式強加於人，而是基於中共治國之道作出的。共產黨人歷來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鎮壓“階級敵人”（現在改稱“敵對勢力”了）從來是共產黨的重大施政內容。據普列漢諾夫披露，列寧曾對他說：

“雅各賓黨共和國垮台，是因為斬首機砍的腦袋太少了。革命應該善於自我保衛！”（注4）無論普列漢諾夫的遺囑是否可信，這



“六四”凌晨，穿迷彩軍服的軍人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驅趕學生。

確實是蘇共、中共乃至其他一切列寧－斯大林式政黨的治國實踐，環球無一例外，在柬埔寨達到了最高最活的頂峰。總之，在共產黨人看來，不屠殺人民就無法維持鞏固政權。此乃共產黨人的最起碼的信條，任何一個對國際共運略有所知的人都該知道。

不意如此野蠻、血腥、兇殘的“屠民治國論”，而今竟然得到了傅高義的認同！在他看來，若不血腥屠殺中國人民，中國就要

分崩離析，當然中國人民也就沒有後來的好日子了。所以，儘管他沒有說出，還是認同了中共竭力灌輸給百姓的價值觀——爲了大部份人民的幸福，殺掉一部份無辜者完全是正當的！

我早在舊作中就指出過，這血腥理論在道義上的是非姑不論，即以功利眼光視之，“六四”大屠殺也是愚不可及。

首先，宣布戒嚴並調兵進城根本就沒有必要。鄧小平要收拾趙紫陽，效法毛澤東“因勢利導”，借力打力即可。他只須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提出的“反官倒”，歡迎並鼓勵他們揭發黨內的貪腐，然後由紀委宣布趙紫陽涉嫌包庇家屬搞官倒，實行“雙規”，再來一個陳希同式的“審判”，即可一勞永逸地搞臭老趙。只要他同時嚴格約束黨內保守派，不許他們再去刺激學生，則學潮遲早要平息下來。等到事態冷卻後，再在學校裡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把學生領袖和外國人接觸、進餐的秘密錄像拋出來，打成間諜，關進大牢就完了。到時候牆倒眾人推，學生們只會忙著洗清自己，哪還敢再生事？有什麼必要動用野戰軍大規模攻入城中、一路殺人？

其次，屠殺根本就沒有達到“維穩”的效果，反倒使得政府徹底失去民心，黨內四分五裂，危機不是解決而是深化了。如果當時有外敵入侵，則人民一定會群起響應，中共立刻垮台。這人為激化的致命危機完全是靠和平的國際環境，慢慢拖過去的。

大屠殺更引來了保守派復辟蠢動。“六四”後，《人民日報海外版》讀來如同“文革”出版物。此後國家長期陷入“烏籠經濟”的困境中，達到了國內外還債高峰，老鄧的個人威望也並未得到恢復。江澤民、李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公開在報上發表《問一聲是姓社還是姓資》，就連經濟改革都面臨流產之虞。這才逼得他效法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以諸侯壓制北京”，發表南巡講話，威脅“誰不改革誰下台”，把朱鎔基推上去作總理，把李鵬踢到人大去，這才總算勉強保住了經濟改革。再加上恰在此時發生的東南亞經濟危機，致使港澳台資本紛紛轉移到大陸，才幫助中國度過了難關。如果老鄧 1992 年前就死了，則今日中國肯定還在那困境中。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傅高義代中共鼓吹的“屠民治國論”都根本不成立。

為何鼓吹“屠民治國論”？

我多次在舊作中表達過自己的感受，那就是西方對中國的態度與對前蘇聯很不一樣，採取了明顯的雙重標準，對毛澤東的態度比對希特勒、斯大林等人寬容多了。

作為大獨裁者，毛澤東無論是擁有的權力還是執政的年月

(執政 27 年), 都並不遜於斯大林(作為最高領袖執政 29 年), 比希特勒則遠遠過之(執政 12 年), 然而他的政績與兩人相比則判若雲泥。

希特勒廢除了不平等的凡爾賽和約, 把德國從大蕭條中拯救出來, 收復了失地, 統一了歐洲的德語民族, 洗雪了德國在一戰後蒙受的羞辱, 恢復了德國的強國地位與尊嚴, 在二戰中只用了五周時間便全面擊敗英法聯軍, 命令法國政府代表在一戰德國戰敗後簽訂停戰協定的同一地點(貢比涅森林中的福煦車廂內)簽訂停戰協定, 此後又令德軍在巴黎舉行盛大入城式。德軍按照一戰後法軍舉行的勝利閱兵式的路線進入巴黎, 炫耀了德軍盛大的軍威, 使法國蒙受了空前的羞辱。

斯大林則如丘吉爾所說, 對內把俄國從一個“僅有犁杖”的農業國變成了數一數二的工業強國, 對外則成了全世界的共產黨教皇, 不但結束了蘇聯在國際上的空前孤立, 而且在歷史上第一次把東歐諸國以及龐大的中國納入帝國勢力範圍, 使得他直接和間接統治的人民數量占了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毛澤東則在當政後無論在外交內政上都絕對服從斯大林指揮, 完全徹底地為蘇聯的國家利益服務, 因而斷送了民國政府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進行的外交努力獲得的成果, 使得中國在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後再度與蘇聯簽訂不平等條約, 主動建議以條



西方媒體對毛澤東網開一面。

約方式肯定外蒙獨立，使中國“三北”直接成了蘇聯的勢力範圍，禁止第三國入境，而蘇聯的“合資公司”卻在當地擁有壟斷性的礦產開發權；蘇聯政府更在東北擁有軍事基地、戰略鐵路；蘇聯專家還擁有治外法權；更嚴重的是，中國實行“一邊倒”並介入韓戰，與文明世界為敵，把自己毫無必要地捆在蘇聯的戰車上，招致國際上的空前孤立，被關在聯合國門外幾達 30 年，因此喪失了二戰獲得的大國強國地位，淪落到連印度都不如（這是中共

資深外交家何方的客觀評價)。在內政上，毛澤東不但屠殺了大量“地富反壞”，整肅了百萬“右派”，更在斯大林死後標新立異，發明了“三面紅旗”，弄出個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來，使得國家遭到了比抗戰還慘烈的損失，工農業全面崩潰；在剛剛緩過氣來後又把全國投入空前的動亂。直到他死後大眾才得安寧，國家也才獲得了一線生機，真正應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古話。

然而奇怪的是，西方輿論特別是傳記作者們對毛卻網開一面。我看過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傳記的作者，沒誰不對傳主深惡痛絕。在西方，這兩人似乎成了“evil”的同義語，而毛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改革開放前西方出的毛傳多有歌功頌德者，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遭受過的苦難雖然傳到了西方，但傳記作者諸如索爾茲伯里仍然筆下留情。除了黎安友曾在李志綏回憶錄序言中指出毛的“令人難以思議的愚蠢”外，至今無人指出，毛的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僅僅是邪惡，更是驚天動地的愚昧。他之所以能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的苦難，正是因為他代表著幾千年痞子反智主義傳統的積澱與結晶。例如蘇聯和中國都發生過大饑荒，但蘇聯發生的飢荒是斯大林冷靜設計的結果，目的是要讓反抗集體化的農民們投降，為此他命令格伯烏搶走農民的種子糧，並在國外大量拋售穀物。而毛雖然也搶走了農民的種子糧，也

在國外大量拋售穀物，卻是因為他蠢到相信了一畝地能產幾十萬斤糧，農民的糧食多到吃不完。

我據此推測，西方學者對中國實行雙重標準的第一個原因，或許是認為愚蠢沒有邪惡那麼可恨。畢竟，愚蠢造成的苦難，似乎總比冷靜謀殺更可以原諒些。

然而這並不能解釋西方對後毛中國的態度。“六四”明擺著就是冷血謀殺而非愚昧殺人。西方當初也曾震驚了一番，但正如我在事發時預見到的那樣，沒多久那憤怒就忘懷了。不僅如此，英國某政客還曾說，那種事英國人自己也幹過，當局鎮壓“人頭稅暴亂”就是一例。這位政客完全沒有意識到，他不但為屠夫辯護，而且侮辱了八九學運的參加者。如所周知，八九學運與四五運動完全不同，比後者更和平理性。硬要說是暴亂，只怕四五運動更像些，如老毛指出的：“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性質變了。”他還沒指出衝擊人民大會堂的事。而八九民運自始至終從無任何暴力衝突，只有最不要臉的人才會造謠說那是“反革命暴亂”。如果中國人有朝一日真能在天安門廣場幹出英國人頭稅抗議者在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上幹的事來，還能獲得類似的依法處理，則中國人民也就真的站起來了，真正獲得了與西方公民平等的地位。

由此可見，西方對中國採用與對前蘇聯不同的雙重標準的主要原因，還是種族歧視。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本來就是個烏菸瘴氣的野蠻國家，不能用文明世界的標準去衡量。因此，只要誰能讓中國的外表發生點變化，他們當然要喜出望外。即使是前蘇聯做到了咱們今天這個樣子，絕大多數西方政治家也會對之深惡痛絕。那原因很簡單：無論是被希特勒殺害的猶太人，還是被斯大林槍斃的無數俄國人，都是白人，與殺害黃人和黑人是兩回事，“血濃於水”永遠成立。論屠殺比例，波爾布特實行種族滅絕的本事誰也比不上，可在西方，他從來就不如米羅塞維奇吸引眼球。

然而此說仍無法解釋西方何以會對蔣介石如此苛求，對毛澤東和他的繼承人們卻又無比寬容。蔣介石乃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民族英雄，領導中國首次在近代史上贏得對外戰爭的完勝，收復了淪喪半個世紀的台灣與淪喪 14 年的滿洲，首次廢除了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除蘇聯外強加給中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收回了一切租界，使得中國成了聯合國發起國以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然而沒有哪個西方政客對他什麼好印象。據說是因為他的政權獨裁貪汙腐敗。然而若要比這個，國民黨哪是共產黨的對手？為什麼洋人如此憎惡國府，卻對我黨更可怕萬倍的獨裁與更勝百倍的腐敗視而不見？當年美國人造謠說宋子文把美援揣進腰包，甚

至要調查他的帳戶，為何如今無數中共高官把國有資產化公為私轉逃到美國去卻無人調查？

所以，西方對中國實行雙重標準，在種族偏見之外恐怕還有其他原因，那就是自身利益考慮。老蔣吃虧在於他和吳佩孚一樣，都是民族主義者，而我黨就沒有這些迂腐的道義束縛，因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成功做到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政權。我黨國際統戰的輝煌勝利，證明了世界上沒有什麼“正義”是不可收買的。

上面這些話，是我在幾年前寫下的。論實質，它不過是對現象發生原因的推測。不料傅高義教授卻親自出來作了證實，他說：

“我們西方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都需要民主，都需要人權。蔣介石時期，就有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專家批評蔣，不能容忍他那套壓制民主的權威主義。這是從我們自己的道德標準來看待的；但是，我作為一個學者，應該很坦率地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來說話。”

“我認為，必須考慮個人的道德觀念對整個國家的發展進步有什麼好處。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很多國家發展起來了，我研究這些國家的發展過程，在我看來，比較成功的，都遵循權威主義的方式。日本的明治維新是這樣，日本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

也是這樣，是按照權威主義、而不是按照民主主義方式來實現現代化的。韓國、新加坡，都不是完全按照民主主義思路，而是按照權威主義思路。因為轉型，出現的問題太多，社會太亂了，需要強有力的領袖。所以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鄧小平沒辦法完全按照民主國家的做法來解決問題。”（注5）

所以，在傅高義看來，中國人與西方人就是不一樣，不需要民主，不需要人權，只需要物質生活改善就行了。說白了，就是中國人不配過有尊嚴、有自由的“高等種族”的體面日子。

傅高義這種“知識分子”，在西方被稱為 Liberals，據說是專為弱勢群體和少數民族打抱不平的。不料此公卻寫了部煌煌鉅著，專為獨裁者歌功頌德不說，還公開宣揚種族歧視，把中國人民打成了不配享受與西方人同等待遇的劣等民族，真是莫大的諷刺。

注釋：

- 1, 《專訪傅高義》，《亞洲周刊》26卷22期。
- 2, 《鄧小平不是啟動改革的人》，《新史記》記者柯宇倩，《新史記》第6期。
- 3, 《〈陳希同親述〉選讀》，<http://www.isunaffairs.com/?p=6340>

4,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завещание (Последние мысли Г.В. Плеханов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http://www.ng.ru/ever/1999-12-01/plehanov1.html>. 中文非筆者譯出，而是引自鳳凰網轉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上的譯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sulian1977/200908/0818_7734_1307834_5.shtml

5, 《不能用今天的形勢要求當年的鄧小平》，《新史記》記者高伐林，《新史記》第8期。（蘆笛）■

真實的鄧小平： 評傅高義新著

西方一些觀察家覺得不可思議：鄧小平一方面如此積極地推進經濟改革，另一方面卻如此頑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鄧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實這裡根本就沒有什麼矛盾。鄧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讓跟中共有關係的權貴精英獲得財富，一方面則保護中共的權力。

假如一項科學實驗揭示了一種新現象，科學家會感到高興。假如一項試驗沒能顯示科學家事先預計的東西，這也可以算是一種值得分析的結果。讀傅高義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一書，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這種“預計之現象未現”的感覺。“人權”這個詞沒有在書後的索引中出現，而這種忽略並不是索引製作者的疏忽。這本書的一個特色就是系統性地不考慮人權問題。

屠殺才能保證穩定？

毛澤東在 1976 年 9 月死去。從 1979 年直到他 1997 死去之前的幾年，鄧小平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及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雖然有時候名義上不是。在中國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們知道鄧小平，主要是因為他在 1989 年決定調遣野戰軍開著坦克進入北京市中心，進行人們後來所說的“天



鄧小平長期以來跟隨毛澤東，是中共領導層重要成員。

安門屠殺”，即血腥鎮壓在天安門廣場及四周進行和平抗議的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全世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對鄧小平的決定持有不好的看法。2011年2月22日，在“阿拉伯之春”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說：

“擋在坦克前的人被碾過去了。中國的統一要比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更重要。……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坦克調遣到那裡對付那些人。這不是開玩笑。我就要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確保這國家的一部分不會給拿走。”

鄧小平所樹立的屠殺有用的榜樣，卡扎菲可說是心領神會。

哈佛大學榮休社會科學教授傅高義在書中用了一章來重述天安門屠殺的事情。他給那一章取的題目是“天安門悲劇”。在那一章的結尾，他小心謹慎地（而且似乎也是頗為苦惱地）一一探討了人們可能會評價那一“悲劇”的各種看法。最後，傅高義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我們可以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的20年裡，中國享有了相對的穩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驚異的經濟增長。……與1989年相比，當今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可以獲得來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國人的教育水平和壽命持續快速增長。跟上一個世紀相比，由於這些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中

國人如今對中國所取得各項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這些話顯示了傅高義基本上贊同中共宣傳部在過去 20 年裡一直在宣傳的論點，即“穩定”和經濟發展證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天安門鎮壓是合理的。每當外賓或外國記者提出天安門屠殺的問題，中共領導人的回答都是始終一貫的：假如鄧小平沒有採取“果斷的”（也就是殺人的）措施，中國社會就不可能獲得後來的穩定，中國經濟也不可能繁榮。

然而，中國政府這套宣傳的另外一些方面則顯示，即使是這種論點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這套東西。假如鄧小平的“果斷行動”真的是導致了經濟增長，而中國人民也清楚這種因果關係，那麼，人們就應當看到，中共的宣傳部門會大力宣講“天安門鎮壓”。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過去的這些年裡，中國官方形容當時的屠殺事件的說法不斷縮水。一開始是說“反革命暴亂”，然後是“動亂”，再後來是“風波”，最後是“折騰”。中共領導人很明白，當時發生的事情是他們歷史記錄上的一個極端醜惡的汙點，於是，他們急於讓世人儘快忘記那些事情。

傅高義對中國和美國是否雙重標準？

那麼，中國享有了“穩定”的說法又該怎麼看呢？當時的鎮

壓真的是帶來了穩定了嗎？難道事情就像傅高義所說得那樣，跟以往相比，“中國人如今對中國所取得各項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嗎？假如確實如此，為什麼中國政府現在需要耗費巨資（據報導其數額之高超過中國全部軍費）來用於所謂的“維穩”，以便遏制和鎮壓抗議、示威和其他“群體事件”呢？

不過，為了辯論，我們姑且假定天安門鎮壓確實是導致後來的穩定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但如此假定之後，我們依然需要問一個問題：為了穩定和經濟增長就可以動用天安門屠殺那樣的殺傷性力量嗎？這裡牽涉一種基本的人權原則，即不能用暴力的手段來剝奪一個群體的生命（即使那個群體是少數人）來服務於另一個群體（即是那個群體是多數人）的物質利益。

1984年4月27日，羅納德·里根總統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發表演說。他說：

“我們對自由的渴望導致了美國革命。那是爭取人權和獨立、反抗殖民統治的第一次大起義。我們當時知道，假如我們不願意跟所有的人一起獲得自由，我們每一個人就不能享受到自由。我們也知道，假如我們所有的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護，我們的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中國的媒體當時只是部分翻譯了里根總統的演說。但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里根總統的那些話讓他們第一次接觸到現代的

人權觀念。傅高義的書讓人只有兩種可能的解釋，這就是要麼作者不認同這種人權觀，要麼他對中國和美國是雙重標準。

傅高義認為鄧小平的“使命”是讓中國“富強”，但他對鄧小平可能想到的中國的富強問題沒有多少話說。中國的富強會類似於美國嗎？類似於英國嗎？類似於日本嗎？類似於新加坡嗎？或者，中國要開創一種全新的富強模式嗎？傅高義寫道，“在1978年，鄧小平還沒有一個清晰的藍圖可以讓人們富裕起來、讓國家強盛起來。”

這句話需要分成兩半來理解。這話的前一半是正確的。遲至1980年代中期，人們還是難以看到鄧小平有什麼藍圖。但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傅高義這句話的後半。這一半有一個暗含的答案，這就是鄧小平最終關心的是讓“人們”獲得財富，讓“國家”獲得強盛。就像現在的傅高義一樣，當時很多中國人自然而然地願意相信這一點，至少是姑且相信。但事實卻是另外一回事。

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鄧小平的“富強藍圖”開始出現。傅高義在書中用了四頁的篇幅講述中共十三大，卻漏掉了十三大的一項關鍵性決定，即所謂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政策。所謂的“中心”是“發展經濟”，兩個“基本點”則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

發展經濟和“改革開放”政策扭轉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政策，因此被認為是進步的，受到了中國國內外的歡迎。但關鍵問題是鄧小平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1，社會主義道路；2，無產階級專政；3，共產黨的領導；4，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這四項基本原則當中，真正重要的是第三項。於是，鄧小平給中國帶來的“變革”（傅高義語）早已經讓其他的變革變得毫無意義。第三項基本原則是理解鄧小平所設想的“中國富強”的關鍵。那項原則也為“改革”和“開放”究竟能走多遠劃定了界限。

就“開放”而言，傅高義告訴我們，“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中國人）可以獲得來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我不禁想問，“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這種說法是否立得住。我現在想到了唐朝時期的中國（公元618至907年）。當時，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四處傳播，最終成為中國的主要宗教。今天的中國又如何呢？在美國國務院最近發表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當中，中國被列為世界上宗教自由記錄最惡劣的八個國家之一。

傅高義正確地指出，“開放”政策當中的一個時髦說法是跟外部世界“接軌”。但這種接軌幾乎全部是商業和出口的接軌。在報紙和電視方面，中國跟西方國家、台灣或香港沒有多少接軌。



1987年，鄧小平與朝鮮金日成主席熱烈擁抱。

這方面的軌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實際上跟毛澤東時代幾乎毫無二致。互聯網在中國成為一個重要的、新的信息來源，但這種信息來源的形成並不是得益於政府的政策提倡，而是政府的打壓政策未能奏效。在鄧小平還在掌管中國的時候，中國政府推出了第一批管卡中國互聯網的限制措施。

中國當局如今對互聯網的限制措施五花八門，從過濾屏蔽

巨量的“敏感詞”，到對整個一個地區實行斷網幾個星期幾個月。在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期間，中國當局為了自己的國際形象，一度暫時放鬆了互聯網管制。但奧運會結束之後，那些管制措施立即恢復。十分清楚的是，鄧小平心中的“接軌”從來不包括國際社會視為人權一部分的信息自由。

鄧小平政策中另一關鍵詞“改革”

鄧小平政策當中的另一個關鍵詞“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觀察家指出，自鄧小平時代到現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國當局不可動搖的原則。（傅高義選擇不直截了當地說出這一點，但在題為“被改變的中國”的最後一章裡，他間接地承認了這一點。他在那一章列舉了一大串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所發生的變革，但其中沒有一項牽涉政治體制民主化。）於是，堅持黨的獨裁地位也就使鄧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例如：

在軍事方面，傅高義書中有一章，題目是“軍隊：為現代化做準備”。但是，這裡的“現代化”只是涉及武器裝備和效率，而不是文官政府對軍隊的控制之類的事情。中國之外的人大都不瞭解中國人民解放軍並不是一支國家的軍隊，而是一支中共的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靠全體中國人民所繳納的稅款養活，

但中國人民解放軍只是聽命於中央軍委，而中央軍委是中共的一個機構。到了關鍵的時候，如 1989 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衛的是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國民的利益。鄧小平從來沒有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但在 1980 年代關鍵時期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他很知道占據軍隊最高職位就可以凌駕全國。

在教育方面，鄧小平時代最初的一項改革就是重新開放中國的大學。中國大學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關閉。傅高義解釋說，世界銀行對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的頭一批貸款就是支持高等教育的許多方面。由於這些原因，一些人便認為鄧小平從總體上說是“支持教育”的。但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鄧小平只是把教育看作一種手段，其目的是實現他心目中的現代化，而不是給中國社會帶來廣泛的好處。他知道他需要經濟和技術的專業知識來搭配中國廉價的勞工。但對兒童的教育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從 1980 年代開始，千百萬來自農村的民工湧入中國的城市。他們在建築、衛生和其他體力勞動行業出售他們的勞動。他們使鄧小平有可能成就其“經濟奇蹟”。但是，在中國政府的戶口登記制度之下，他們依然是農村人，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各種權利。他們的子女即使是在城裡出生，也不能登記為城市居民，因此也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樣就學。

順便說一句，這種戶口登記制度並非中國的發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入侵中國的日本人引入中國的。日本人當時是要阻止中國人口流動，以便防止民間的抗日活動擴散。（中文裡稱呼專門管戶口登記的“派出所”一詞就是來自日文。）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鄧小平這位所謂的“教育改革者”一直堅持這種戶口登記制度，不管它給教育帶來什麼後果。他的後繼者也是照樣堅持。傅高義在其書中有一次提到了這種戶口登記制度，說來到城裡的農民“試圖偷偷地跟親友住在一起”，導致中國領導人擔心“大批的農村移民會讓城市的服務設施不勝負荷，城市難以為他們提供住房、就業和子女教育”。

讓億萬人“脫貧”說法本末倒置

在個人自由的擴展方面，鄧小平時代在很多方面跟毛澤東時代大不一樣。在毛澤東統治下受到殘酷迫害的人在毛死後獲得了喘息，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個人空間也有顯著的擴展。在我所從事的科學領域，僵硬的意識形態有所鬆動，科學家們不再必須用馬克思的《數學手稿》做教本。那本蘇聯出版的小書即使是按照十九世紀的標準也已經過時。毛澤東死後，所有的人一律穿藍色衣服的景象開始消失，人們衣著的不同顏色和

樣式開始出現。羅曼·羅蘭的《讓·克里斯朵夫》和米哈伊爾·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之類的書獲得解禁。人們一度還可以偶爾地（如在 1979 年民主牆期間）公開批評政府。

但鄧小平為什麼要脫離毛澤東式的獨裁統治呢？他是出於人道精神，同情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嗎？或者，他是看到中國社會正在覺醒，要求更多的變革，於是便採取實用的策略，以便讓中共得以繼續控制中國社會嗎？很有趣的是，在判斷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可以說得天獨厚，因為上述的很多自由最先都是出現在中國的大學校園裡，而我在大學任教。我所看到的每一項自由的進步都是學生和教師奮力爭取得來的，而不是中國當局自上而下賜予的。鄧小平只要出面，他所發揮的作用就是限制自由的擴散。他在 1979 年對民主牆的鎮壓明確展示了他的政治底線，這就是絕對不允許人們哪怕是稍微侵犯一點他的權力。他在 1983 年發動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甚至涉及到了女學生的穿著打扮。

在經濟方面，這可以說是鄧小平政策成就最明顯的領域。對此傅高義說了很多。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 上昇為世界第二，中國持有 11,700 億美元的美國債券，等等等等。西方國家近來處於金融危機陰影之下，很多西方觀察家因此便誇大了中國的成就。然而，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國的 GDP 依然是台灣的

四分之一，韓國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此外，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主要是其有競爭優勢的廉價勞動力製造的低價位產品。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有過這種 GDP 優勢。在 1820 年，在清朝時期，中國基本上是農業經濟，中國那時的 GDP 六倍於工業化的英國。但英國有炮艦。所以，鴉片戰爭一來，英國便打敗了中國。

中國政府喜歡聲稱推行了一個最偉大的經濟發展項目，讓上億人脫離貧困，而這種改善窮人生活的經濟大發展是史無前例的。一些西方人有時也會跟著中國政府這樣說。傅高義告訴我們，由於“中華帝國自漢代形成以來的兩千多年中所發生的最根本性的變革”，“與 1989 年相比，當今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舒適得多。” 在這種說法當中，“貧困”、“饑饉”之類的詞語從來沒有足夠精確的定義，可以讓研究者對歷史各個時期進行定量的測量評估。這種情況導致一些不熟悉中國歷史的人以為，中國兩千年的歷史就像是今天的索馬里。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中國歷史上確實有很多貧困和饑饉的紀錄。但從量化的角度而言，很難說中國的貧困和饑饉平均而言比世界其他地區更甚。那種認為中國兩千年的歷史就是長期的貧困的看法跟我們所知的人口增長和下跌狀況不符。戰爭和外敵入侵常常導致人口下跌，但在和平時期，人口總是快

速增長。毛澤東在 1959 到 1962 期間製造的大饑荒導致三千萬或四千萬人死亡。那場大饑荒向我們顯示，在饑荒時期，懷孕率大幅度下跌，人口增長放緩，甚至停止增長。和平時期的人口增長是中國長期歷史當中的典型現象，說明貧困饑饉不是主流現象。說鄧小平推行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消除貧困和饑荒的項目，這種說法不過是一種政治誇張宣傳。

另外，所謂的鄧小平讓億萬人“脫貧”說法也是本末倒置的。在毛澤東之後的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靠的是億萬中國人的苦力勞動。中國的勞工沒有工會，沒有自由的新聞媒體，沒有中立的司法，沒有美國人所享有的“職業安全和管理局”規章的保護。出大力的完全是億萬中國勞工。中國的億萬勞工不但改善了自己的境況，更是改善了共產黨權貴的生活，許多權貴們的奢華直上云霄。世界銀行發表的數字顯示，測量人口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在鄧小平推行其改革前是 0.16，現在則達到了 0.47，接近於最高點。這種巨大的變化跟“億萬”中國人沒有多少關係，倒是跟鄧小平在改革開始時說的一句話很有關係。鄧小平當時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鄧小平從來沒有明確說明他究竟是想讓哪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讓中國人自己去猜。就我個人而言，1980 年代後期發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驚訝的事件，讓我徹底清楚地明白了鄧



1989年，鄧小平會見來訪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

小平葫蘆裡到底要賣的是什麼藥。

傅高義似乎不知道鄧小平還有這一套

1987年1月，我在合肥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鄧小平政權認定我帶頭提倡“資產階級自由化”，於是把我開除出中國

共產黨，並把我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無論我走到哪裡，即使是我到外國參加學術會議，也受到監視。在 1988 年 8 月 8 日到 29 日，我到澳大利亞珀斯參加第五屆廣義相對論格羅斯曼研討會。然後，我到堪培拉、悉尼、墨爾本和其他地方走訪了一些大學。我所到之處談的都是物理學。但一些中國留學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請我談中國的事情。在堪培拉，他們問我，我對大學校園裡學生們用來提出問題、表達批評的小字報怎麼看。我儘力講述了我所看到的東西。我記得看到一張小字報說，“一些中央領導人或他們的子女在外國銀行有存款賬戶。”

我還沒離開澳大利亞，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開始打電話給我，向我報告了驚人的消息，說鄧小平通過中共的渠道發話了，說是方勵之說什麼“外國銀行存款賬戶”，這是對他的誹謗。這些朋友說，鄧小平準備對我提出起訴。聽到這些話，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個留學海外的中國學者和學生都有外國銀行賬戶。這種事情盡人皆知。說有人有“外國銀行存款賬戶”怎麼就能構成誹謗呢？而且，假如鄧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徑。大家都知道，在中國，黨的權力超越法律，而鄧小平又在黨的權力的頂尖，他何必動用法律呢？對他來說，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辦法多得很。

我那年 9 月回到北京之後，在政府內部有熟人的朋友堅持說，鄧小平正在準備跟我打官司。他們告訴我說，中共內部通知說，方勵之的誹謗將“通過法律解決”。但我還是不能相信，直到銷量超過《人民日報》的《參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並且詳細地說明了我的哪些話如何構成了誹謗。

這下子氣氛真的是緊張起來了。一些謠言開始四處流傳，說是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即將對我發出傳票。一些當律師的朋友開始提出要為我組織法律辯護團隊。《參考消息》的一些讀者給我發函，告訴我應當在法庭上如何為自己辯護。一些人還主動開始收集中國高級官員及其子女在外國銀行的帳戶信息，以便讓有關的事實充當我的辯護。一些外國記者聞到了風聲，變得非常激動起來。鄧小平要跟方勵之對簿公堂？太棒了，這絕對是一個大好的新聞標題！

但法庭的傳票始終沒有送達到我這裡。到了那年的 11 月上旬，中共中央統戰部的一個高級官員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說，我不會吃官司。她說，我不會吃官司是因為中國駐聯合國使團的一個律師對鄧小平解釋說，方勵之沒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誹謗官司沒法打。

我當時進行了一番反思，終於明白了鄧小平或許並沒有白費力氣。他很可能達到了他一開始就想達到的目的。他所說的讓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學生在小字報中所說的“中央領導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對有人公開提出這種事情超敏感。中國人民絕對不能有這種想法。假如他們有了這種想法，他們就應當明白這種想法絕對不能說出口。

鄧小平怎樣才能讓人們明白這一點呢？對我提出法律起訴看似毫無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擴散全國，就能產生一種強力的震懾恫嚇效應。鄧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長而豐富的職業生涯中有很多這種精明算計的例子。傅高義雖然寫了一本數百頁的書講鄧小平，但似乎是不知道鄧小平還有這一套。

西方的一些觀察家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鄧小平一方面如此積極地推進經濟改革，另一方面卻如此頑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鄧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實這裡根本就沒有什麼矛盾。鄧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讓跟中共有關係的權貴精英獲得財富，一方面則保護中共的權力。動用黨的軍隊鎮壓威脅中共權貴的財富和權力的學生抗議，這跟鄧小平的那些基本原則完全一致。

傅高義的書的一個好處是收集和組織了大量的材料，顯示了幾十年來中國上層的權力鬥爭。我們由此得知鄧小平如何運用計謀保護自己的同黨，如何瓦解他的敵手；他如何失勢，得勢，再失勢，再得勢，最終上升到中共王朝第二代的權力頂峰。傅高



方勵之

義收集的材料對研究中國高層權力鬥爭的人會很有用處。

但這些事情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顯明了中共體制內如何通過內部利益集團的競爭過程來選擇高層領導人，而這些過程跟那些利益集團之外的中國人民沒有多少干係。因此，那些上升到權力高層的中共領導人一心一意為權貴們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這一點也不會讓我們感到意外。我們不能指望如此選出來的領導人會關心普通的人民，會在乎怎樣做事才會對中國最好。（方勵之。《紐約書評》雜誌 2011 年 11 月 10 日，美國之音中文部翻譯）



鄧小平小心翼翼地 重整破碎山河

——評傅高義《鄧小平時代》

本書並非充滿溢美之詞，但某些段落讀來確有幾分像是鄧家授權的傳記。如果中國的歷史學者在從事他們具有顛覆性的職業時，能有朝一日不受控制和審查，他們一定會有這樣的評價：中國人對於鄧小平的崇敬，應遠遠超過毛澤東

如果中國的歷史學者在從事他們具有顛覆性的職業時，能有朝一日不受控制和審查，他們一定會有這樣的評價：中國人對於鄧小平的崇敬，應遠遠超過毛澤東。毛澤東曾領導中國共產黨打敗日軍和國民黨，並在 20 世紀 50 年代統一中國，但他隨後又使國家陷入了大躍進造成的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混

亂。而鄧小平則小心翼翼地重整破碎的山河，使中國充滿信心，推向了再度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復興之路。

某些段落像鄧家授權的傳記

傅高義這部厚重的傳記，寫得很有敘事技巧，富有高超學術水準，闡明了應當對鄧小平更崇敬的理由。傅高義在哈佛大學任教多年，曾在 1979 年出版暢銷書《日本第一》，之後他的主要研究興趣轉向中國，並在 20 世紀 80 年代花時間研究廣東的經濟改革。書中引述的資料來源和鳴謝對象，都顯示出他交友廣泛、學識淵博。儘管在超出西方漢學的常規領域時，其論述或可商榷。例如，他對英國和香港政治的瞭解就頗為欠缺。

本書並非充滿溢美之詞，但某些段落讀來確有幾分像是鄧家授權的傳記。書中或會提及鄧的缺點，但給出的總體評價中，展示其瑕疵時卻是手下留情。雖然我們再次得知，20 世紀 20 年代鄧小平少年時在法國務工的經歷，使他終生都愛吃法式羊角麵包，然而對於他後來在內戰中的軍事成就，描述卻十分簡明扼要。更有甚者，對鄧小平 1949 年至 1952 年間在中國西南部（包括他的故鄉四川省）的治理，僅一頁半的篇幅輕輕帶過。而鄧小平那段時間的作為足稱殘暴，並贏得毛澤東的賞

識，大地主遭攻擊和殺害。有一天我們一定能對鄧小平當時採取的手段瞭解更多，那絕對不是神經脆弱者能夠承受的。

在 20 世紀 50 年代的“反右”運動中，該書對鄧小平充當毛澤東執行者的歷史幾乎沒有談及。那段時間有近 50 萬名知識分子被送去勞改。1958 至 1961 年的大躍進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導致 4500 萬甚至更多人死亡（他在打台球時弄傷了腿，用病假做藉口缺席那些麻煩的會議），鄧小平在這個時期小心翼翼避免個人麻煩的做法稱不上英雄所為。當時幾乎有 1000 萬四川人餓死。

不過，鄧小平招致最多批評的，還是他對經濟發展和政治



抗日戰爭初期的鄧小平。

自由兩者關係的糊塗看法。在 20 世紀 80 年代，與經濟強硬派陳雲的政策紛爭中，他一直反對如果黨放棄經濟控制權，遲早會失去國家控制權的觀點。對於鄧小平和他圈子裡的人，放鬆經濟控制權對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至關重要，而如果不能實現經濟增長並解決就業，共產黨肯定會失去對國家的控制。這兩種說法可能都是成立的，中國主要的生存挑戰至今仍然是如何解決這個兩難局面。

這個問題曾在 1989 年，在天安門廣場周圍，以血腥的方式得到了解決。用傅高義的話說，那是“一場異常巨大的悲劇”。許多人看待鄧小平生平時，都是通過這起災禍的棱鏡，這或許不公平，但不可避免。我們當中，在鎮壓前剛好身處北京的那些人，不可能不對北京街頭發生的史詩般的浪漫運動嘆為觀止。一些熟稔政局者，曾經對我們說過，這一切都會以眼淚告終，鄧小平的畢生經歷都顯示出，他永遠不會接受共產黨的權威受到挑戰。我們本應更關切地傾聽他們的意見。

“看待民主就像葉公好龍”

傅高義在書中寫道，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省委書記說，鄧小平看待民主，就像葉公好龍——葉公子高好龍，於是夫龍聞

而下之。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葉公好龍”這則廣為人知的故事，習慣上用來比喻言行不一。

傅高義對經歷“文化大革命”混亂之後鄧小平穩定中國的角色闡述得當，鄧小平和他家人在文革中也承受了苦難。實際上是鄧小平讓火車又開動起來，讓人們沒有互相報復就重新開始工作，還恢復大中小學教育。他開始成功地讓中國免於傾覆，而這個成功又令他在1976年第二次被毛澤東打倒。偏執多疑的毛澤東懷疑比他年輕的鄧小平並不會堅定地擁護“文化大革命”，嫉妒鄧越來越強的聲望，恐懼鄧會在毛本人去世後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譴責已故的獨裁者。

華國鋒在1976年晚些時候繼承毛澤東的權力後，很快就被說服重新啟用鄧小平這個中國最好的務實派。儘管華國鋒逮捕了毛澤東的遺孀和“四人幫”的另外三個成員，表現出極大的決斷力，但他在政治上卻無法與精明的對手相抗衡。鄧小平排擠和打發了華國鋒，顯示出大師級的冷酷政治手腕。華國鋒被剝奪了權力，遭到羞辱，不過並沒有入獄。

就思想而言，鄧小平果敢的務實主義，“實踐檢驗真理”，戰勝了華國鋒被戲稱為“兩個凡是”的理論——凡是毛澤東說過的和做過的，就一定是正確的。這條路線使中國向世界開放，引發了農業和工業管理的改革，促成了許多年令人驚嘆的

經濟增長。今天，中國一天的出口額，幾乎相當於改革真正開始的 1978 年 12 個月的出口總額。

因鄧小平而脫離貧困的人數空前

鄧最初的實驗是在福建和廣東進行的，很有可能成為中國下一屆領導人的習近平的父親，曾在廣東擔任省委書記。傅高義以前就曾撰文講述過鄧小平時代中國的經濟調整和農村改革，其開端就是在與香港一河之隔，以前一直沈睡的漁村深圳周圍，建設一個經濟特區。那裡歡迎外資，吸引並模仿境外技術，當然也有盜版。對經濟的指令式控制，在那裡部分為市場和利潤追求所取代。傅高義對這段故事的描寫十分權威，高潮是 1992 年鄧小平的南巡，讓改革者吃了定心丸，也給他的繼任者江澤民極大的鼓勵。

鄧小平從來都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理論家，正如傅高義所說，批評他未能對自己所做的事業提出一個概括性的哲學理論是不公平的。有時候，只要集中控制一放鬆，經濟活動就會很容易發展起來。鄧小平本人就曾稱讚過鄉鎮企業的自發湧現。

我們應當怎樣描述發生的這些事件？它們似乎與社會主義並沒有太大關係，例如，在 1997 年後中國經濟的十年高速增



曾被中共罵為“千古罪人”的前香港總督彭定康。

長中，工人工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53%下降到40%。無論在經濟學上該如何正確地命名，威權主義的一黨專制從未遭到摒棄。或許最恰當的描述應該是“市場列寧主義”。

闡述鄧小平的治國藝術時，傅高義列出了支撐鄧的統治的一系列原則。其中有若干條，別的政治領袖也會採納，包括為了保護王者的地位和自己的權柄無情地捨棄下屬。鄧小平先是因為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對待學生示威過於溫和，而在1987年罷免了這位政治改革者；後來又在1989年天安門抗議事件

中解決了趙紫陽。鄧小平的首要信條是保護自己的權威和黨的權威。至於這對於中國的轉變是不是至關重要，仍然會是辯論的主題，而辯論也會越來越開放。無論答案如何，傅高義有力地闡述了這樣一個觀點：因鄧小平而得以脫離貧困的人數，比歷史上任何人都要多，為此他應該得到嘉許。（彭定康著，何黎譯，FT 中文網。作者彭定康勳爵是 BBC 委員會主席，牛津大學校監，曾任香港最後一任總督）■

鄧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

鄧小平真正改變了中國，新出版的由傅高義執筆的這部《鄧小平時代》是迄今最完整的、也是最雄心勃勃的。但是，這部有關鄧小平的最新傳記是否也留下了盲點？

鄧小平是大家知之甚少的 20 世紀最重要的領導人——除非你是中國人。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多數人完全明白，正是拜鄧所賜，他們得以擺脫貧窮，中國得以躋身世界領先的工業國家行列。然而，在世界其它地方，T 恤衫上印著的始終是毛主席的頭像。鄧在 1997 年去世，毫無疑問，在他的祖國以外，他很少被當作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當代政治家。

迄今為止最有雄心的鄧傳

這有很多原因。毛之所以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象徵符號，

是因為他發動的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與當代全球性的年輕人反叛權威這一點是個完美的切合。即使全世界現在已更清醒地認識到他的罪行世所罕見，但罩在他頭上的那種蔑視法律的時髦光環依舊沒有消失。（在某些情況下，毛那種赤裸裸地擁抱群眾暴力的激情或許還增添了他的吸引力。）與此相反，鄧的市場化改革更加微妙，更加循序漸進，他的武器不是令人熱血沸騰的遊行，而是達沃斯論壇上的講話。其成果儘管令人瞠目結舌，但很難說散發出了讓人心潮澎湃的魅力。

不過，鄧的一生是漫長的、非凡的，充滿了戲劇性，對全世界來說也意義深遠。他的一生值得被仔細爬梳。所以，我們必須感謝哈佛大學的教授傅高義，他把自己學術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花費在編撰這部煌煌巨著——《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上，這是到目前為止有關鄧的最有雄心的作品。傅高義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似乎仔細研讀了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到現在發布的所有會議文件。（我不能說自己很羨慕他有這份苦功，但，這事兒總要有人去做。）

在此之前也出過幾本鄧的傳記——從用詞簡約的楊炳章（Benjamin Yang）、文雅的前外交家理查·伊文思（Richard Evans），到一絲不苟的分析人士邁克爾·馬蒂（Michael Marti），但是，傅高義的作品可以算作是最完整、最有資訊含量



鄧小平的“牛仔帽”形象。

的一本。(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曾經寫了一本書, 認為鄧小平和他的時代活力非凡, 但是, 那本傳記中並沒有太多內容。)

令人失望之處

傅高義的作品鉅細靡遺, 這當然算是件好事。但是, 這本書中, 有些地方也讀得讓人疲憊不堪。比如部分章節名稱是諸如“經濟調整和農村改革, 1978 – 1982”之類。如果, 你想專門瞭解鄧的職業生涯, 你絕對可以在這本書裡找到; 但是, 如果

你想瞭解他的生活，那麼你恐怕會覺得這本書有點令人失望。傅高義或許並不贊成工作是最重要的，但在某種程度上，事實的確如此。一本傳記，從文體上說，就應該講一個故事，最好還是讀者不必費力就能解讀的故事。基本事實是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威廉·陶伯曼(William Taubman)在創作赫魯曉夫的傳記時，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他還是用諷刺的語氣完成了對赫魯曉夫的描摹。而傅高義則相反，似乎相當快地就跳過了他心目中的英雄經歷過的困苦、黑暗的一面。鄧小平一生中大量的謎團、令人驚愕的幕後陰謀，以及四川人的辛辣氣息，在書中基本沒有反應。(註1)

傅高義自20世紀60年代就經常去中國，多年來，他與鄧的親屬和中共內部高層官員建立起了密切的關係，這種接觸無疑豐富了他的作品。每當傅高義揭示出一些真正的爆料，往往都不是來自文件，而是披露了內部人士的觀點。我最喜歡的一句是鄧的小兒子所說的：“我父親認為戈爾巴喬夫是個傻瓜。”

你可以認為，這樣不經意的一句話是鄧的職業人生的基石，也是中國與蘇聯採取完全不同路線的根本所在。1956年，已經渡過30年坎坷職業生涯的鄧，率領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蘇維埃共產黨第20屆代表大會。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赫魯曉夫發表了決定蘇聯未來命運的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

告”。(註 2) 像其他外國與會者一樣，在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罪行和政策失誤時，中國人並不在場，但是，他們很快就瞭解到了足夠的資訊。

戈爾巴喬夫在那時還是個年輕的自以為是的傢伙，後來，他努力推進赫魯曉夫在政治開放方面的想法，但從未建立起與之配套的經濟政策。鄧在那時則已經是一個經歷過數十年血腥政治鬥爭的老練的官員，因此，他能夠得出和戈氏完全相反的結論。他意識到，如果你的政治體制把領導人們奉若神明，那麼把他們還原成人的結果就會從根本上變得不穩定。最好還是把神繼續供在神壇上，同時把精力放在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上來。當他在 70 年代末掌權之後，鄧就決定首先把經濟放在第一位。儘管他和其他數百萬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整肅，但他依然確定要維護毛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超級英雄地位。

這被證明是一項令人驚異的成功戰略。鄧和他的黨內同志們在 1979 年所進行的改革，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脫貧行動。在過去 30 年裡，中國擁抱了市場，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如傅高義所寫：“當鄧在 1978 年成為最高領導人之時，中國與世界的貿易總額只有不到 100 億美元。30 年之後，這個數字已經擴大了一百倍。”

毫無疑問，鄧擴大了很多中國人的個人自由空間，儘管他曾

經無情地捍衛中共的領導地位，拒絕從根本上進行民主改革。1989年6月，鄧選擇用殘酷的武力鎮壓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學生示威抗議，這給他的聲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汙點。但是，經濟自由化沒有止步，他向那些保守派批評人士證明了自己捍衛共產黨地位的能力，這一點不可小覷。傅高義花了大量篇幅描述鄧在1992年的“南巡”，他在“南巡”中高度評價自己在70年代末期實施的經濟特區計劃。這次出行讓經濟改革者們更加大膽，讓他們在與對手的較量中獲得了巨大的優勢。中國從此沒有走回頭路，今天，世界都為之歎為觀止。

在鄧小平76年的職業生涯中，前半段他一直追隨著偉大領袖，同樣也會忽視他人的生命。（據傅高義所寫，鄧在多年擔任軍隊政委期間，因無懼在必要時犧牲士兵的生命而名聲在外。）但漸漸地——或許是在50年代末餓死4500萬人的災難性的“大躍進”時——鄧放棄了“毛主席永遠正確”的幻想。1961年，鄧在黨內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說他篤信老家四川的一句諺語：“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鄧用他自己的方式，向黨呼籲把經濟效率放在革命精神之前，毛當然理解這種呼籲是對他的路線的一種挑戰。就是這種意見分歧讓鄧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後來又在1976年周恩來去世之後，陷入了幾乎致命的絕境。鄧小平總共被他的對手打倒了三次——但每一次他又

積蓄了更大的力量東山再起。

1977年，鄧第三次重返黨內，這已是黨令人矚目地實現了打倒毛的極端教條主義的遺孀江青和她的盟友（臭名昭著的“四人幫”）之後的事。傅高義明智地緊接著鄧的這一次回歸而大書特書。據我測算，在這本928頁的書中，對1978年-1979年間事件的描述，足足有263頁，鄧在這段時期最終成為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並開始了他的改革計劃。他從其它東亞國家借鑑了許多經驗，但沒有公開這麼說。那些國家已經找到了一條威權制度下以市場為導向的現代化之路。或許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就包括了“變節的”台灣省。

美國人總是憑直覺把改革和創新與年輕劃等號，但是，鄧在開展這一驚心動魄的變化歷程時，已經年過七旬。傅高義高超地把中國巨變的政治細節呈現在讀者眼前。

關於鄧小平的故事依然不完整

然而，他在描述鄧不那麼光彩的一面時，並沒有展示出大師風範。僅舉一例：傅高義在描述1957年“反右”運動時，說鄧在毛的命令下主導的這場運動是“對55萬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的知識份子的瘋狂攻擊，這場運動摧毀了中國許多最優秀的科

學技術人才，讓另外許多人被邊緣化。”他寫道：“一些知識份子自命清高，肆意批評政府官員，其實，這些官員也有自己的困難處境。這讓鄧非常惱火。”僅此而已嗎？傅高義絲毫沒有提到這場運動受害者遭到虐待、被逼自殺、在勞改營中被判刑，以及被流放，有時長達幾十年之久。

當然，傳記作家用其書中主角的視角審視一切，這個理由無可厚非。如果我們僅聽對鄧小平的批評之詞，對他的一生就會有很多地方無法瞭解。但問題是，傅高義有些過於傾向於用黨的邏輯來解釋某些事件，比如說，天安門大屠殺或西藏問題。有時，人們就很難明白為什麼其他人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80年代初，鄧粗暴地阻止了黨內知識份子的一些自由對話，傅高義一本正經地說：“西方人認為，全能的上帝能夠批判塵世間的統治者，但這並不是中國傳統的一部分。”或許我在這兒漏看了什麼，但鄧和他的同志們傾畢生之力，根據一名德國猶太人（譯者注：此處應指馬克思）的深奧理論來改造中國。這跟中國傳統有關嗎？奇怪的是，傅高義只要一提到中國傳統，就說黨確定了中國人的價值觀，不知為何，對黨的批評就不能形成中國價值觀。

傅高義並非一貫殷勤有加，他的確提到了一些黑暗面，但總是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他對鄧在1978–1979年間成為最高領導人的描述絲毫不含諷刺意味，而是說：“那是鄧為了黨



1984年鄧小平為
深圳特區題詞。

國的福祉而排擠了華國鋒的一刻。”他還提到，北京的民主牆在1978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了很多批判性大字報，那裡成了一個非同尋常的多元思想的集中地。“在那裡貼大字報的年輕人受到了他們新近獲得的自由的鼓舞，但由於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他們缺少經驗和智慧來提煉他們的判斷。”讓《人民日報》來寫的話也不過如此了。

毫無疑問，到今天為止，傅高義是最詳細地講述了鄧小平的一生的傳記作者，他應當為此贏得掌聲。如果不是他，很多珍

貴的歷史資料可能我們就不再有機會知曉。但是，這個故事仍然不完整。我在想，照此速度，那些被不為人知的故事是否還有可能大白於天下。

註釋：

1, 楊炳章 (Benjamin Yang) 《鄧小平政治評傳》(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98); 理查·伊文思 (Richard Evans) 鄧小平傳; 邁克爾·馬蒂 (Michael Marti) 《中國與鄧小平的遺產：從共產主義革命到資本主義演變》;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比較毛澤東與鄧小平時代》; 威廉·陶伯曼 (William Taubman) 《赫魯曉夫全傳》是得到了廣泛關注的一本政治人物傳記，有評價說：“在宏大的歷史敘述中加上入木三分的政治與心理分析，使之充滿了喜怒哀樂，印證了一個時代重要人物的成長。”

2, 該報告原題為《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也經常被稱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這個令全球震驚的報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時期個人迷信、血腥統治、殘酷迫害的種種罪惡，開啟了“去斯大林化”的關鍵一步。(祈士遵。美國《外交政策》)

(作者祈士遵 Christian Caryl, 《紐約書評》專欄作者、評論家)



改革開放·“六四”鎮壓· 抗拒政改

——鄧小平的歷史功過

鄧小平會見我當然不是禮儀性的，而是有意作重大政策性的宣示及傳達重要信息，中共的官方報導因而集中在鄧小平的兩岸政策之申述，雖與筆者所發表的中英文版本具有明顯的差異，但北京當局顯然認定我的說法並無錯誤，因而予以尊重，並未駁斥

1983年6月，筆者應中國社會科學院之邀訪問北京，與大陸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交流結束後，鄧小平會見，暢談兩小時，在座的還有楊尚昆、鄧力群等中共高層人士。談話內容非常廣泛，包括中國的現代化，一國兩制、香港回歸、中美關係、兩岸的

交流與統一等問題，鄧小平的談話經過官方整理後在《人民日報》發表，稍後又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現已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重要文件之一。

鄧小平的會見當然不是禮儀性的，而是有意作重大政策性的宣示及傳達重要信息，中共的官方報導因而集中在鄧小平的兩岸政策之申述，雖與筆者所發表的中英文版本具有明顯的差異，但北京當局顯然認定我的說法並無錯誤，因而予以尊重，並未駁斥。

尊重台灣政治現實

在談話中，筆者首先發言，坦率批評中共對台的武力威脅及外交孤立兩大政策。鄧小平仔細聆聽筆者的言詞，雖並不完全同意，但未曾一次打斷筆者的陳述，風度甚佳。筆者的意見完整地申述後，鄧小平作出全面性的回應，並回答我提出的問題，鄧小平思路清晰，講話鏗鏘有力，非常完整，展開魄力及強勢作風。

針對台灣，鄧小平以濃重的四川鄉音說：“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各搞各；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鄧小平強調尊重台灣政治現實，無意予以改變，他提出六點構想，並說明在統一後台

灣可以保留其現有的制度、軍隊、官員、獨立的立法權和司法權及某些外事權,甚至可以向外國購買武器,但不能因此威脅大陸。但筆者向鄧暗示,台灣堅持其現有地位,不可能接受北京的統一要求。

針對筆者對中共在國際社會孤立台灣之批評,鄧小平明確指出,北京同意台灣保留其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席位(亞銀為台灣在國際官方組織中的唯一席位),但必須改名為“中國台北”或“中華台北”,此即所謂“亞銀模式”。時至今日,台灣在奧運、世貿組織、亞太經合會議等組織仍然沿用此一模式。

至於武力問題,鄧小平表示,北京不可能放棄對台用武的可



1983年,鄧小平會見楊力宇。

能性，因一旦放棄，中國將永遠不可能統一。

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

針對香港，他說：“舞照跳，馬照跑”，在香港問題上，鄧小平雖談話不多，但他的兩點意見令筆筆印象深刻：尊重香港現狀及尊重港人意願，並堅持港人治港。（但時至今日，中共並未全面落实鄧的政策，也未嚴格遵行“一國兩制”的規定，對港人民主選舉的要求更是全力抗拒。真正的“一國兩制”，應是香港實行民主體制，大陸堅持一黨專政。真正的“港人治港”應允許香港人民選舉其領導人及選擇並採行其要求的政治體制。）

鄧小平在會見筆者後，中國官方即開始使用“一國兩制”一詞。此後，“一國兩制”即成為中共對台灣及港澳的統一模式。

在談話中，鄧小平雖未曾一次提到毛澤東，但明確認定毛澤東的武力統一等偏激政策不可行，因而改變毛的“解放台灣”政策，提出“一國兩制”及“和平統一”之說。

在談到現代化時，鄧小平展現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希望通過現代化構建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鄧雖然堅持“四項原則”及一黨專政，但在1980年代初並未完全排斥政治改革。全力推動經濟現代化的他，其政治改革主旨為體制（特別是經濟體制）改

革、取消個人崇拜及領導人終身制等政策，並主張循序漸進的體制改革。

摸著石頭進行現代化

通過與鄧小平的談話，筆者進一步瞭解鄧的政治主張、性格與作風。

鄧小平認清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是“無可救藥”；在本質上，他否定了社會主義，引導大陸走向全面的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逐步邁向市場經濟（其實是資本主義）的大道——他曾是社會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但他在獲得清楚的認識後，卻勇於自我否定。不過，當中共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時，鄧小平其實並沒有一套完整的計劃，他只是“摸著石頭過河”，逐步走出一條經改及經濟現代化的道路，他堅信經改與經建應是中國的政策核心，而政治改革必然影響大陸的穩定及經濟發展，故真正的政治改革應在經改取得重大成果後緩步進行。

他具有廣闊的世界觀，也認識到孤立政策只會延續大陸的貧窮落後面貌。他認為中國需要面對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因大陸需要西方的資本、科技、管理技術及發展經驗。

在作風上，鄧小平極少探討理論與哲理，有意超越意識形態

的束縛，但重視實務及實際效果——他為一高度務實的領袖，他的“白貓黑貓論”即為明證。

鄧小平有一強烈的“國家重於個人”的觀念，他認為，為達到國家的重大目標，個人的犧牲是必要的。

在談話中，鄧小平展現了無比的自信、固執與決斷；他具有所有強人領袖的特質：他無懼改革開放及自我否定可能對中國帶來的衝擊，他勇於往前衝刺，甚至不計後果。在必要時，他會採取必有嚴重後果的手段。

“六四”悍然採用下下策

鄧小平會見筆者後，我曾多次撰文敦促鄧帶領中國從經改及經濟開放邁向政改及政治開放，實現政經全面現代化的宏願。

1989年春，北京高校學生群集天安門廣場，反對貪腐，要求民主改革。中共的強硬派力主派軍隊鎮壓，並宣布戒嚴，引起國際社會及海內外華人的高度關注。多位海外著名學人（包括筆者及其他某些鄧小平曾會見的學者）擬聯名致函鄧，希望中共採用和平手段解決天安門學生民運，但我們在信函內容上並未達致共識，因而放棄此一計劃。因此，筆者遂通過一位大陸學人以傳真致函鄧小平，提出上中下三策之建言：

上策：通過對話、溝通，採取和平手段解決學生對民主化的要求，中共並承諾逐步推動政治改革。

中策：封鎖天安門廣場，斷水斷電，促使抗議學生離去。

下策：使用催淚彈，迫使學生離開廣場（當時曾有報導，中國並無催淚彈，但卻有外商可於 24 小時內從歐洲空運來華。——作者註）。

然而，6 月 4 日晨，筆者在美觀看電視，發現鄧小平竟然採用下下策，使用武力鎮壓學生民運——一個對中國曾作出歷史性貢獻的領袖卻作出了歷史性的錯誤決策，導致一個歷史性的悲劇。

功績：遠勝專制的毛澤東

鄧小平確也曾對中國作出歷史性的貢獻：

一、採行新經濟政策，推動大陸的經濟改革、對外開放，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政方針，促使大陸經濟逐漸走上全面發展之途，改善人民生活，也改變了大陸貧窮落後的狀況。鄧小平真正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全面失敗，大陸只有走上全面經改之途。

二、政治上撥亂反正，清除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人民公社、個人崇拜等暴政，採行比較溫和理性的政策，包括取消領導人終

身制，實行和平權力轉移等。

三、在外交上重建中國的對外關係，結束中國的孤立狀態，與西方國家建立了廣泛的交流及合作，強化中國的國際地位，並完成與美國、蘇聯等國的關係正常化，中國終於蛻變為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國家，並逐步實現大國崛起之宏願。

四、重視科技及教育，全面推動科技之研發，在國際領域裡占有一席之地。

五、對台灣及港澳採行務實政策，完成港澳的回歸，並推動兩岸的交流。

過失：未能走上政治開放

然而，鄧小平終究是“人”而非“神”，其思想與政策當然有其局限性。他比較開明，亦無毛澤東的殘暴、恐怖、極權，及緊握權力至死不放的個性。其遠見雖勝過毛澤東的偏激之見，但他也曾作出歷史性的錯誤決策：

一、鄧小平始終未能跳出其改革的局限性，終其一生未從經濟改革走上政治改革，亦未從經濟開放及經濟現代化邁向政治開放及政治現代化，他也堅決反對和平演變。鄧小平認為，只要體改不影響政治與社會的穩定，就可推行，但他始終未能體認

到民主化為一全球無可阻擋的歷史洪流。因此，在八十年代後期，當民主改革的呼聲日漸響亮時，鄧小平即斷然採取行動，力阻民主化的洪流，先後罷黜他的改革開放新政的左右手胡耀邦及趙紫陽。

二、針對 1989 年發生的“六四”事件，鄧小平力排眾議，鎮壓學生民運，造成一個歷史性的悲劇。《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發表了鄧在天安門事件後會見曾獲諾貝爾物理獎的李政道時的談話及其他有關談話，顯示他的固執個性。他承認，在天安門事件中決定使用武力鎮壓“動亂”是他的決策；他從未把此一責任推到他人身上，只是他不認為武力鎮壓天安門事件為一錯誤決策。他認為，為了維護中國的穩定及發展，對天安門事件採取斷然的措施是必要的。

三、鄧小平始終未曾全面否定毛澤東及毛的“反右”、“文革”和其他暴政。

影響：“政緊經寬”

在 1980 年代末及 1990 年代初，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紛紛倒台，但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改善中國的經濟及人民的生活，拯救中共政權。時至今日，鄧小平無疑是二十世紀的巨人，

對中國、對國際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後鄧時代，鄧小平的影響似乎仍是無所不在，從胡趙以至江李、胡溫，中共領袖仍然奉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全面發展經濟，大陸政經問題雖仍然眾多，但卻達致前所未有的繁榮。根據世界銀行及其他國際機構的評估，中國在 15 年內應可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現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工廠，也是全球最大的市場。

在政經和外交上，鄧小平為中國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近年北京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科技及太空等領域的力量出現前所未有的進展，其國際影響力大幅成長，並逐步從大國外交邁向全方位外交，其影響力遍及全球各大洲，且與俄羅斯全面合作，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對抗美日軍事同盟。近年中國的外交空前活躍，北京曾主辦甚多峰會（如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東盟與中國峰會及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等），引起國際社會的矚目。除兩岸統一問題外，中國的外交、國防、港澳政策均已取得重大進展。

然而，鄧後的中共領袖至今仍然執行鄧的“政緊經寬”（政治收緊，經濟寬鬆）政策，無意推動政治開放。鄧後中共領袖無一具有足夠的政治勇氣及政治智慧，敢於修正或改變鄧小平的一黨專政及永久執政政策。此一政策的改變恐需等待第六或第七代領袖上台後才有可能。只有經過歐美政經訓練及西方民主



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

政治薰陶的新世代中國領袖執政後，中共才可能修正對一黨專政的堅持。

鄧小平的自我評價

1997年香港回歸前數月，鄧小平逝世，甚多美、台、港媒體要求筆者評析鄧小平的歷史功過，我特別說明，鄧小平曾指出，在評價歷史功過上，毛澤東應是“七三開”，而他本人則是“五五開”——我認為，鄧小平的自我評價是相當公正的，但鄧小平如推動民主化及和平解決天安門事件，他的歷史地位應更崇高，超越所有其他中共領袖。（楊力宇）■

撒切爾和鄧小平趙紫陽 交手機密細節

撒切爾素有“鐵娘子”的綽號，以堅定、強硬聞名於世，而毛澤東早就說鄧小平是“鋼鐵公司”，鄧也素以堅定、強硬著稱。撒切爾夫人和鄧小平雙方利益對立，立場迥異，鐵擊鐵，硬碰硬，必然火花四濺、充滿火藥味

基金會披露重要私人文件

香港自 1997 年回歸中國已有 16 年之久，儘管港人接二連三舉行要民主、要自由的抗議活動，顯示北京的治理問題叢生，但考慮這顆東方明珠未來前景，或許我們可以先從歷史進行剖析。



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

根據滿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香港島及九龍割讓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國民政府理應取消所有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包含收回香港，不過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鏖戰正酣，加上英國希望保留遠東地區殖民地，遂戰後香港仍由英國政府治理。

中國人民共和國 1949 年成立，1950 年即與英國建交，

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代表權，自此時任總理周恩來便十分關注香港與澳門問題，強調中國不承認《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有權對被占領的領土恢復主權。1979年香港總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首度訪問中國，鄧小平明確提出香港前途議題，而後香港問題變成中英兩國談判桌上攻防重點，其中最關鍵事件莫過於1982年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訪華。

撒切爾夫人基金會(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網站2013年初披露其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私人文件，內容涵蓋福克蘭群島戰爭、香港移交以及其他英國國內政治問題，網站還額外收錄許多撒切爾與中國領導人來往的私人文件與信件，詳實記載許多當時並未公布於媒體之信息。以下摘錄相關的精采段落。

行前一切小心、異常謹慎

福克蘭戰爭後撒切爾夫人開啟東亞之旅，訪問的地點有日本、中國及香港，尤以中國之行意義格外重要，為往後與北京就香港回歸的漫長談判拉開序幕。這趟行程對撒切爾夫人的

政治生涯而言也是極其重大，她廣泛徵詢意見，並不只單純依靠外交與聯邦事務部。

事實上自福克蘭戰爭以後，撒切爾夫人與當時的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弗朗西斯·皮姆 (Francis Pym) 關係勢同水火，兩人儘量避免接觸，更遑論一起長途飛行——1982 年 11 月撒切爾夫人與皮姆曾短暫訪問波恩和柏林，但就算只到德國，兩人也是分別搭機。1983 年 6 月撒切爾夫人再度當選首相後，皮姆便離開了政府。

原本英國安排行程，打算讓撒切爾夫人先到日本再到中國，但 1982 年 3 月撒切爾夫人檢視計畫後說：“我認為還是先去中國比較好，與共產國家接觸永遠是一件艱苦之事，我喜歡先難後易。”

面對即將到來的中國之旅，她顯得小心翼翼、異常謹慎，對每一項細節再三詢問，確保每一個象徵意義都能順利傳達出去，決心在每一點留下強烈印象。拿衣著來說，撒切爾製作一份列表，寫著哪一套衣服穿於哪一場會議——衣服以一些特別的外號標示著，例如“菸灰”、“櫻色”、“金弓”、“英式花園”和“梅星”等。

行程安排上，撒切爾斷然拒絕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雖然有官員向她表示：“許多西方國家的政府

首腦均曾這麼做”，但顯然未能說服撒切爾夫人，她回道：“這不足以構成理由。”顯示她其堅守自己心目中的原則高於從眾心理。撒切爾夫人基金會指出，撒切爾夫人就喜歡做別人沒做過的事，同年 11 月當她來到柏林參觀柏林牆，為那些試圖跨越該牆逃到西柏林而不幸遇難者獻上花圈時，她選擇了象徵貞潔的白色百合花。

菜肴飲料和餐具都要費心

撒切爾夫人耗費了相當多的心力，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英國晚宴。她要求宴會桌子必須擺上英國海軍銀器餐具，也許是為了讓人回想起大英帝國的輝煌軍力？擔任過駐華大使柯利達（Percy Cradock）於 1994 年出版的《中國經驗》（Experience of China）中回憶道：“這些燦爛餐具只引起一些不相稱的小注意，我懷疑中國人是否能明白它們的意義，甚至體會它們的存在。”撒切爾夫人當然有理由這麼做，國家才剛打贏一場對阿根廷的勝仗，“日不落帝國”看似重返光榮。不過就算中國人無法理解，他們也不是故意的。

宴會菜單也引起反覆商討，在體面與儉約間掙扎。撒切爾夫人起初決定每人 50 元人民幣的菜色而非 75 元人民幣，總

共節省 1200 元英鎊，但外交官員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柯利達建議：“50 元人民幣規格的菜沒有魚翅和海參，可是對中國人來說，這兩道菜都絕不能在類似宴會場合缺席。”再者，“我們也不應該在飲料方面有所忽略，”因此傳統的啤酒、柳橙汁和茅台都不可或缺。撒切爾夫人讓步，這些菜後來都加到菜單上。

不過撒切爾夫人否決了另外一道飯後甜點：麵包抹黃油加草莓醬，不僅因為它不是中國本土美食，根據外交與聯邦事務部解釋，這道菜還是中蘇友好時期的一道外交菜——或許果醬在蘇聯是罕見的。最後以水果沙拉取代之。

“主權換治權”的談判方針

來到中國前進行的一些非正式諮詢中，撒切爾夫人曾被香港財政司彭勵治 (John Bremridge) 警告必須堅持“後福克蘭時代的主權強調”，同時呼籲“不要對北京卑躬屈膝”；匯豐銀行的沈弼 (Michael Sandberg) 則告訴她一個簡單原則：英國管治的基礎保持不變，移交主權只是單純的粉飾工夫；商人亨利·凱瑟克 (Henry Keswick) 也表示，中國這個農業國家“不可能讓香港經濟持續進步並提高人均水平”，因此回歸的時間

最好再往後延 100 年至 2098 年。

沈弼的建議獲得較多共識，撒切爾夫人遂以“主權換治權”為談判方針——在英國看來，因中英之間有正式簽訂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保障，此論點是站得住腳的。她也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抱持懷疑態度，1982 年 8 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撒切爾夫人說：“我知道中國人在想什麼，但同你們一樣，我對於他們的目標和方法是否適合香港感到疑惑。這趟旅行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你們能提供更多信息和觀點將會有很大幫助。”

到了中國，撒切爾夫人先跟總理趙紫陽見了兩次面，又跟鄧小平見了一次面，後來她要求與鄧小平進行第二次會面卻遭到拒絕。

9 月 22 日，撒切爾與趙紫陽兩人先就國際議題（特別是蘇聯）討論並達成共識，次日見面，便涉及關鍵的香港問題，趙紫陽直截了當地宣稱中國在香港（含九龍半島）的正當主權，在他眼中，沒什麼好交易的，也沒有主權和治權分割開來的道理，“中國不會讓別政府管理香港、代表香港，”他說。

私下曾有傳言指出，撒切爾夫人認為“如果中國收回主權，香港的繁榮將毀於一旦”，即使她本人否認，但如此話語顯然已傳到趙紫陽耳中，他一方面保證中國有能力維持香港繁榮與

穩定，另一方面也聲稱：“若不得不在兩者選擇其一，中國會視主權優先於繁榮。”

撤資問題同是雙方爭辯重點。趙紫陽說：“若中國制定了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政策，投資者沒有理由不能留在香港，否則他們要去哪裡？”撒切爾夫人隨即反擊：“他們可以去新加坡、菲律賓、甚至紐約，他們確實已這樣做。”趙紫陽承認確有這樣的人，但他說，那只是少數人。接著撒切爾夫人又拿出《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等，稱“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在國際法上仍然有效”，若要廢除需先經英國國會處理，建議雙方另立協議解決，與此同時，先讓英國保留香港治權，維持現有的繁榮穩定。趙對此不置可否，因此第一日談判未有結論產生。

“鐵娘子”碰“鋼鐵公司”

9月24日，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會面。

會面伊始，鄧小平的寒暄就頗有機鋒。撒切爾夫人說：“我作為現任首相訪華，看到你很高興。”鄧小平說：“是呀！英國的首相我認識幾個，但我認識的現在都下台了。歡迎你來呀。”



新華社照片強調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會面氣氛似乎很熱烈。

根據撒切爾夫人回憶，起初鄧小平十分有耐心地聆聽她的論點，可是當鄧小平提到若 1997 年前出現嚴重混亂，“中國政府將被迫考慮在何時用什麼形式收回主權”，現場氣氛驟變，鄧闡述“混亂”並非由政府造成，而是“由一些中國人或英國人造成，例如香港匯豐銀行，沒人知道它發行多少貨幣”。

這段談話，從來沒有被媒體披露過，直到撒切爾夫人基金會提供的私人檔案首次曝光。鄧小平的這段話，給了撒切爾夫人強烈暗示：假使中英不能明智地達成協議，香港金融就有

隨時崩潰的風險。

撒切爾素有“鐵娘子”的綽號，以堅定、強硬聞名於世，而毛澤東也早就說過鄧小平是“鋼鐵公司”，甚至還提醒他要“綿裡藏針”才好，鄧小平也素以堅定、強硬著稱，可以想像，雙方利益對立，立場迥異，鐵擊鐵，硬碰硬，必然火花四濺、充滿火藥味。

撒切爾夫人強調，若無法與中方達成管理和控制的協議，便很難回去說服國會。鄧小平詢問“控制”（control）是什麼意思？撒切爾說香港 140 年來奠基於與中國完全不同的政治及法律制度，且要有自己的貨幣系統；鄧又問，“控制”是否代表一個國家管治一個地方？撒切爾回答說主權和治權是兩回事，治權一旦改變，香港將爆發信心危機。

鄧小平以同樣的邏輯回擊撒切爾夫人：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在 1997 年收回香港，政府無法向人民交代。一旦香港主權無法恢復，意味著新中國不過是另一個清朝，領導人不過是另一個李鴻章。中國已等待香港回歸 33 年了（從 1949 年算起），現在還要再等上 15 年，人民的期待很大，他們相信政府一定有能力辦到。要是我們做不到，百姓將不會再信任領導，中國政府也應退出政治舞台。

據稱，1982 年在與撒切爾會談開始之前，鄧小平就對身邊

的工作人員說過：“香港不是馬爾維納斯，中國不是阿根廷。”撒切爾夫人會談之後，對駐華大使柯利達說：“鄧小平真殘酷啊！”而鄧小平對撒切爾夫人也印象不佳，稱“我簡直無法跟這個女人談，她根本不講理”！

到頭來不得不接受鄧安排

中英領導人的會談劍拔弩張，無法達成共識。不過，結束之際雙方認同向媒體表示將有“通過外交途徑的進一步會談，彼此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目標不變”。

會談結束後，撒切爾夫人一臉寒霜走出人民大會堂，她穿著高跟鞋，下台階時一腳踩空，跪倒在地上，走在她身旁的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港督尤德等急忙把她扶起，但這件事立刻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

會談公報的保證十分含混，效果有限，不可能讓人對香港繼續繁榮穩定保持信心，香港股票和港幣都立即大跌。撒切爾夫人會談後跌一跤，英國人和香港人看在眼裡，更似乎預示著英國國勢的下墜。

獲英國封爵的已故船王包玉剛，在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會面後第四天，帶著鄧小平的口信到港督府會見撒切爾夫人，披



包玉剛與鄧小平。

露中國收回香港後的管治構想，中英談判柳暗花明。

包玉剛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曾向撒切爾夫人率領的執政保守黨捐款 100 萬英鎊。解密文件進一步揭示他與撒切爾夫人的密切關係。1982 年撒切爾夫人訪華時，在上海出席包玉剛的新船“世誼號”命名儀式；包玉剛甚至一度要求與撒切爾夫人同機由上海返回香港，但英方以機位已滿為由拒絕，以免引起尷尬。

但一封 1982 年 9 月 28 日的密件，披露當天包玉剛與正在訪港的撒切爾夫人在港督府的密談內容，會面只有他們二人。包玉剛說，在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會面後的下午，他拜訪了鄧小平，鄧小平清楚表明中國必須收回香港主權，新界租約（中英於 1898 年簽訂 99 年租約，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到期。中國正是據此而確定香港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不會再續。但鄧小平承諾：“委任香港華人做最高職位”，“法律制度不變”，“自由港和港元地位繼續”。

兩年後也就是 1984 年底，趙紫陽與撒切爾夫人在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英國即日放棄香港主權，並商定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交出治權。中國則承諾“一國兩制”，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不變。

評論家普遍認為，香港離英國遙不可及，飲水與食物供應大部分來自廣東，英國一直以來處於談判弱勢，到頭來撒切爾夫人不得不接受鄧小平的安排。（《新史記》編譯 段灼華）■

中國錯失政治改革的 黃金時段

中國人多少年來盼望要政治轉型、和平過渡，盼到了1987年十三大的政改決策，機會多麼難得！既然如此，我們就要爭取讓政改方案得到通過。如果這一次不能通過，一拖下去，時過境遷，夜長夢多，不知道又要拖到多少年以後了！——改革者的擔憂不幸而言中

衆所周知的是，趙紫陽的秘書，是鮑彤；

鮮爲人知的是，鮑彤的秘書，是吳偉。

2012年10月上旬，今年剛滿花甲的吳偉，於中共十八大前夕，從中國大陸來到美國，參加在紐約長島舉行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他在大會發言中披露：“趙紫陽設



吳偉。 (《新史記》
記者高伐林攝)

想，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一成不變的，內容也是不斷發展的，要通過三到四屆黨代會，逐步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從傳統政黨向現代政黨的轉變，實現共產黨自身的轉型。”

利用會議的間隙，《新史記》記者專訪了吳偉，聽他講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中共高層嘗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甘苦教訓。

未出茅廬就嶄露頭角

吳偉，1952年出生於吉林，16歲多就當了知青，後來當了五年兵；1977年“文革”後恢復高考，他考上了東北師範大學（當時叫吉林師大）政治系。苦讀四年，畢業後分配到吉林省委宣傳部，從那兒又考上中央黨校研究生。

《新史記》記者問吳偉：你是怎麼到了鮑彤身邊的呢？

吳偉說：1985年、1986年那幾年，我在讀中央黨校期間，和其他幾個同學組織了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小組，搞了一些活動。特別是1985年夏天，我們搞了一個全國規模的調查，有二百多個研究生參加。我起草了總報告，這樣就和陳一諮他們比較熟了。研究生畢業，陳一諮推薦我到鮑彤所領導的政改辦（那時還不叫這個名稱）去。1986年10月，政改辦成立的第一天，我就去報到、參加會議了。

吳偉對鮑彤評價挺高。他回憶說，雖然鮑彤是中央委員，又當了政治局常委的秘書，地位相當高了，但他從來沒有架子，第一次見面，他說，你就叫我“老鮑”吧。到現在吳偉也仍然叫他“老鮑”，叫他夫人“老蔣”。吳偉印象最深的是，鮑彤不搞拉幫結夥，在工作中又極為嚴謹，給中央起草文件，從角度、結構到文字，不知要改多少遍，一個字、一個詞他都不放過。

如果不算臨時人員，這個研究政治改革的智囊班子，最多時大概有 30 多人。“一開始我和吳國光去的時候，領導不算在內，第一批只有七個研究人員。到十三大之後，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編制有 20 來人，但實際上只有十六、七個，最後解散的時候只有 17 個研究員。”研究員都是副處級以上，要任命都是按照局長、副局長來任命，因為他們經常要到各省市調查，定個級別，到下面人家好知道按什麼規格接待，什麼級別的領導出面。

住了三個月“秦城招待所”

那年，吳偉 34 歲。他在陳一諮的具體領導下，投入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過了沒幾個月，1987 年年初，胡耀邦被中共元老們逼迫辭職，中央決定趙紫陽接替，代理總書記之際，吳偉被定下來給鮑彤當秘書，“我一直當到 1989 年的 5 月 28 日，官方把鮑彤抓起來，也把我和鮑彤的另一個生活秘書抓起來了。”

不過，吳偉馬上補充了一句：“也算不上正式抓吧”。鮑彤是被關到秦城監獄裡面，而吳偉等兩人，是在秦城三套院的第二套院，“算是個招待所”。

不管叫什麼，反正，他當時失去了人身自由。“主要是想通過

我們調查鮑彤的活動。但是名義上是針對鮑彤的，不是針對我們的。”

吳偉在秦城那個“招待所”呆了將近三個月；生活秘書比他早出去一個月。三個月出來，已經物是人非。原單位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已經被中央明令撤銷。“但是所有的人不能走，要繼續清查、清理。當時由中直工委派出工作組，查‘黑手問題’，結果查來查去，根本就沒有！除了一個鮑彤被判刑七年、一個高山被判刑四年以外——哦，他們的問題後來都公布了，根本與黑手沒有關係嘛！”

其他的人呢？“我們研究室二三十個同志，只有一個受了‘警告’處分，其他黨員全部正常登記，沒有查出任何問題，包括我。



鮑彤。2012年2月攝於北京。

因為我做的是共產黨的工作、正常的工作，不是搞陰謀詭計呀。”

話是這麼說，在使用安排上，吳偉當然屬於不能再被信任的人了。他告訴《新史記》：“到清理的後期，按當時中央清查清理辦公室的說法，我們研究室的這些人，都‘不能再進入中央國家機關’。我被分到了中國大百科出版社，給我安了個‘編輯部副主任’。我原來是正處級，而這個副主任是副處級，”

吳偉要較真了：“我有意見啊，去找領導：你憑什麼給我降職？我犯錯誤了嗎？”

他回憶，領導上說：沒有呀，檔案裡並沒有記載你有什麼錯誤。吳偉追問：“既然沒有，為什麼給我降職？”他告訴《新史記》：我本來不會去爭這個，但這個時候，我不能不爭——因為人家一看我降職了，我要是沒犯錯誤，為什麼會被降職？

好在，在中國，不乏解決這類問題的折沖辦法。“領導說，那你說怎麼辦？我說，我要爭當正職也不合適啊，我畢竟業務不熟呀。我說，加個括弧，寫上‘正處級’吧。”領導欣然同意這個下台階：“這可以！”

參與起草政改總體設想

在大百科幹了一年多近兩年，政治氣氛實在太壓抑了，得不

到重用，也得不到信任。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吳偉的一些朋友去了海南，1993年他也就索性捨棄公務員的待遇“下海”了，先後搞了幾個公司。“我不是經商的料啊，不知道是運氣不好，還是自己缺少賺錢的本事，幾個公司都做得不好。”2003年之後，他就不做自己的公司了，到朋友的公司去任職。年齡漸大了，就辭職，回家搞研究、寫文章。但他對鮑彤的尊重，卻是多年延續下來了。最近幾年，他還是常常去見鮑彤，長的兩個月，短的半個月，就會去拜訪聆教。

《新史記》記者問吳偉：你當了兩年多的鮑彤秘書，主要幹了哪些事？參加哪一個具體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項目嗎？

當時被安排在綜合組當處長的吳偉回憶：鮑彤當時明確交待：你在我這裡當秘書，但是還要參加研討，做你的研究工作。

他記得，當鮑彤秘書沒多久，就投入了起草剛剛代理總書記的趙紫陽關於遏止“反自由化”狂潮的“5·13”講話，“鮑彤下面有五個人參與起草，三個人寫第一稿，每人一部分——我也有一部分，然後吳國光統稿，政改辦的秘書長最後潤色。”《新史記》記者記得：1987年趙紫陽的這一講話出來，舉國大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頓時偃旗息鼓，原來眼前的吳偉參與阻遏了這一逆流！

吳偉介紹，政改辦的綜合組，主要就是負責起草關於政治

體制改革的文件，當時分了工：吳國光參加的是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一位副局長帶領吳偉等人起草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

吳偉說，十三大報告和“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這兩個文件是有區別的：十三大報告是對外公開發布的，主要是講虛的、講原則性的問題；而“總體設想”不講虛的，大部分是很實的，講操作性的問題：“要幹什麼”“怎麼幹”，像撤銷黨組，撤銷政法委，等等，全都列出來了。

對於比較虛的原則，大家都舉手贊成；一談到實的，分歧就來了。吳偉回憶說，趙紫陽原來打算“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要在1987年10月的十二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以便隨後提交十三大審議，但是由於這個實的東西引起的爭議太大，“它太具體了，所以在全會上就不大能通過”，為了保證十二屆七中全會和十三大能順利召開，就沒有在全會上表決，改成了“原則同意”。十二屆七中全會公報這麼表述：“原則同意”這個總體設想，並把其中主要精神寫入十三大報告。

《新史記》記者查1987年10月20日通過新華社發布的十二屆七中全會公報原文，是這麼寫的，驗證了吳偉的說法：

全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一致決



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後，趙紫陽率新常委亮相。

定將這兩個文件提請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

全會討論並原則同意《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決定將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寫入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

我追問：你說當時“爭議太大”，那麼是關於政治性的爭議呢，還是關於操作性的爭議？當時黨內高層“左”的勢力、保守勢力還相當強大。不過吳偉說，這個“總體設想”主要都是操作性的，原則上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連十三大報告大家都通過了麼。

鄧牌政改與趙牌政改

吳偉回憶起八十年代投入政治體制改革的經歷，充滿了激情。

他說，當時高層有三個方面的政治力量，第一，是胡趙為代表的開明領導者；第二是鄧小平，作為黨內矛盾的仲裁人，一方面堅持改革開放，一方面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麼“左右互搏”；第三就是黨內保守派。

吳偉認為，趙紫陽經歷過兩次大徹大悟。第一次是“文革”，他從共產黨傳統的階級鬥爭學說中掙脫了出來；第二次，就是從 1989 年之後，經過思考，他實現了向徹底的民主主義者的轉變。

如何看三年多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吳偉的看法是，確有雙重性：從目標上說，趙紫陽與鄧小平是並不一致的。現在有人批評說，那只是體制內的改良。吳偉說，但是對“改良”，也有兩種不同的認識：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他的措施，與趙紫陽提出的目標和措施是不同的。

這就是趙紫陽當時的難處——吳偉回憶說：鄧小平主張的，是對體制做些改良，在保持共產黨領導地位不變的情況下，革除

體制內官僚主義呀、層次過多呀、職責不清或交叉重疊，以致互相推諉呀，等等之類的弊端，以提高行政效率。鄧小平從來也沒有認真想過在中國搞民主；而趙紫陽受命主持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他是要實實在在推動民主；然而他又處在鄧提出的目標的壓力之下。“但他還是將高度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目標，提出來了”。

吳偉說，趙紫陽接受了鮑彤和我們政改辦提出的方案——將政治體制改革設為兩個層次，把鄧小平的“提高政府效率”包括進去，然後把高度民主作為長遠目標。吳偉解釋，這樣一方面可以取得鄧小平的支持，另一方面又適合中國的現實發展需要。

他說，後來政改辦又提出，要實現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這“兩個轉變”的口號，趙紫陽也接受了。

吳偉在紐約研討會的發言中具體闡明說：趙紫陽在主持政治體制改革中提出一系列措施，遠遠超出了鄧小平劃定的範圍。他提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就擯棄了過去多年一貫制的“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鄧小平劃定的政改範圍是：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機構改革，提高效率，而趙紫陽主持制定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中，接過鄧小平“黨政分開”的口號，提出了一系列更新、更帶根本性的措施。

吳偉記得，當時趙紫陽的政改措施中還有很多內容，例如，他主張取消對文化作品的審查制度，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提出了開展社會協商對話，通過協調社會矛盾和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取消黨對司法的直接干預……等等。

吳偉說，後來趙紫陽提出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提出要有政務類和業務類的劃分，“這是關鍵啊，為將來實現公務員中立奠定一個基礎。”——不過吳偉緊接著就澄清說：中國現在實行的所謂“公務員制度”，遠遠不是當時設想的制度了！

吳偉還說，在中共十三大之後，趙紫陽又提出了幾條，例如，他提出：改造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改造”二字，不是



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改革設想不是一回事。

過去所一貫說的“加強”。不過這一條，後來沒有在高層通過；吳偉介紹，趙紫陽又提出，開展廉政建設，“他看得很清楚，當時由於經濟上的雙軌制，導致腐敗盛行。”

恰恰這些，在“六四”之後，被鄧小平和黨內保守派指責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證據。吳偉說，“這也說明，趙紫陽所推行的這些舉措衝破了鄧小平的範圍，也成為後來鄧小平中止這場改革的原因。”

政改機會得來不易要珍惜

怎麼看待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選擇問題？最近一段時間，國內也有人在反思八十年代的政改，有一種觀點認為，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不成熟，所以最後就失敗了。對這一觀點，吳偉坦率地說：從總體上說，我無法反對，但我也不能籠統地贊成。為什麼？“因為時機選擇，並不是趙紫陽的選擇，而是鄧小平的選擇，趙紫陽只是被動地接受了鄧小平的安排，來主持制定方案，並組織操作。”“如果說時機選擇不成熟，那只是趙紫陽的改革在當時行不通；而鄧小平提出了十六字改革方針，如果趙照這條路去走，是可能成功的，他也可以照樣當他的總書記——但這就不是趙紫陽了！”

一直到“六四”槍聲響起之前，鄧小平一直在觀察，趙紫陽到底想幹什麼？吳偉說，“趙紫陽想幹什麼？他想堅持民主與法治！”趙紫陽在“六四”前夕再次提出：要在民主和法治軌道上解決問題，這表明他仍然堅持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提出的一系列觀點。

吳偉認為，正是由於趙與鄧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的分歧，在當時的實踐中，一方面體現了鄧小平的想法，一方面表現出實際操作者的想法。這二者的衝突，最後導致了鄧小平動手中止了改革。

鄧小平是黨內各種政治勢力博弈的症結。吳偉分析說，在當時黨內高層的政治生態格局中，鄧小平算是中間勢力：他主張改革的時候，就傾向胡趙；當他發現胡趙超出了他所能容許的範圍，他就出手阻止，站到保守勢力那邊。

吳偉認為，1989年改革被中止是鄧小平主導的，但是黨內保守勢力從1985年之後持續不斷地反撲，已經醞釀了這個結果。“鄧小平最後表現出的政治態度，與陳雲、李先念、李鵬、姚依林他們，沒有什麼區別，達成了一致：對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容許存在，必須扼殺掉。”

回顧往昔，吳偉十分感慨。他說，在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中，我們當時有一個指導思想：中國人多少年來盼望要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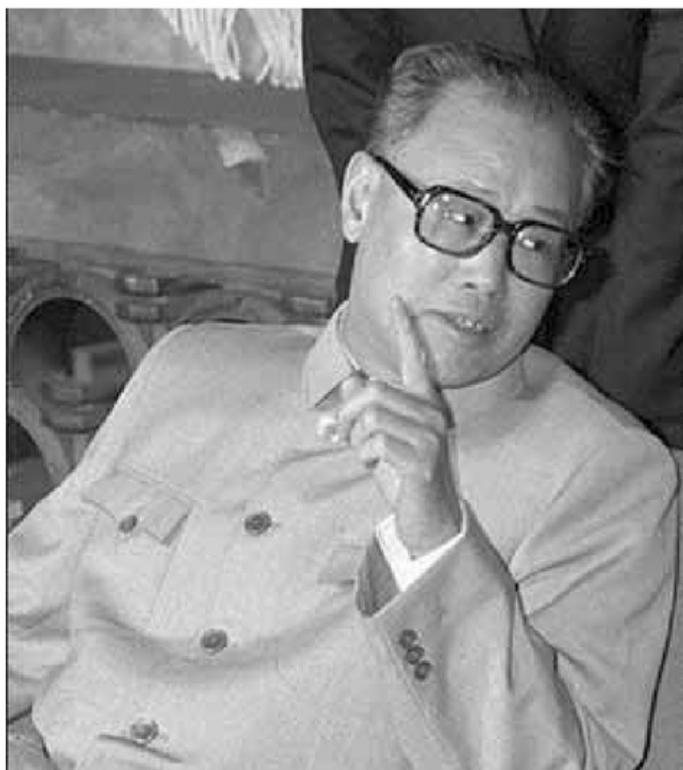
轉型、和平過渡，盼到了這次政改，機會多麼難得！既然如此，我們就要爭取讓方案得到通過——如果這一次不能通過，一拖下去，時過境遷，夜長夢多，不知道又要拖到多少年以後了！

證諸 20 多年來的史實，可不就是如此嘛！到現在，領導人的政改思路和魄力，還難以企及中共十三大達到的高度！

吳偉回憶，當時要著眼於能讓方案通過，每一條、每一句，都必須考慮聯繫實際——必須考慮鄧小平這個“中國最大的實際”。吳偉告訴《新史記》：政改的方案，必須得到兩方面的理解：要讓鄧小平這個最高權威能夠接受，也要讓中國那些主張社會主義民主、主張保障公民權利的人能接受。難乎哉！

那個年代，陳子明和王軍濤他們也在積極鼓吹他們的主張。吳偉說，按現在的說法，其實我們都是主張“憲政民主”的。不過我們政改辦的這些人非常清楚：我們與他們，並不是在觀點上有什麼“根本區別”，而是位置不一樣：我們還在在體制內，所以我們不能與上面搞翻了。“我們的目標是讓我們的政改方案能在中共黨代會通過——如果通不過，再好的方案也沒有用！”

吳偉說，有這樣一個目標，就要求我們和社會上鼓吹憲政改革的民主派“得有一個界線”。“當時鮑彤反覆地提醒我們，咱們內部，應該‘研討無禁區’，但是對外呢，就得講‘宣傳有紀律’，要讓人抓不住把柄。”



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功虧一簣。

“長鬍子的黑手”子虛烏有

李鵬等中共保守派勢力，一直企圖從鮑彤所主管的智囊班子中找到攻擊趙紫陽的炮彈。吳偉對《新史記》記者指出：他們懷疑鮑彤和政治改革研究室是動亂的“後台”、“黑手”，從這裡開始搞鮑彤。但是查到最後，卻有很多證據證明他們的指控站不住腳。“查來查去，中央政改研究室與‘動亂’根本沒有任何聯繫，沒法認定是‘黑手’！”

他說：“查到最後，和學生運動有一點聯繫的，只是我們那兒的高山，他在1989年5月19日，參加了‘三所一會’起草關於時局聲明的會議——高山本人是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秘書長，他是以這個身分參加的這個會議。跟我們研究室，從組織上說，其實並沒有關係。”

吳偉還說，鮑彤對高山參加這個會，事先是不知道的；高山回來以後對鮑彤匯報、向機關黨委報告了，結果，機關黨委批評了他，鮑彤也批評了他：你這不是給我們找麻煩嘛！本來紫陽就夠麻煩的了，你給我添了麻煩，更是給紫陽添了麻煩！

5月20幾號，李鵬的日記裡說，學生背後有“長鬍子的黑手”，還列舉了四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指控趙紫陽通過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插手學生運動。吳偉指出，李鵬這個日記，是“2003年整理出來的，但到那時已經是鮑彤蹲監獄之後了，早都查得一清二楚，根本沒有這些事情嘛。可是李鵬照樣這麼說！”

李鵬、姚依林貪汙陳雲意見

吳偉向《新史記》記者証實，後來被怪罪到趙紫陽頭上的1988年“物價闖關”，確實是鄧小平的旨意，並非趙紫陽心血來

潮，趙紫陽是搗了“黑鍋”。而這，正是元老干政最大的要害：權責不對等——干政的元老有權力卻不用負責任；在第一線工作的領導無權決策，卻必須承擔決策錯誤的責任。

吳偉在回答《新史記》記者的提問中，還披露了一些罕為人知的史實。他透露，政治局常委按照鄧小平的指令決定“物價闖關”時，陳雲曾經兩次表示反對。“過去沒有什麼材料說陳雲反對，但現在有了”。

陳雲何時提出反對的呢？吳偉對日期耳熟能詳，張嘴就來：第一次，中央研究物價闖關這一重大決策，是1988年5月16日；兩天後，5月18日，姚依林到陳雲家報告給他，陳雲就明確表示了反對。“按說，陳雲是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反對這一決策，那麼第二天，5月19日，中央常委開會，你姚依林作為中央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有責任把中顧委主任的意見告訴所有常委吧？但他一句話沒說。”

一個多星期之後，1988年5月28日，李鵬又到陳雲家，陳雲又談到物價闖關，正式地斬釘截鐵地對此做出判斷：你們搞不過去。然而，“兩天之後5月30日中央政治局開會，你李鵬是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有必要、也有責任向中央轉達中顧委主任這麼重要的意見啊，可他仍然一句話沒說！”

《新史記》記者問：李鵬與姚依林兩人，商量過要協調行動



陳雲反對物價闖關的意見並沒有傳到中央常委。

嗎？吳偉回答：這倒沒有證據來證明他們商量過。他們兩個人是不約而同地“貪汙”了陳雲的意見。

為什麼他倆會這麼步調一致呢？吳偉的判斷是：因為他們倆都知道“物價闖關”是鄧小平提出的啊，如果將陳雲的意見講出來，豈不是等於用陳雲來壓鄧小平？！——他們不敢撞在槍口上。

“鮑彤就一針見血地說，他們兩個人是去向陳雲打小報告的，但陳雲一反對，他們就只好不辦了，只好不傳達。”

鄧小平、趙紫陽知道陳雲反對嗎？吳偉說，沒法證實，也沒法否定，因為直到趙紫陽去世，他沒有談過這個問題；看來鄧小

平也不知道陳雲是這個態度。

《新史記》記者再問：陳雲講了兩次都沒有得到中央的反饋，會怎麼看？吳偉說，也不知道，“沒有資料證明”。他認為，這是“很奇怪、很詭異的一件事”。

吳偉告訴我，中共十三大之前，中央常委討論人事安排初步意見後向鄧小平匯報時，趙紫陽說了一句話：我希望我當了總書記以後，中央只有一個“婆婆”——他這話的意思是，就鄧小平一個人發話，陳雲和其他元老的話，我就選擇性地聽。

陳雲不贊成物價闖關的意見，既然被李鵬和姚依林“貪汙”了，吳偉是怎麼知道的呢？是誰披露了？吳偉告訴我，“在2005年出版的金沖及《陳雲傳》裡提到了這事。”他問鮑彤，鮑彤說：

“有這事嗎？我不知道。”其他趙紫陽的身邊人也都不知道，都覺得很吃驚。他們看了《陳雲傳》，裡面先敘述了陳雲的意見，然後說，中央（1988年）5月30日開會，通過了趙紫陽提出的關於物價闖關的安排，陳雲同志的意見沒有被採納。吳偉憤憤地說：“陳雲的意見趙紫陽都不知道，採納什麼呀！”（《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追求民主憲政的人 比“六四”時思想更成熟

現在老百姓對當年學生提出的反貪汙、反官倒、要民主的需求更大；社會精英的思想比當時更加深化，但知識份子也分化了，一部分人成了“中國模式派”

2012年，“六四”天安門事件23周年這一天到來前的兩個多月，媒體披露溫家寶多次在中共高層會議中，試探性提出重新評價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的消息。中國學者、異議人士陳子明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認為，這一消息是有意放出的風聲，想觀察外界對此作法的評價。陳子明說，20多年前中國知識界的討論主軸是憲政民主，如今知識界有了分歧，學生對政治的關注度也降低，但要求走民主憲政道路的人比從前更堅定、思想更

成熟。陳子明相信，“六四”終會平反。

陳子明為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分子生物學研究生畢業，曾擔任民辦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為民主牆與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倡導中國民主憲政。1988年出資接辦《經濟學周報》，任報社總經理，1989年後成為政治犯，被中共指控為“六四黑手”。目前居住在北京。

當今學子更重視個人利益

許多中國民運人士將方勵之稱作“精神導師”，方勵之的逝世，令平反“六四”與讓海外民運人士返回中國的話題重新回到



“六四”的記憶。

人們的視野。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六四”鎮壓本來就是錯誤，就算是作決策者，心裡也有數，知道將會是自己歷史評價上的一個汙點，那些協同者就更清楚這一點。

1989年，胡耀邦猝然辭世引發了學潮，參與者高喊自由、民主、反官倒，但《人民日報》的“4·26”社論將學潮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招來學生更強烈的反彈，最終導致官方的鎮壓行動。

陳子明表示，現在的老百姓對當年學生提出的反貪汙、反官倒、要民主的需求更大。“我被長期看押時，看押者有的是下崗工人，他們說，當年學生讓我們罷工，我們沒去罷，現在如果有學生起來，我肯定要上街。所以從客觀上來說，現在的形勢比當年有利。”

但從主觀上來看，現在要爭取民主、要反貪，卻不一定比當時更有利。陳子明對《新史記》指出，現在學生的思想狀況、心理結構都與當年有所不同：當時的學生在社會上帶有一點貴族色彩，有“天之驕子”的心態，對政治的關心度較強，對就業等個人問題看得較淡；現在的學生在總人口中占的比例，與當年相較提高了好幾倍，畢業後的前景不明朗，因此對個人利益的考慮也較多，真正關心政治、願意在這方面有所付出的學生，與23年前比起來少了。

中國知識界在這 23 年間也發生了變化。陳子明回憶，1989 年“春夏之交”前夕，中國知識界要求走憲政民主道路的態度已經比較明朗，當時像《河殤》那樣向往西方發達國家所代表的“藍色文明”，在思想界是壓倒性的思潮。1988 年底到 1989 年，知識界開過幾次幾百人的民間會議，幾十人的會議舉辦得更多，這些會議的主調，都是呼籲中國走憲政民主的道路。

知識界的行動在當時也獲得學生的支持。1989 年 1 月 6 日方勵之發表了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引發知識界的三波簽名行動，近百名知識分子聯署支持。陳子明對《新史記》指出，要求釋放魏京生，就是希望當局實現當時“北京之春”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要求，這些活動當時得到學生的大力支持。

陳子明指出，社會精英現在的思想比當時更加深化，要求走民主憲政道路的人比從前更堅定，對於如何走世界化、民主憲政模式的作法、階段性、在各個領域的子目標、總目標等等這些問題，都有更清楚的認識；但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出現分化，一部分人成了“中國模式派”。

“中國模式派”在近 20 年來中國經濟的良好發展下逐漸成形，所謂“中國模式”，泛指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六四”事件後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模式。陳子明對《新史記》解釋，20 多年前，大家都要“過河”，不管怎麼改，每個人都覺得中國必須

到達“彼岸”，現在的中國模式派則不想“過河”——他們認為中國模式就最好。

陳子明表示，中國模式派，實際上是沿襲毛派、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的潮流而下；在現今知識界的分歧下，知識界對學生的影響也不再只是一元化，如今的學生不像當年的學生那樣齊心，與此有關。

溫家寶在常委中喜歡說人話

2005年，胡耀邦誕辰90周年時，中共官方對胡耀邦“解禁”，不只中共中央舉行了紀念胡耀邦的座談會，給予高度讚揚，《胡耀邦傳》也在全中國的新華書店發行。

2010年4月15日，溫家寶也在《人民日報》上撰文追憶胡耀邦，該題為《溫家寶：再回興義憶耀邦》的文開頭指出：“前些天，我到貴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這片土地上，望著這裡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隨耀邦同志在這裡考察調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興義派我夜訪農戶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斷浮現出耀邦同志誠摯坦蕩、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積蓄多年的懷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湧動，久久難以平復。”

溫家寶的悼念文共3000多字，該文也是中共領導人首次

在胡耀邦的忌日所發表的紀念文章，文末特別提到他在胡耀邦發病期間與之的互動，以及在胡耀邦逝世後對其家庭的關懷，通篇充滿感情。

溫家寶在“六四”時並未握有太大的影響力，但之後坐上政壇的重要位子。陳子明對《新史記》回憶，溫家寶當時說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思想觀念又如何，在他看來都不大清晰，最有印象的，就是他跟著趙紫陽上廣場看學生時的情景。

另一位在“六四”之後扮演重要角色的政壇人物為薄一波。陳子明說，整個八十年代，薄一波都是鄧小平和陳雲之間的牽線人，權力相當大，能壓住胡耀邦、趙紫陽，不論是鄧小平或陳雲，都與薄一波有工作上的淵源；1945年日本投降後，中共中央成立晉冀魯豫中央局和晉冀魯豫軍區，鄧小平任書記和政委，薄一波是副書記和副政委；陳雲1950年代主持財經工作時，薄一波則是副手，鄧小平或陳雲都對薄一波有較大的信任度，薄一波的思想也介於鄧小平和陳雲之間。

陳子明對過去的溫家寶印象不深，但近幾年的溫家寶，他覺得就清晰許多。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溫家寶是常委中比較喜歡說“人話”的人，說人話的人總比說“黨話”，或說一般人聽不懂的話要強，要給予鼓勵。

在溫家寶3月14日的記者會後，陳子明撰文表示，對比

一下溫家寶答記者問與吳邦國在去年人大會議上所說的“五不搞”，就能清楚明白什麼是“人話”，什麼是“黨話”，但是，溫家寶的話說得還不夠，當回答《華盛頓郵報》記者關於在中國進行直接選舉的問題時，溫家寶只是簡單重復了2011年的說法；因為溫家寶不願意用“黨話”來搪塞，但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講“人話”，就等於打自己身邊人的嘴巴，他也做不到。

陳子明也強調，肯定溫家寶講話有“人味”，不等於肯定他的改革家地位，他期待在溫家寶任期的最後階段，不僅講“人話”，而且辦“實事”，為中國的憲政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雖然溫家寶近年多次提及政治改革的話題，但多半被認為只停留在口說階段，還未見到實際的改革。如今溫家寶不只丟出政改議題，還可能已經呼籲平反“六四”。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中共高層的消息指出，溫家寶近年曾三次在不同的中共高層會議上，試探性地提出平反“六四”，以啟動他最近多次提倡的政治改革，但溫家寶每次提出建議時都遭到反對，反對最激烈者之一為薄熙來。薄熙來父親薄一波在1989年時一再要求鄧小平採取強硬立場，將軍隊調到天安門。

報導將中共高層對“六四”問題的立場大致分為幾類，第一類人反對以任何形式重新評價“六四”，他們是主張鎮壓並從中獲益者，第二類是受到傷害者，第三類則是未受到影響者。文



北大博士生參加八九學生請願。

章指出，隨著時間的流逝，反對平反“六四”的高層逐漸減少，例如薄一波在 2007 年逝世，因此反對此事的阻力也逐漸減弱，因此即將卸任的溫家寶可能冒險地假設，中國已到了能夠糾正歷史錯誤、推進政治改革的時刻。

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金融時報》的消息有一定的可

信度，是有意放出來的風聲，想試探外界的評價。對於反對平反“六四”的一類人，有分析認為是以周永康為代表的江澤民一派，陳子明表示，周永康指揮的部門直接負責維穩，所以反對平反“六四”並不奇怪，“但當我跟這個部門裡的個人接觸時，也有人表示不反對平反。”

對胡溫推動改革抱悲觀看法的人，認為不論是改革或是給“六四”和趙紫陽平反，都不會在江澤民還在世時真正有所行動。江澤民被認為是鎮壓“六四”的最大受益者，在1989年被元老選中接替趙紫陽。也有人認為，胡溫新政之所以搞不成，就是因為江澤民在各領域都安插了自己的勢力，阻礙改革。

陳子明對此持有不同看法。他對《新史記》記者分析說，在推動改革上，江澤民不一定是阻力，如果胡溫確實有這樣的想法，或許江澤民也有這個想法；如果胡溫想實際執行，江澤民可能也會同意。“我從來不認可把江胡矛盾作為分析現在中國政治的一條主線，因為人際上的派系不等於是路線上的派系，兩者並不能清楚地區別開。”

陳子明曾提出“代際政治”理論，他認為在中共領導班子的同一代人中，雖然每個人代表的派系不一、擁護的觀點各異，但政治分野主要還是在兩代人之間。陳子明先前接受《明鏡》採訪時解釋過：“‘代際政治’是某些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的一



1989年5月15日首都各界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隊伍。

種特殊政治現象，意思是主要的政治分界線並不是在同一代人
中，而是在兩代人之間。”

陳子明指出，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同一代人間的
派系劃分，往往沒有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的政治分歧深刻。

“政治上的派系之間，同一代人的差異不大，只涉及到誰進局、
誰進常委、誰進書記處、誰當省市長等等，他們的政治路線、思
想底色沒太大差異。就算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國民黨也很容易
進入共產黨，反之亦然，因為他們這一代人有類似的追求，要中
國獨立、實現工業化，但他們與上一代人，不管是革命黨還是憲
政黨，就有很大區別。”

“六四”一定會被平反

2月底，中國大陸網站突然開放“趙紫陽”詞條和“六四”相關文字照片的搜索，清明的頭一天，官方的中新社發表了題為《胡耀邦墓前清明祭》的文章，被新華網、人民網等近百家媒體和網站轉載，文章透露在胡耀邦逝世後23年裡，胡耀邦陵園共有80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200多位省部級官員前往悼念，其中很可能包括胡錦濤和溫家寶。文章的刊登，被視為“胡耀邦”其人其事，已經徹底被解禁。

中共對“趙紫陽”其人其事的管制也有所放鬆，以往清明節到6月4日時，總有民眾前往北京趙紫陽故居進行悼念，多數時候悼念無法順利進行；但今年的清明節，200多位到趙紫陽故居悼念的民眾並未如往年一樣遭到當局的極力阻攔，網民也可登錄“趙紫陽網上紀念館”悼念。

陳子明曾以“中國人脖子以下的自由增加了，脖子以上的自由減少了”來比喻中共對言論自由的管制。雖然2月開放敏感詞的搜索，但沒過多久，中共開始加強“掃除網上造謠傳謠”，恢復嚴格審核，抓捕所謂“造謠傳謠者”，封閉新浪、騰訊，再次禁止“六四”、“趙紫陽”等詞匯的搜索，“趙紫陽網上紀念館”也無法登錄。

曾被網友瘋傳的網路歌手“紅衣大叔”新歌《浩然正氣趙紫陽》，在優酷上已搜索不到，該歌曲高唱“浩然正氣趙紫陽，鐵肩傲骨震八方，一片丹心天可鑑，勤政為民做榜樣。堅持真理愛人民，兩袖清風國忠魂”、“撥雲見日魂兮歸，平反紫陽舉國歡”。

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網路一鬆一緊是平常現象，現在應不會有大的變動。“現在的政法部門、宣傳部門兩桿子，人事都沒有變動，所以我不期望它現在有大改變，大的變化還是必須先人事履新，才可能產生，現在的變化，只是探探水。”

薄熙來被拉下馬後，有人說改革派底氣更足了，陳子明認為這點是否屬實還要觀察，但是以薄熙來為代表的毛左派，可以確知是受到沈重的打擊。

陳子明說，敏感詞匯的解禁乃至評價，都是歷史潮流，不管中共怎麼鬥，這張牌最終都要出的。中共高層正在醞釀拋棄歷史包袱，對下一代領導人來說，肯定要觸及這個問題，現在的疑問是，胡溫這一代會不會想提前出手。

當局對“六四”話題有限度開禁，有分析認為是想測試民意或黨內大佬的看法，為傳說要推行的政治改革試水溫，胡溫適時對網路放鬆，也可能有警告另一派的意味：讓他們看到，胡溫一旦訴諸民意，將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陳子明對《新史記》分析說，警告意味是可能有的，畢竟胡



陳子明。(陳子明提供)

濫手上沒有沾血，也不是“六四”鎮壓的直接受益人，做網路解禁的動作，得分也能得多一些；但對於“六四”直接受益人來說，要他們做這樣的動作，就會更痛苦。

陳子明認為，網路解禁後的民意，清楚顯示了對民主憲政發展的期待。對於建立中國民主憲政平台，陳子明抱持樂觀態度，他認為體制外缺乏像胡錦濤這個年齡層的一代自由派知識分子，因此胡錦濤從中無法聽到什麼肺腑之言，到了習近平、李克強的年齡層，體制內外有共通人生經歷和學習經歷的人多了，使得雙方互動的可能性增加。在他所接觸到同年齡層的副部級以下官

員、企業家和學術界人士，絕大多數人對於中國民主化的前景，都抱有期待。

至於“六四”的平反，陳子明也表示樂觀。“‘六四’終有一天會平反，這是沒有疑問的，跟我打交道的法官、檢察官、公安局的人，從1991年開始都私下跟我說‘六四’肯定要平反的；法官判完刑，跟我私下談時，都說判刑是沒辦法的事，是上級的指令。”陳子明認為，如果不重新評價八九民主運動，政改思路無法貫徹。

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中共對網路的壓制總是不太容易收效，因為人有變換語言方式的能力，也有主觀判斷能力，例如周永康的代號是“康師傅”，“六四”的代號為“8乘8”，在創新詞匯不斷出現的情況下，中共肯定無法完全壓制；而如果人心不改變，就一定會將不滿表達出來。

“從前一般人的文章登不上報紙，也沒有自己民間的一個陣地，只能嘴巴說說，現在有這樣的网络平台了，只要這樣的陣地還在，就一定是中國憲政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工具。”至於“六四”，陳子明認為，如果中國的年輕人能逐漸重新認識“六四”，網絡上的呼籲增多，對當權者也會形成一股推力。（《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如果鄧小平會被騙， 就不是鄧小平了

八十老人姚監復說：我探望被軟禁中的趙紫陽時，問他：學潮中是不是陳希同、李錫銘他們合夥欺騙了鄧小平，所以鄧才決定戒嚴？趙紫陽回答：如果鄧小平能被他們這些人欺騙，那就不是鄧小平了！我向陳希同轉述了趙紫陽的這句話。這句話說到陳希同心裡去了！

《新史記》記者 2012 年 10 月上旬在於紐約長島舉行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上，與專程前來的姚監復重逢。也巧，他出生於 1932 年 10 月 9 日，再過三天就是他的八十大壽。不過，紐約的會議還沒結束，這位忙碌的老人就要趕往歐洲參加一個人權會議，他的生日要在旅途上度過了。



姚監復在“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上發言。

姚老自稱“一目瞭然”——這句成語用在這裡，表明了樂觀自嘲的心境，更概括了一段“文革”中不堪回首的慘痛往事：姚監復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開除黨籍、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文革闖將”每天用硬橡膠包著鋼絲的鞭子打他，打瞎了他的右眼，把他流放到湖南西洞庭湖農場“隔離審查、勞動改造”……

用僅剩的一隻眼睛，姚監復卻努力看清變幻莫測的歷史與現實。2012年堪稱他的豐收年：元旦，他執筆整理的胡績偉《胡趙新政啟示錄——並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剖析》在香港出版；6月1日，他專訪整理的《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在香港

出版；這一年，他還發表了許多評論。

在紐約會議期間，《新史記》對姚監復的專訪，是從他本人及家族的“文革”遭遇談起的。

“文革”中母親被砍死

姚監復能活到今天，他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

姚監復的父親原為國民黨上校，淮海戰役中，父親參加起義；母親為小學教員。抗日戰爭中他隨父母撤退到四川、甘肅、陝西。抗戰勝利後到江蘇蘇州。1949年後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預科、本科，1957年畢業，分配到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年輕的姚監復，已經走遍華東、西北和東北，見多識廣了。

然而，遇到“文革”，他如同遭受雷殛。談到家庭經歷的悲劇和母親賀書華的死，姚監復聲音低沉。

當時，他因貼過幾張農機研究院領導的大字報，被農機研究院裡的“革命群眾”揪鬥，胸前被勒令必須掛著“反革命分子”的牌子，行動失去自由，無法與死去的母親見最後一面。他最小的妹妹姚蜀平是目睹者，後來寫了一篇迴腸蕩氣的《兒女祭》，文中寫道：

……只見母親身穿一身破舊的香雲紗衣褲，那是陪伴了她幾十

年，黑色早已洗成黃色，膝蓋處還打著補丁的舊衣褲。她赤著腳，手臂和兩腿裸露出的地方是明顯的傷痕。頭髮更是被剪得不成樣子，有的地方齊髮根沒了，有的地方留下幾縷長髮，卻讓血跡粘在一起。而她的頭，卻是偏向一邊……

兩個火葬場的工人，抬著母親屍體走到卡車後面，四手一掄，屍體就被扔到了卡車上。他們轉身又去抬第二具屍體。我看他們走遠，不由自主地登上了司機座的踏板，伸頭向卡車裡張望……母親的面孔竟然就在我眼皮底下，離我不到二尺。啊！我清楚地看見了，她的脖頸上有一道長長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我還看清了那一頭剪亂的白髮，那滿身的傷痕……

姚監復的父親被趕出北京，勒令回到原籍，膽戰心驚又牽腸掛肚地過了兩年。1968年清理階級運動高潮中，姚監復單位的專案組派了兩人，不遠千里來到安徽大別山腳下的小村莊，對老人講，你的兒子汗巖江青，已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老人得知自己第二天也將在公社大會上被批鬥，當晚就自縊了。

若干年後，姚監復才獨自來到父親墳前，放下妹妹1986年在雜誌上發表的《兒女祭》，及五包香菸、五個蘋果。1990年，兄妹五人，在北京西山金山陵園，為父母修了一座衣冠塚。

姚監復告訴我：母親死後的慘狀給了妹妹強烈刺激，後來她晚上時常從惡夢中驚醒。“所以她執意要離開那塊傷心之地，



姚監復的妹妹姚蜀平。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攝)

再怎麼困難也要到美國來，要入籍定居……”

《新史記》記者查到，姚蜀平是讀科技史的，1963年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先後在核工業部和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和政策管理所工作。1985年首次向國內介紹台灣學者柏楊和李敖。姚監復告訴我，她的知識面相當廣，八十年代初第一次來到美國，在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系任訪問學者，研究為什麼那麼多外國人能獲諾貝爾獎，中國人在中國就不能？她研究出一個重要原因是：如果在現實生活中被告知要當“螺絲釘”，要做“馴服工具”，那麼進了實驗室，能有自由的想像、獨立的追索和創造性的發揮嗎？“她寫成了文章，許良英推薦給

《自然辯證法》雜誌用了。但是教委就把她當成重點了：當科學家就不能學雷鋒？宣揚學雷鋒就阻礙了中國科學發展？——在中國，這些說法都犯忌呀！”

姚蜀平 1989 年再次赴美講學，先後曾在美國史密斯學院、弗蘭克林·馬歇爾學院和本特立學院任教。在物理學史、中國科學院院史、中國留學史及現代化等方面做過研究，參與電影劇本《李四光》、電視專題片《共和國之戀》創作，發表過長篇、短篇小說和散文等。

在中國，什麼都是政治

姚監復本人大學畢業後，到了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這樣一個機構，本來與政治離得甚遠，但在當年的中國，又有什麼不與政治扯上瓜葛呢！研究院安排他搞鑄造工藝、農業機械化的情報，後來安排他到秘書科當副科長，又要他搞農機化的技術經濟研究，從技術、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視野中觀察農業機械化。這本來都不是政治任務，但農業機械化最後也成了毛澤東與劉少奇路線之爭的一個焦點。

姚監復在《農業機械化：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政治武器》一文中，回溯了 1966 年初，毛澤東繼文藝戰線批“海瑞罷官”、“三

家村”揭開“文革”序幕以後，又怎樣在經濟戰線上，從農業機械化入手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姚監復認為，1966年2月，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與王任重給劉少奇的信，實際上，形成“文革”又一啟動工序。關於這兩封信，《新史記》雜誌第8期已經做過詳細介紹。

姚監復對《新史記》記者說，1966年2月爆發的一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之後很長時間仍在爭論的農業機械化問題，在一些指標、期限、方針、路線不同觀點爭論的背後，隱藏著一場更重要的“姓社姓資”的大爭論；在明面上是討論20年還是25年或是更長時間才能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實際上準備了一頂是不是堅持反對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政治帽子，1966年2月毛澤東向劉少奇在農業機械化問題上開火，也是8月“炮打司令部”另一場預演，是繼批《海瑞罷官》、批彭德懷之後，直接批到劉少奇頭上的安排。

姚監復說，直到“文革”過後，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是“脫離實際”以後，人們才接受了農業機械化不是“革命運動”，而是社會、經濟、技術發展過程的觀點。

姚監復對《新史記》記者強調：地域性差異極大的中國，機械化只能是“選擇性”的，選擇的主體，只能是農民自身：“最終

要由他們來決定，究竟要不要機械化？什麼時候要機械化？”

姚監復關於“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肯定實現不了，也根本不應這麼提”、“要由農民來選擇要不要機械化”的觀點，讓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聽到了。杜潤生把“知天命”之年的姚監復，調到了自己手下。後來，他又將姚監復關於應該由農民自主選擇是否機械化這一思想，寫進了1983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在一次談科技的場合也闡述了這個意見。姚監復說，“本來農業部等部門是不接受這一思想的，慢慢也改變態度了”。

見陳希同緣於表姐送書

姚監復與陳希同，本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他這樣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一位聲譽鵲起的自由派意見領袖，怎麼會與在“六四”之後一度被某些異議人士提起來就咬牙切齒、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又是個“貪汙犯”的陳希同扯到一起，幫這位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前北京市委書記出了那本《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以下簡稱《親述》）？

姚監復對我細述原委：認識陳希同，與自己的表姐鍾鴻有關。

鍾鴻也是個名人。早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後來出版過詩集《夢未了》、《百花吟》、散文集《尋美、尋樂、尋情》，尤其在戲曲方面著力甚多，創作並上演了舞臺京劇《雪映古城》《玉碎名園》《站上風雲》《黛玉葬花》《鐵杵磨針》等；她還主辦了大型刊物《中國電視戲曲》，組建了北京市的京劇昆曲振興協會和電視戲曲協會……她最著名的作品，是電視戲曲劇《曹雪芹》，獲得了1991年度的“飛天獎”。

“我這個表姐寫了一本自傳，題為《風雨半枝蓮》，其中回憶到陳希同。”——《風雨半枝蓮》這本書於2007年出版，兩位著名作家王蒙與叢維熙寫序，當時頗有影響。



《陳希同親述
眾口鑠金難鑠真》。

原來，陳希同 1948 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唸過書，1952 年從基層調到北京市委工作之後，與也在那裡工作、文化背景相似的鍾鴻認識。鍾鴻後來被打成“右派”之後，陳希同對她表示同情。她寫《曹雪芹》的電視戲曲劇本時，遇到很多困難，手中掌管越來越大的權力的陳希同支持她寫，資助她，這部作品終於獲得了成功。“她在自傳中就寫了這一段經過，對於幫助自己的人，她銘感於心，儘管這本書出版的時候，陳希同已經銀鐐入獄了。後來，她聽說陳希同保外就醫，就想送一本給陳希同。”

受表姐之託，姚監復設法打聽到了陳希同住在小湯山療養院，2011 年元月，居然聯繫上了。姚監復告訴陳希同，表姐鍾鴻要送書給他，問能不能登門拜訪。陳同意了。

姚監復告訴《新史記》記者，一見陳希同，陳就開門見山地強調，自己不是貪汙犯。說他貪汙、判他的刑，完全是個冤案。

“所謂貪汙 50 萬元的禮品，是準備捐獻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藝術發展基金會的”，“我打的借條也都俱在”，根本不是據為己有。

陳希同對姚監復詳細介紹了此事的緣起，其實是江澤民的指示：江澤民由李錫銘陪同視察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後，知道人藝經濟上有困難，就通過中央宣傳部門、北京市委宣傳部，給陳希同捎來口信：希望陳希同市長抓一下文藝工作，幫助人藝解決

困難。

陳希同安排讓市委宣傳部長兩次去人藝調查研究了一個月，認為必須改革，打破大鍋飯制度，改變待遇太低局面。陳希同兩次批示撥給幾十萬元，來解決設備老化，老演員宿舍問題等。又正式經過北京市委、市政府討論同意，創建了一個藝術發展基金會。陳希同向董建華募來 100 萬美金，約折合 800 萬元人民幣；向李嘉誠募來 1300 萬元人民幣；動員市內捐獻，北京市旅遊局捐了 50 萬元……“我動員別人捐獻，自己怎麼辦？在我的名下有一些國內外友人捐送的禮品，按規定可以上交，也可以捐贈，作為善舉，財政上是允許的合法的。”

判決陳希同貪汙罪行時所列出的主要罪證是：陳希同將禮品據為己有，計畫貪汙 50 萬元至 100 萬元，實際上已貪汙十幾萬元。陳希同申辯說，將禮品登記入賬後，擬湊夠 50 萬或 100 萬元，再捐給這個基金會。

借條又是怎麼回事呢？《親述》中說：“我要秘書收集一下，從外事辦借來禮品，打了借條，估估價。……這些禮品，在市外辦有借條。市外辦主任來看我時講，這些借條都在外事辦保存著。我請西單商場經理、建外友誼商店經理商量過，估價值多少錢，如何出售這些禮品，以便轉變成捐贈給人藝基金會的現金，他們都回去向黨委傳達過，這些人證俱在。”

“我能騙得了鄧小平？”

陳希同第二個急欲澄清的是，他是不是謊報軍情欺騙了鄧小平？姚監復對《新史記》記者回憶，“我曾經在探望被軟禁中的趙紫陽時，問過他一個問題：學潮中是不是陳希同、李錫銘他們合夥欺騙了鄧小平，所以鄧才決定戒嚴？趙紫陽當時回答我說：如果鄧小平能被他們這些人欺騙，那就不是鄧小平了！我去年見陳希同的時候，就向他轉述了趙紫陽的這句話。這句話說到陳希同心裡去了！他一拍大腿：對呀！我完全同意紫陽同志的意見！像我這樣的人能騙過了鄧小平，那豈不是貶低鄧小平、把鄧小平說成一個昏君、庸君了嘛！”

姚監復獲得了陳希同的信任，陳希同同意談出自己的經歷和許多想法，由姚監復記錄整理。據姚監復看來，陳希同並沒有要洗刷自己“六四”責任的想法，他說“我做了‘六四’的報告，是上面讓我做，我就做，我承擔責任”。陳希同澄清的只是“李鵬日記”中說他是“北京戒嚴部總指揮”，他說自己並沒有擔任過這個職務。

姚監復認為，陳希同作為“六四”當事人之一，盡可能將他認為的歷史事實講出來，講清楚，然後由讀者判斷是否真實，是

否可信，該如何評價，“我贊成他這種態度”。

陳希同在《親述》中，對判決書加給他的幾乎所有罪狀都給予反駁，他說：“陳良宇認罪，我不認罪”。他自己的案子，是“1、文革後最大的冤案”，“2、最荒唐的錯案”，“3、最不得人心的假案”，“4、最不人道的大案”。

《新史記》記者問：陳希同是否希望通過這本書披露自己的看法呢？

姚監復介紹：“陳希同跟我有一個‘君子協定’，他說：2011年12月31日之前，你不要發表。我遵守了約定。這一年過去之後，我希望發表，陳希同還是要求我不要發表，因為他正在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關於他的‘貪汙犯’的問題，他希望申訴得到一個回答：是重新審判呢，還是維持原判？有了回答之後，再決定是否公布這本書。他還表示，想修改一下、審定一下，保證百分之百符合他的原意。但是我考慮，書稿寫出來一年多，他都沒有修改，現在他也不大可能修改了。再說，我也快80歲了，該把大家需要知道的事情公布出來了。我沒有遵從他這個意見，在今年（2012年）出版了這本書。”

姚監復強調，《陳希同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出書之後，陳希同要求說明，並不是他主動要求出書的。“陳希同說他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所以這本書，不是陳希同



陳希同與姚監復合影。(姚監復提供)

要求出版的，他沒有洗清罪責、改變觀點的意圖。是我本人決定印出來，給讀者和關心和研究歷史的人思考的。”

《新史記》記者問：“保外就醫”的陳希同，是否有人監管？姚監復說，沒有看到。他的行動相對是自由的，在北京城裡可以到處走動。但他的司機，應該負有監管他的職責吧。

姚監復查過療養院的來客登記簿，上面記載，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等，來看望過陳希同。

衆所周知，陳希同在當市長時與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一直

關係不睦。但是“冤家路窄”，李錫銘健康日益惡化，也住進了小湯山療養院。既然同在一個院裡，兩人見過面。

姚監復對《新史記》轉述說，陳希同告訴他：李錫銘托人捎話願見陳，陳就去看了他，對他說：“把我打入監獄，不是你的意思。”“聽了我的話，這時，他的眼睛裡充滿了眼淚。半天他說不出話，他對我心有內疚。”

李錫銘對江澤民、李鵬則近乎破口大罵：“江澤民是一個大政治騙子、投機分子。”“李鵬是個大混蛋。”

“六四”是一場武裝政變

姚監復在這次“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上多次發言，其中也透露出不少令人深思的信息。

姚監復說，2004年3月到5月，我曾多次前往北京富強胡同6號趙紫陽家看望趙紫陽。那時趙紫陽已進入生命最後時日，離2005年1月17日去世，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

姚監復披露，趙紫陽說：“六四”是一場無計劃、無組織、無領導、無綱領的群眾性自發行動。但後來我讀了李鵬的“六四日記”，才知道，“六四”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的反改革的武裝政變。

姚監復解釋說：李鵬日記中透露，“六四”前的春節，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就在上海研究，怎麼把趙紫陽搞掉——趙紫陽是黨代會上當選的總書記，你們幾個老人要把他搞掉，這不是政變嗎？還有，1989年5月，李鵬要開會把趙紫陽搞掉，鄧小平說，不行。等軍隊進城以後，有把握了再說——這不是政變嗎？

姚監復說：後來上面找我談話質問這個說法，我就說，這個說法不是我發明的，是我根據李鵬日記分析的。

鄧要趙認錯復出被拒

姚監復在會上還披露了一件祕辛：“六四”後，趙紫陽並不是沒有復出的機會，鄧小平至少兩次派人給他傳話，要他出來工作。但趙紫陽拒絕以檢討、認錯換取復出。

姚監復說，1990年，鄧小平就派人帶話給趙紫陽，說你可以出來工作。趙紫陽回答，如果是到政協這樣不能幹事的單位，我不去；如果要我當總理呢，我肯定比李鵬幹得好。

1991年，鄧小平又派人去告訴趙紫陽，要他出來工作，當總書記都可以考慮，但有個前提：你得認錯。趙紫陽回答，沒有必要重新認識，我的認識到此為止了。“所以，他真正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中國英雄！”姚監復說。

姚監復還轉述：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學生之前，在院子裡轉，他的秘書在後面跟著，聽見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早就做了思想準備了。而且他給家里人開會說，我要做這樣的選擇，你們都要受影響，你們同意嗎？家里人都支持他。

姚監復指出：我覺得在中國這種世俗社會追求名利權位的情況下，應該學習趙紫陽的道德風格，“他將一個領袖的道德倫理視作高於責任倫理”。

姚監復回憶說：

2004年3月的一天，我去看趙紫陽，他鼻子裡還塞著氧氣管。告別前我說：紫陽同志，我要走了，最後告訴你一句：李銳同志跟我說過，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都是以作違心檢討下台的，只有兩位總書記，一位是陳獨秀，一位是你，沒有做違心的檢討。聽我講後，趙紫陽拔下了氧氣管，走到我跟前說：“是你說的嗎？”我說：“不是，是李銳說的。”他非常興奮和激動，轉過身，兩隻手向上舉起來——姚監復講到這裡也將手舉起來，模仿趙紫陽的姿勢學著他的話說：

“哈哈！陳獨秀，陳獨秀！”

姚監復講完這段往事，又補充說，聽了李銳這個評價，趙紫陽心情十分興奮，“他很高興地跟我合影，要（女兒）雁南照相。雁南說，給你照了好幾張了，可以了吧。趙紫陽說：哎呀，膠捲又

不是你的，照吧！”“他在軟禁中，心情一直非常壓抑，但那一次，他非常高興——中國的領導人，都很在乎歷史對自己的評價。”

姚監復說：丁東後來對我分析說，這個細節，反映了趙紫陽的心態：他希望歷史最後認可他。你姚監復把一個黨史專家的評價當面告訴了他，他心裡非常滿意。

多嘴導致“禍從口出”

姚監復很健談——用他自己的話說，叫作“多嘴”。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禍從口出”的古話，樂於表達，給他帶來了不少麻煩。大躍進、大煉鋼鐵年代，學鑄工專業的姚監復在向黨“交心”時，忍不住多說了一句：“我們研究院一千人，平均工資是多少錢？兩個禮拜這麼‘炒鋼’，工資是多少錢？還有六個蘇聯教授也跟著這麼‘炒鋼’，這個是多少工資？”這話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誰也沒料到，1959年廬山會議批彭德懷，他就有一條“反黨言論”，說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後來批他，就說你姚監復膽子多大？連彭德懷都只是定性說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你呢，還定量計算出來，論證大煉鋼鐵到底怎麼“得不償失”！？

就因為這句話，上級給他一個“重要任務”，到劉胡蘭公社

去勞動鍛煉。“而且把戶口帶過去了”。他的戶口本上，迄今一直寫著是從山西文水縣劉胡蘭公社遷回北京的。

“文革”中，姚監復在劫難逃，同樣是因言罹禍。

不過，姚監復看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了。

“江澤民跟老太婆過不去！”

姚監復告訴《新史記》記者，前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胡績偉老先生 2012 年去世之前，跟他多次談話。胡績偉的認識是有一個變化過程的。他認為，胡趙新政，就是新民主主義：從 1938 年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當時的中共根據地推行的都是新民主主義政策，一直到 1953 年之前，都是如此。胡趙十年，也就是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

“但他從希望變成失望，又變成絕望”：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都沒有實現。

胡績偉思想改變了，提出廢除“三個一”：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後來加了“一個黨軍”）的法西斯制度；再後來他的思想更進一步，認為錯誤的根源不是蘇聯，而是更早的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對時代的性質和任務，都判斷錯誤了，資本主義的喪鐘並沒有敲響，在幾個世紀之內，資本主義都還將繼續發展，

如果一定要在條件不成熟時搞社會主義，就必然有人很科學、很理性地起來反對，而當權者就會把他們打成敵人——迄今以來的歷史不都證明這一點嗎？

姚監復說，鄧小平自己談到，什麼是社會主義，我說不清——你“說不清”怎麼堅持？又為什麼將別人打成“反社會主義”？

姚監復在會場上有一番話更引起哄堂大笑：

中共早就反對蔣介石的“一個領袖”，把總裁、委員長、總統什



《胡趙新政啟示錄——
並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剖析》
(胡績偉, 鮑彤序, 姚監復編)

麼帽子都往頭上戴。那麼為什麼鄧小平說：毛主席在，毛主席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江澤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一個人說了算，於是毛澤東搞“反右”、“文革”、鄧小平搞“六四”，江澤民就整法輪功——難怪人們說：毛澤東、鄧小平跟青年學生過不去，江澤民跟老太婆過不去！

“我沒權利不出版這本書”

姚監復這種性格，不可能不跟官方幾次發生衝突。姚監復講述：

2011年10月10日，中央宣傳出版領導部門，通過我所屬的黨組織，正式通知我：“你有一本書（指胡績偉著《胡趙新政啟示錄——並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剖析》，要在香港，由鮑彤的兒子出版（指鮑樸的新世紀出版社）。有關部門通知你，不要出版這本書。”

我回答：這本書不是我的書，作者是胡績偉，出版不出版這本書，只能由作者作出決定。我只協助記錄、整理、編輯了胡老的談話，我沒有權利決定出版或不出版這本書。另外，出版這本書的單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正式合法出版社，享有出版自由的法律保障，按照“一國兩制”原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律，新世紀出版社有權決定出版或不出版某一本書。我也不能代替一個香

港的正式出版社做出不出版胡績偉《胡趙新政啟示錄》的決定。

領導轉而提出：“你能不能做工作，不出這本書？”我當即指出，按照共產黨組織的原則，是垂直領導，不能橫向干涉。胡績偉是96歲老人，有74年黨齡的原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人大常委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不屬於農口黨組織管理的老黨員、高級幹部。如果我以農口單位的研究員、普通黨員的身分，去勸阻胡老不出這本書，或者我干涉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的出版自由，他老人家一生氣，把此信息上網，暴露出最高宣傳部門破壞言論、出版自由和“一國兩制”的方針，不就成了國際新聞和大笑話了嗎？那時，最高領導責怪下來，我們作為傳話人和當事人，能夠承擔這麼大的責任嗎？

我建議我的直接領導向發令者轉達我的態度，作為黨員，我將如實地準確地執行上級黨組織交給我的任務，傳達宣傳出版部門領導的意見給胡績偉。但是，為了避免口頭傳達重要指示的誤差，我希望發令者給我一個書面文件，明確這是中央哪一級領導或者哪一個業務領導部門，還是某一位具體工作人員的指示。要說明是什麼理由不准胡老出這本書？這本書收集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已經在港刊上公開發表過，為什麼這本書卻不能在香港出版？

姚監復2011年10月26日得知，中共宣傳出版部門認為我的“態度是好的”，因為他表示，可以如實轉達上述意見給胡績偉。但是，拒絕了給予書面文件。（《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這一個字絕對不能加”

胡績偉重病中寫《胡趙新政啟示錄》二三事

有好心的朋友，很真誠地勸胡老在《胡趙新政》之前加個“鄧”字，變成“鄧胡趙新政”。這樣，就有可能在大陸的開明的刊物上刊載。但是，胡老這位倔強的硬骨頭說：“其他都可以妥協，這一個字絕對不能加。”

以生命和心血寫下傳世之作

胡績偉老人在 2007 年中共十七大之前，確定要我協助他寫系列性文章，主要是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反思。他說，他現在走動須要被推著輪椅，身體狀況不允許他自己動手找資料、自己動筆寫文章了。但是，他的腦子很好，還能進行深刻的思

考，有許多題目想寫成文章，最好有一個助手把他口述的內容，核對資料後整理成文，形成記錄稿。由他對文字稿的第一稿審閱修改，或者提出大修大改的意見，由我查閱、收集資料補充修改以後，他再修改、審定。幾次改稿以後，由他簽字定稿，再公開發表。

他想好的第一批系列性文章是講“胡趙新政”，他認為胡耀邦、趙紫陽執政的12年，是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也希望十七大以後的領導人能執行沒有胡趙的胡趙路線，這樣，他需要重新反思和評價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這是一個頗有爭論的大問題和硬骨頭。

聽到胡老如此信任我這個學工科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生，賦予重任，我感到受寵若驚，老老實實地謝絕了他的好意，認為自己水平太低，力不勝任。我對胡老和狄沙說：“你們人民日報社至少有一千人的理論水平和文字水平遠遠超過我的能力，為什麼你們不找近在眼前的高手，而要選我擔負此重任呢？”

胡老耐心地向我解釋了原因：由於胡老長期擔任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培養了一批得力的幹部，在接受胡喬木、鄧力群發動的沒完沒了、連續不斷的批判胡績偉資產階級新聞路線、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支持“八九動亂”的政治鬥爭中，人民日報黨委不僅批判“胡績偉的思想路線”，還批判、清查“胡績偉的組織

路線”。這樣嚴酷的政治環境，迫使一些同情胡績偉的《人民日報》的記者、編輯，難於接受胡老的帶有極大政治風險的政治任務，不敢在黨委眼皮子的嚴密又無形的監視底下，幫助胡老寫政治性很強的文章。何況，前些年每年“六四”前後，都有幾位安全部門的便衣，成天坐在胡老宿舍前面的小花園長櫓上，虎視眈眈地盯著胡老門口的進出人員。胡老說，他曾有意識地直接問便衣或打招呼，關心地問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年輕的便衣偽裝得再好，也逃不過老地下工作者的火眼金睛。

如此一說，我這個外人，就不自量力地也是義不容辭地承擔



胡績偉因心肌梗塞引發肺部積水入院，姚監復探望時給他看《明鏡月刊》彩頁刊發他寫的《2011元旦報平安書》。

了胡老交給的任務。為胡老的口述做筆錄，回去整理成文，請自願協助我打字的無名英雄幫忙打成初稿，送給胡老，然後反覆修改，直至定稿。《胡趙新政啟示錄》書中收集了20篇我整理的胡老口述稿，實際上連修改稿統算，可能麻煩幕後的無名英雄打字定稿超過200篇。從這些數字看，胡老為了這本書，確實是嘔心瀝血，竭盡全力，極其認真負責的，也是對他的身體健康不利的。

所以我講，這本《胡趙新政啟示錄》，是一位90多高齡的老人，滴盡心血，拚盡全力寫成的。

同生命賽跑，卻嚴謹客觀

自知身患重症，時日不多的胡老，不顧90多歲的高齡，他一開始就向自己和我列出幾個、幾十個寫作題目，關於“胡趙新政”要寫哪幾篇，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要寫哪幾篇，關於“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法西斯獨裁政治”要寫哪幾篇。他有意識地同病魔作鬥爭、爭取時間寫作，超負荷地、不停息地腦力勞動，同生命賽跑。在一篇接連一篇寫出來，改了幾稿後定稿發出去，出現在幾年來的每一期《爭鳴》雜誌上時，他微笑著接過相當困難地才能從香港送到他手上的雜誌，翻看他的文章時，

他顯出了滿意和得意的臉色。緊接著又在催問：下一篇文章整理、打印出來沒有。

認真：胡老對每一個論點，都反覆考慮，要站得住腳。對“胡趙新政”的提法，反覆斟酌後才確定，而且認定了是事實，就堅持不改。對於“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的提法，引自毛澤東選集，但是，根據鄧小平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罪惡行動，總結歷史教訓，廢除“三個一”還不夠，他要加上廢除“黨軍”，要廢除“四個一”。

嚴謹：胡老認為，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不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的心血來潮，創新的發明，前有學者江亢虎在 1920 年代就向共產國際提出，1940 年代國內外、黨內外又都有一個要求民主、自由的客觀環境。他要求收集、分析當年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及《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言論作為證明，並且大段引用這些被中宣部查禁的歷史的先聲，說明這是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而不是毛澤東的個人功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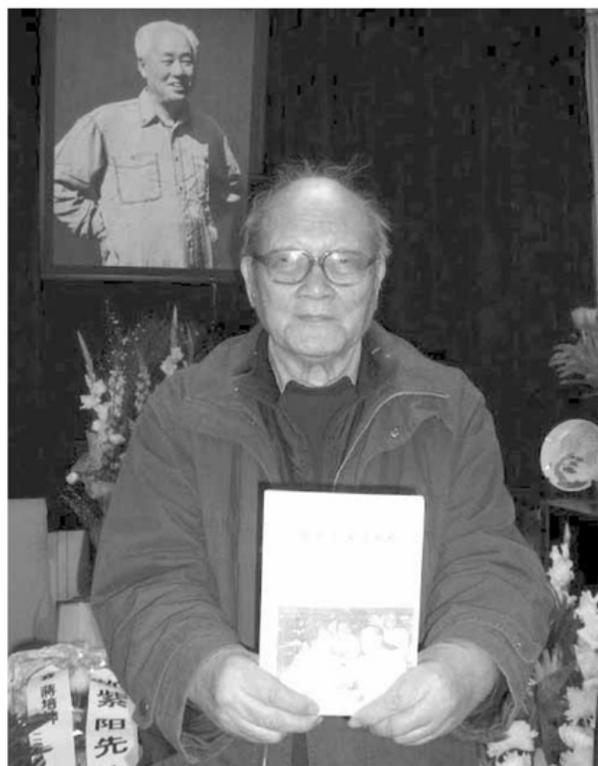
客觀：胡老認為，寫的文章要尖銳地揭露問題的本質，但是要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評價人物和事件，經得住檢驗。他在分析鄧小平是平反冤案的阻力，功勞主要應歸於胡耀邦時，特別用為劉少奇平反的《人民日報》社論為例加以說明，胡老等人起草的社論，題目原是《還歷史本來面目》，而胡喬木傳達鄧小平的指

示，將社論題目改為《還毛澤東思想本來面目》，給讀者造成毛澤東為他自己打倒的劉少奇平反的印象，這篇社論收到許多讀者的批評和指責。胡耀邦組織中央六個部共同起草形成為全部“右派分子”平反的決定，但是鄧小平堅持留下幾個“右派分子”不改正，以證明“反右派”鬥爭打了幾十萬“右派分子”，傷害了幾百萬無辜者，只是“擴大化的錯誤”，頑固地錯誤地堅持“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正確的”，其目的是為鄧小平這位“反右派”鬥爭五人領導小組組長的罪責辯護。有位老幹部讀了胡老的《胡趙新政啟示錄》，知道了這些客觀事實後說，胡老的書使我看透了鄧小平的反民主的本質。

我為胡老整理講話稿的幾年中，近距離地體會到，這位善良、正直的老人以對人民、受難者和無辜死難者的深沈感情，出自內心而寫這些為民請命申冤的文章。他確實是用心血在寫作，寫出的是將會燎原的烈火似的真理。

決不妥協，絕無媚骨奴顏

胡老在六年寫作《胡趙新政啟示錄》期間，思想認識不斷前進，他在堅持自己觀點如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必要性時，坦誠地和不同觀點的對方展開爭論，同友人們討論也互不相讓。但是，



2012年1月17日，趙紫陽離世7周年忌日，姚監復捧著為95歲胡績偉編著的《胡趙新政啟示錄》前往吊唁。

他在冷靜思考對方意見時，敢於修正自己不夠全面的看法，得出新的更全面、更深刻的新結論。如“我慢慢地覺悟到，當年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無非是一個高明的權術”；“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時所謂的兩個‘新’（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就成為共產黨圖謀獨霸天下的理論基礎”。（胡績偉《胡趙新政啟示錄》，第45、41頁）

但是，他認為應當歷史地分析當年擁護新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的正確選擇，因為毛澤東當時正式聲明，他

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既不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封建法西斯政治的道路，也不走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這些正確選擇反映在 1949 年的《共同綱領》中，而毛澤東拋棄了這些正確的共識達成的準憲法，給中國帶來了浩劫。

胡老在寫作《胡趙新政啟示錄》時，顯出一種絕不在原則問題上妥協、毫無奴顏媚骨的高貴品格。當時有好心的朋友，很真誠地勸胡老在《胡趙新政》之前加個“鄧”字，變成“鄧胡趙新政”。這樣，他談新民主主義的文章就有可能在大陸的開明的刊物上刊載。人們會想，這樣的妥協，可以在國內占領輿論陣地，讀者也能看出作者的苦心，是不是胡老可以讓步，加上一個字呢？但是，胡老這位倔強的硬骨頭對我說：“其他都可以妥協，這一個字（鄧）絕對不能加。”他認定批毛必須批鄧，批鄧才能深刻批毛。政治改革是胡趙的功勞，鄧是阻力。絕不能以胡趙之功為鄧小平貼金。當然，他也承認，客觀地說，鄧小平也是支持胡趙的經濟改革的。

胡老的“這一個字絕對不能加”的不可動搖的決定，反映出胡老的錚錚鐵骨，寧折不彎的傲骨風格，永遠鞭策著、激勵著我，勇敢地面對考驗。

2012 年 9 月 23 日，胡老去世後七日（姚監復）■

胡錦濤的伯樂宋平

冷斥盛世

中共元老們對現任執政者的評介，老百姓根本不得與聞，但前重要黨報總編輯自費印刷的回憶錄中，退休政治局常委宋平的談話不經意間透露出他的個人看法與不滿——即便是中共常委一級的高級領導人，對中國的前景也充滿憂慮

《宋靜存回憶錄》，寫於 2007 年並自費印刷。傳主宋靜存，1932 年出生，天津人，歷任《甘肅日報》、《農民日報》總編輯，1996 年從《經濟日報》副總編輯職務上退休，享受正部級待遇。

這部四十萬字回憶錄中最有價值的，當是第 34 章“在宋平家裡做客”一節，因為作者的工作緣由，與當年曾任甘肅省委書記的宋平一直保持著過從交往，內中記述了與宋平的六次談



自費印刷的《宋靜存回憶錄》。

話，披露了宋平對江澤民、胡錦濤執期間的一些時局看法，彌足珍貴。因為今年已經 95 歲高齡的談話人宋平，也曾是位極人臣、炙手可熱的人物，他作為周恩來的秘書，七十年代後期在中國政壇崛起，於“六四”後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決定中共大政方針的核心層面人物，也是多年來民間所傳影響中共政局的所謂“八老”之一。在中共的嚴密布控的密室政治與黑箱操作下，中共元老們的對現任執政者的評介，老百姓根

本不得與聞，但在宋平談話中，卻不經意間透露出他的個人看法與不滿，也正反映出這些年來中共高層之間的歧義與分裂，揭露出所謂“盛世中國”與“和諧社會”的真正內涵，即便是中共常委一級的高級領導人，對中國的前景也充滿著憂慮。所以，故將書中的談話摘錄於下，略加點評，廣布世人，以為鏡鑑。令人堪嘆的是，今天的中國現狀，較之宋平當年所談到種種弊政，更是到了無以復加，於今為烈，甚至是積重難返的地步了！

“不就是清朝的馬褂嗎？”

2002年3月22日下午

一見面，宋平就問宋靜存有什麼新聞？宋說老百姓現在議論最多的就是一是反貪汙，二是下崗和買斷工齡。宋平馬上接著話茬談到了下崗說，“下崗工人真是不容易。一兩萬塊錢就把人家打發了，什麼就都不管了。”

點評：工人下崗，企業賣光，是權貴資本主義瘋狂掠奪國民財富的最狠毒的一著，當時四處流傳“毛澤東讓學生下鄉，鄧小平讓幹部下海，江澤民讓工人下崗”的民謠。

說到眼下流行的唐裝，宋靜存說我對它不感冒，不分場合

亂穿一氣更不好，還說去年上海 APEC 會議上，中國政府給各國領導人送的唐裝，手工做的，一件就是五千人民幣。宋平說：

“什麼唐裝，那不就是清朝的馬褂嗎？APEC 會議上海放菸火，一晚上就是二百萬美元，有必要嗎？真是不計工本！”

點評：江澤民一身唐裝，咧著大嘴，洋洋得意，眾星拱月般地站在各國元首之中的照片，讓人印象深刻。後來，有學者考證出，這唐裝根本不是唐裝，就是如宋平所講是清朝的馬褂裝束。但有無恥經濟學家，公然撰文說這唐裝讓中國找到了一個新的經濟發展點，其肉麻無恥，令人不齒！

宋靜存問，是不是把這個會看得太重了？它能提高多少國家地位？為什麼非要當大國之君呢？我們的國力還沒那麼強大呀。宋平說：“這是搞‘春秋會盟’，你懂不懂？”宋靜存談到別的國家舉辦奧運會賺錢，宋平說，“我們肯定賠錢！”

點評：六年後中國舉辦的奧運會是大賠了，據說花費數千億，但到底賠了多少，至今仍是秘而不宣的國家機密。

說到新聞，宋平特別稱讚香港鳳凰衛視，說“鳳凰台”有看頭，新聞多，他愛看，宋平說：“中央台和新華社的記者比‘鳳凰’多吧？為什麼他們搞不出新聞來？”他的夫人陳舜瑤說，這不怪記者。宋靜存說，上面管得太死，現在又成了“大報小報都是‘梁效’了”！

點評：此話出自於國內一個報紙總編之口，可見中共新聞審查控制的嚴酷！

宋平說：“領導活動報道的太多。”宋靜存說，現在人們看晚上的新聞聯播都是從七點二十分開始。宋平說：“我也是。”宋靜存驚奇地說，你也知道呀！並說上面對領導人的新聞報道的要求是，主要領導充分報道，各個常委保證報道，其他領導適當報道。宋平笑了，沒說什麼。

點評：對新聞聯播，國內老百姓倒有一句順口溜最貼切，前十分鐘領導很忙，中間十分鐘中國很好，後十分鐘外國很亂！



宋平在中共
十八大開幕式上。

宋靜存反映，上面對民生問題重視不夠。現在，群眾看不起病，買不到放心食品？反映民情的管道也不暢通等等。宋平說：“現在儘為有錢人服務，也不能像以前攔轎那樣可以攔車告狀。”宋靜存說，根本不可能，領導的車還沒出來就把道給騰出來了。

點評：中共法制的倒退，有些地方比封建時代還不如，楊三姐還能攔車告狀呢，現在攔車告狀叫作攔訪，是要被處以勞動教養的。

有些貪婪的人膽子特大

2003年4月11日上午

宋靜存談到眼下最大問題是農村問題。宋平說：“國民經濟每年增長7%，農村不應該是現在這個水平。全國農民收入2400元，比上年增長3%，沿海收入高，中西部也沒有多少錢。江蘇增長6%，回良玉告訴我60%的農民並沒有增收。”夫人陳舜瑤說，我最討厭者“人均”，它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反倒掩蓋了很多矛盾。宋平說：“一畝地就算六百斤的產量，種小麥也不過收入三百元，花去水費、電費和買化肥就差不多了。這樣有些人就乾脆撿荒了，進城打工是條路，但也不是城門一開

就能進來。農村真苦，農民真窮啊！”

談到了中央台趙安索賄一案，宋平說：“一挖一串，數額那麼驚人，光靠紀委不行。個人權力太大，我說是有些貪婪的人膽子特大！”

中組部不給看李真內部錄像

2003年11月3日上午

宋靜存把看過的揭露貪官的內部錄像片的情節對他們講了。並說，這傢伙要是不揭露出來，將來可是不得了，他的野心大得很，再往上爬那禍害就大了。當講到李真的政治野心是“封疆大吏”和“內閣閣員”，他用權力換取金錢，再用金錢換取更大的權力，搞什麼“政治包裝”、“政治聯盟”時，宋平夫婦感到十分驚訝，陳舜瑤說，中組部怎麼不給我們放錄像？

點評：看來這河北的李真與重慶的薄熙來的道術路徑，都是一樣的。其實，現今中共政壇上，這樣的野心家比比皆是，潛伏了不少。

為何不能正視貧富差距加大

2004年10月14日下午

宋靜存談到貧富差距過大，卻總是不能正視，讓人不能理解。宋平說：“是啊，總是迴避。承認貧富差距過大，不就否定改革了嗎？小平不是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嗎？”陳舜瑤說，所以現在總是講盛世，一片鶯歌燕舞。

又談到媒體說中國人均一千美元了。宋平說：“那是平均數，大富和窮人的平均數。什麼叫小康？起碼有病能醫，有學能上，養老有保障吧？可是，現在呢？看病教育成了人們頭上的兩把刀。”說到腐化，宋平說：“你看看現在部長辦公室都是什麼樣子？”

宋平說他看了《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是揭露了不少問題，作者不還獲獎了嗎？”宋平還知道有人發表了《討伐中宣部》的文章，還有人要聲討中組部。陳舜瑤說，不是《中國青年報》也有人在批評團中央嗎？宋靜存說，不讓人講話，聽不得不同意見不行啊！

點評：八年後的中國，新聞控制的手段更為惡劣了，如跳樓自殺的《人民日報》副刊主編徐懷謙所講，想的不敢說，說的不敢寫，寫了不敢登。

發展硬道理, 硬發展沒道理

2005年10月21日下午

宋平問大家近來議論什麼? 宋靜存說是全運會的腐敗, 韓劇的熱播, 失控的貧富差距, 經濟高速發展, 又不增加就業, 也不增加收入, 還是高耗能, 高污染, 貧富差距加大, 怎麼是好? 宋平此時說了一句十分深刻的話: “發展是硬道理, 硬發展沒道理。上個五年計劃煤耗 10 億噸, 現在是 20 億噸, 五年增一倍, 六成是小煤窯的, 能耗高的不得了, 比國外高幾十倍。光是追求 GDP 不行, 現在就拿這個來衡量幹部的政績。基尼係數已經超過 5 了。改革要讓大多數人受惠, 企改的結果是工人收入下降, 現在這個改法不行。五千萬工人下崗, 最低生活費北京才 280 元。一個部級幹部帶著家屬去世界公園, 一看門票價格就沒進去……”

這時, 夫人插了一句, 你看國家大劇院, 投資 40 億, 4000 個座位, 一個座位 100 萬。宋平說: “對了, 聽說沒有人敢接手, 怎麼經營啊?”

就到教育, 宋靜存談到最大問題是九年義務教育沒有落實, 貧困山區的孩子上學太難了。他說到廣州搞手拉手活動, 邀請廣西貧困山區的孩子來廣州玩幾天。但吃晚飯的時候,

山區的孩子問，怎麼又吃飯了？不是已經吃過兩頓飯了嗎？為什麼一天要吃三頓飯？廣州的孩子問他，你一天吃幾頓飯啊？山區的孩子說，我一天吃一頓飯。宋靜存說他看到這段電視的時候幾乎哭了。這時，他看到兩位老人的眼睛已經濕潤了，他們也動情了。

中國的選票就是隨便劃圈

2006年11月9日下午

說到昨天的北京選舉，他們也投票了。宋平說：“候選人不認識，也不知道他的情況，隨便劃圈，真是形式主義。民主不是光投票舉手，應該參與過程。”他還說，現在農民代表就是山西的申紀蘭了。宋平說：“甘肅定西來人看他，說那里人均收入一千七人民幣就很滿足了，其實尚未達到聯合國日均一美元的脫貧標準。中國這麼大，平均數字不能說明問題。”

宋靜存把一家報紙上刊登的民謠念了念：張家資產一千萬，九個鄰居窮光蛋，要是平均算起來，人人都是張百萬。二老一聽，都笑了。

夫人陳舜瑤說，“三講”和“保先”活動，都沒解決問題。宋靜存說，現在“和諧”又壓倒了一切，什麼和諧中國，和諧北

京，和諧西城，和諧社區，和諧單位，沒見過動真格的，光是喊口號了。您見了現任領導，勸勸他們少喊口號，多幹實事。宋平說：“現在的領導也夠忙的，你說主席、總書記一人兼，能行嗎？”

點評：看來以“和諧”的名義為害中國，已成為上下的共識，無怪乎身居海外的作家余傑要撰寫《河蟹大帝胡錦濤》一書，來詳述其情由了。（魯直人）■

對鄧小平， 是高估了，還是低估了？ （後記）

如果沒有 1989 年的“六四”，鄧小平將以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領袖形象留名青史；

如果沒有 1992 年的“南巡”，鄧小平將以堅持專制、冷酷血腥的屠夫形象遺臭萬年。

人們曾經以為，鄧小平在世間的形象，在 1997 年 2 月 19 日他辭世之日就此定格：以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一黨專政的“兩手硬”形象，被蓋棺論定。

16 年時光如流水沖刷，鄧小平的衆多光環次第脫落。如今對鄧小平的評價不僅沒有塵埃落定，反而愈形兩極化：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推出其巨著《鄧小平時代》，堅持認為，鄧小平的貢獻和地位被嚴重低估；然而圍繞他的這部傳記，衆多知情人講述內幕，衆多學者深入剖析，卻對傅高義的說法不以為然，認為過去以為安在鄧小平頭上的那些傳奇，原來並不是那麼值得讚頌；而過去以為鄧小平當之無愧的那些功勞，其實要麼是“張冠李戴”，要麼是言過其實——

連鄧小平主導中共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說法，也被譏為“神話”。

鄧小平曾經強力主導了對毛澤東的官方定論，現在，他自己的歷史地位，也受到來自左的和右的兩方面的強力衝擊。

《新史記》雜誌自創刊以來，始終將鄧小平作為關注的重點，幾乎每一期都有圍繞鄧小平的討論文章。本書輯錄這些文章，幫助讀者對鄧小平做出自己的判斷。

《新史記》是海外唯一一家獨立的人物和歷史大型雜誌，以中國近代、當代人物傳記和重大歷史事件真相和解讀為主要內容。每期 208 頁，24 萬字左右，從 2011 年 4 月創刊，每逢雙月出版。

《新史記》與“明鏡歷史網”（www.mingjinglishi.com）互相支撐，努力打造“全媒體”，已經有了推特、Facebook 等多種版本，還可以通過電子郵件發送，讀者只要在該網站的右上角“Follow by Email”處填上電子信箱，就能每日收到“歷史日報”。對關注歷史的人來說，這不啻開通了一列直達車。

《新史記》同時出版電子版，若長期訂閱，享有較大優惠。訂閱網址是：<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董大凌

2013 年 4 月 25 日



此頁空白

明鏡出版社新書
www.mirrorbooks.com

沒有解放軍，文化大革命發動不起來
沒有解放軍，文化大革命進行不下去
沒有解放軍，文化大革命停止不下來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論述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關係的學術著作，研究、探討了文化大革命期間解放軍是如何介入和參與文革運動，全書重點論述了文革前夕軍隊政治地位的提升及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對軍隊的各項戰略部署，軍隊內部因文革所發生的動蕩，軍隊參與“三支兩軍”的主要活動，軍隊將領們因參與文革運動所遭遇的不同命運和結局，軍隊與江青等文革極左派的矛盾與鬥爭，軍隊參與地方“鬥批改”運動的活動，以及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幫”等中共重大歷史事件。深入研究文化大革命史就必須研究軍隊與文革的關係、軍隊在文革中的作用。本書屬填補空白之作，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本書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內容豐富，史料翔實，同時也具有很高的可讀性。本書的問世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香港各大書店有售 / 內部書店專售 / 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 59 號一樓
TEL: (852) 28380227 FAX: (852) 39094606 2013 年 2 月出版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78-1-935981-87-9 定價: HK\$189 全書 560 頁

鄧小平強加給全黨的《歷史決議》

還原鄧小平阻撓改革開放的真相

不能用今天的形勢要求當年的鄧小平

《鄧小平時代》大陸版少了什麼？

鄧小平不是啟動改革的人

傅高義筆下的現代中國“總經理”

傅高義為何代中共鼓吹“屠民治國論”？

鄧小平小心翼翼地重整破碎山河

改革開放·“六四”鎮壓·抗拒政改

撒切爾夫人和鄧小平趙紫陽交手的機密細節

中國錯失政治改革的黃金時段

追求民主憲政的人比“六四”時思想更成熟

如果鄧小平會被騙，就不是鄧小平了

“這一個字絕對不能加”

胡錦濤的伯樂宋平冷斥盛世

ISBN 978-1-940004-00-6



9 781940 004006

定價：HK119 NT399